

第六卷

萍踪寄語選集

陸富著

266
620



3 2169 7857 1

萍踪寄語選集弁言

「萍踪寄語」第一、第二、第三、共三集，是我在遊歐兩年間的通訊，共一百三十一篇，三十七萬餘字，旅居匆促中寫成，對於所歷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新聞專業各方面的情形和趨勢，略具梗概，聊供國人參考。篇幅既多，購閱者或感不易，爲便於讀者計，所以又從這三集中選擇在內容上比較更爲重要的三十六篇，約十一萬餘字，編成這本『選集』。原來的三集中，第三集專記遊歷蘇聯的印象，約二十萬字；因爲許多朋友對於蘇聯新社會的建設狀況特別注意，所以這『選集』裏對於這方面的材料也特多，超過全書的一半。關於蘇聯在文化、教育、工業、農業、商業、社會關係種種方面，都有相當的扼要評述。但是有一點要請注意的，蘇聯的新社會進步迅速，日新月异，這裏所說到的不過是大概的趨勢而已。

我把這本小小的『選集』貢獻於讀者諸君，倘能由此使國人裏面有更多的人了解世界的大勢，看到別人的流弊知所避免，看到別人的優點知所取法，那便是作者所最欣幸的事情了。

賴番記於艱危中的大眾生活社

一九三六、二、廿三、夜。

目錄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一
難意大利後的雜感.....六
世界公園.....九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三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五
在法的青田人.....八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三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四
從愛爾蘭歸途中.....一七
「巴立門的母親」.....一〇
大規模的貧民窟.....三
英國教育的特點.....三
英國的華僑.....四
再到巴黎.....四
遊比雜談.....四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五
所謂領袖政治.....六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七〇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七〇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七三
莫斯科的鳥瞰	八〇
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八五
運動大檢閱	九〇
托兒所	九二
婦孺衛護博物館	九六
幼稚園	一〇〇
佛勒格機械廠	一〇四
結婚和離婚	一〇八
第四勞動農場	一一三
集體農場的重要性	一二五
開放給大眾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	一二八
雅爾他	一三三
兒童療養院	一三七
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特點	一三三
蘇聯的電影和戲劇	一三九
不賺錢的商業	一四二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記者自八月十日（一九三三）到羅馬以後，中間經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比薩（Pisa），熱那亞（Genoa），米蘭（Milan）各城，八月十七日離開意大利而入瑞士，今天（八月十九日）已在瑞士的首都百倫（Bern）了。在此十九日中未曾寫成一篇通訊，這不是我偷懶，却是因為這次遊意大利是臨時加入一個小小的旅行團體同行的，白天偕同各人疲於奔命，夜裏吃過晚飯洗個澡便到了十點鐘以後，第二天又須起早再奔，簡直沒有容許提筆的時間和精神。團體行動不得不一致，這在有特殊的職責的人方面（例如我負有爲『生活週刊』通訊的職責），却不無一些困難。自從今晨這小小旅行團的其餘團員都在瑞士的沮利克（Zurich）動身往德國去，記者和他們分途後，便孤零零地一個人獨向瑞士的首都進發了。提筆作此通訊時，是剛到的夜裏，在百倫一個旅館的一間小房間裏很靜寂的燈下寫的，但是通訊的內容却不得不從羅馬補敘起來，請先談談表面輝煌的羅馬和窮相畢露的那不勒斯——所謂表面和裏面。

我們八月十日夜由佛羅倫司到羅馬已十一點半了，大家忽忽睡覺，第二天早晨，我們正要走入餐廳早餐時，有一位妙齡女郎迎上來用英語向我們道早安，並請我們告訴她應在特備的表格上填註的事項，還在國外各處旅館原是常事，但此處令我注意的有幾件事：（一）這個女子英文說得很流利，後來聽我同行的朋友會說德語，她又用很流利的德語詢問他們，我和她略談之後，才知道她是瑞士籍，能英德法意四國語言，她辦事精明幹練，待人溫和誠懇，後來知道旅館的一切都由她主持，大概是女經理，我問她意大利婦女職業的情形，據說在歐洲各國還算落後；（二）表格上所填註的事項，除尋常所有的如姓

名國籍職業及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等等之外，還要問各人父親的名字和母親的姓名，我只知道我的母親是浙江海翁霍氏，她有什麼名字，我始終不知道，只得臨時替已去世了二十幾年的母親取個新名字，再把他譯成洋文了；（三）據這個女經理說，這種表格，警察廳裏每隔三四小時就派人來查，尤其查得苛細的是俄國人，他們的防範情形，可以概見。

羅馬曾經做過煊赫一時的羅馬帝國的都城，後來又做過教皇的『精神帝國』(“Spiritual empire”)的都城，自一八七一年來一直是意大利國的首都，他在路政上建築上古蹟上的雄偉，那是不消說的。但我們到了現在意大利的首都，總連想到所謂『法西斯』，這時意大利法西斯十週紀念展覽會還未閉幕(連開三個月)，而且因為受了一部分火車費三折的『優待』，依他們的規定，須將火車票拿到展覽會打個戳子，表示確已到了羅馬，並且還看了展覽會。到羅馬如不將火車票蓋印，原有『優待』尙須取消。(買來回票簡受此拘束，我們買通票的也一樣。)經他們這樣費勁引誘，所以我們第二天就費了半天的工夫去『覽』牠一下。到了之後，拿出火車票打戳子，才知道還須付二十五個列拉，(Lira，等於法幣六圓兩角半)，三折『優待』的名詞多好听，却臨時加上這樣一個竹槓，記者原想來看看的不打緊，同行中有因貪這『優待』而移尊就教的，都大呼其儻頭！

『竹槓』不在乎，尤感到惘然的是『覽』了以後的一無所得。我所特別注意的是他們究竟替意大利人民幹出了什麼成績，要這樣大張旗鼓地希望人去『覽』，但却一些『覽』不出，原來他們只不過按年把該國法西斯一黨發展中的殺人照片，『烈士』照片，所用的刺刀旗幟等等，陳列出來，尤多的當然是他們的老祖宗墨素里尼的大小各種各式照片。墨素里尼曾經在米蘭做過意大利人民報(“The Popolo of Italy”)的主筆，在這展覽會裏，特把他當時主筆辦公室的椅桌器具照樣排列成一室，並把當時的這個報紙一張放大到好像一面牆壁似的陳列着。據牆上所貼的說明，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年間，墨索里尼就在這小小的一間主筆辦公室裏對黨員發號施令。

意大利的法西斯所欲維持的是什麼，所擁護的是什麼，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但記者在國內時承友人介紹一位據說在意大利多年而對於法西斯主義富有研究的某君，姑往訪問，去了兩次才見到，他滿口讚美墨索里尼，尤其讚美意大利沒有工潮（？）；爲歐洲各國所不及。他並說墨索里尼會說廠主靠工人，（他不承認有資本家這個名詞，）工人也靠廠主，沒有廠主靠誰養他們！記者因道路不熟，花了八個列拉，（兩塊中國大洋），坐了一輛汽車去看他，回來時不願再花冤枉錢，只得難爲了這兩條不幸的腿了！

意大利的輿論界當然是無可說，這就是那位對墨索里尼五體投地的法西斯主義專家也承認的。

羅馬的勝蹟不少，費十幾天也許才看得完，我們只能擇其尤要的幾處看看，鬥獸場頗近，是走去看，這殘垣破壁的羅馬鬥獸場，我們在相片上，乃至在小學教科書上的插畫裏，早已領教過，所以見面時如老相識，的確古色絢爛，不過想到從前把俘虜放入，一任獅子亂咬，坐而圍觀者相顧而樂，殘忍之至！此外最雄偉的是聖彼得教堂，近三百尺高，裏面全用大理石造成；雕刻精美。最有趣的是在城外看了一個教堂下面的二千年前用石造成的長達半英里的地窖，由一個天主教徒的和尙燃着油把領導我們下去看，我們各人付了三個列拉，各燃一根小燭拿在手裏，跟他下去。裏面曲折黑暗，如入山洞，左右還有不少黑暗的小洞和大窟窿，據說是當時異教來殘殺天主教徒，特在教堂下面造好這種大地窖，以備各教徒遇難時藏身之用，但仍時被發現，橫被追入殘殺，現在還得見不少遺下的頭骨和骷髏。窖內冷氣襲人，滿目慘象，燭火晃晃欲滅，同行的周君說還看見『鬼火』（磷火），他急避而不看，我的後面先前還有人，後來回顧就只陰森森的一團漆黑，大家跟蹤踏地好像遊了一次『地獄』！羅馬城內看不見乞丐，但我們到城外便遇着，有一個男乞丐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對我們哀訴家裏有子女六人，作手藝表

亦由小而大，激激待哺，這也好像堂皇的教堂下面有着黑暗的地窖。

我們八月十三日晨八點鐘由羅馬乘火車往意大利南方的名城那不勒斯，直坐到下午三點鐘才到，大家都被火車震盪得頭昏腦脹；到了之後，就瞥見街道的醜陋，瘧三的人衆多，尤妙的是我們原選定了一個旅館，忽被一個瘧三式的旅館接客把我們引到那個旅館門口，用意大利語和該旅館中人鬼頭鬼腦的掉我們的榆花，該旅館中人便藉口房間已滿，不肯容納，於是那位瘧三接客引導我們這一羣疲頓不堪的孩子穿過了許多貧民窟，街道的醜陋不用說，房屋的破爛航穢也不亞於在印度孟買所見的貧民窟，尤其令人注目的是街頭巷尾擁滿了蓬頭垢面形容枯槁衣服破爛航穢的大大小小的男女孩童，跑來跑去開蕩着，有的就向我們求乞。最後那位瘧三接客把我們引進一個走了不少曲折黑暗的巷子而達到一個小旅館，房間全數不過三間，有的房間裏婦女伸出頭來向我們望，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道』，我們都怕進了盜窟，趕緊提着衣箱向外跑，另尋一個旅館住下。大家都喊倒霉，但我却獲得機會看看『裏面』的那那不勒斯，第二天我們裏面有兩位在街上散步，到一處就有人來『拉皮條』，說附近就有美麗的女子，要不要，只須兩個列拉（等於法幣半圓）就可以……他們兩位究竟不敢領教！

那不勒斯城本身不過爾爾，她的著名是附近該城的古蹟名勝，尤著的是由地下挖出的二千年前被火山灑沒的磅貝意古城（Pompeii）和涅沒這個古城的有名火山佛蘇維哀斯（Mount Vesuvius）。我們因時間及經濟關係，火山僅在遠處望望（近四千尺高）。磅貝意古城，我們却費了差不多一整天的工夫，乘了火車到該處去看一番，該城在兩千年前是很繁盛的城市，居民有兩萬人。紀元前七十九年的時候，久已靜默的火山忽然大爆發，將全城埋沒至十五尺之深，後來又加深至二十尺，直至一千八百餘年後（一八六〇年）才被發現掘出一半，我們才有機會在這兩千年前的古城裏東西窺着參觀憑弔。全城的屋蓋都沒有了，剩下來了的只有石鋪街道和磚石造成的大小房屋的圍牆，還有幾個遺下的全身屍骨，縱橫臥着。

現在有屋蓋和玻璃大窗，把他們的遺骸保存在裏面。

我們遊完古城後，餓得慌了，就在附近的一個餐館裏補吃午飯，被大敲竹槓，每人敲去二十個列拉（華幣五圓）。各遊客吃的時候，還有兩個意大利人毫不徵求同意的向各客人大彈其不入耳的『孟德林』，而且大唱其不入耳的怪腔調；他們猜你是何國人，便向你唱何國的國歌。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向着我們唱的是日本國歌，他們來討錢時，有人主張不給，後來申斥了他們幾句，說我們是中國人，不要瞎唱日本歌，他們爲着幾個錢的緣故，堆着笑臉答稱『是！是！』仍給了他們幾個列拉。

我們在八月十五日又離開那不勒斯，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薩。

廿二、八、二十、脫離於百倫。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記者上次通訊談到離開那不勒斯 (Naples) 時為止，我們於八月十五日晨離開那不勒斯，當晚九點左右到意大利西部的比薩 (Pisa)，該處最令人留戀的是科學家加列利奧 (Galileo) 研究「吸力定律」 (Laws of Gravitation) 所在的斜塔 (Leaning Tower)。這塔是十二世紀遺物，高一百七十九尺，斜出十四尺，全部用石造成，中心是空的，最外的牆和中心周圍的牆的中間，有螺旋式的石級可以上去，有二百九十六級，我們都跑上最高的一層，可望見全城。在中學時代讀物理學就耳聞這個斜塔，不料現在得親歷其地。此外還在附近看了許多排列着的十三世紀遺下的石造的古棺和棺外的許多古雕刻。

我們十六日下午離開比薩到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產生所在地的熱那亞，僅略作遊覽，並瞻仰哥倫布的石像，即赴在意大利人口最多 (八十六萬餘人) 的米蘭 (Milan)，也是在意大利最繁盛的一個商埠，絲業市場佔歐洲第一位，且為意大利法西斯的老祖宗墨索里尼的發祥地，一九二二年他率領十萬「黑衫黨」向羅馬出發 (March to Rome)，就從此地作出發點。該地的新造大火車站，就是為着紀念他的，全部用鋼鐵鑲着厚玻璃造成，高達二三百尺，上面也用鋼鐵鑲着厚玻璃作成半圓形的蓋，裏面容下了十幾個月台及軌道，出口處的大柱和石級都是用大理石製成，堂皇得很，據說可算是歐洲最大的火車站，該城的街道很像上海的南京路和靜安寺路。

我們於八月十七日下午十二點十八分離開米蘭，兩點鐘火車開進了瑞士國境的齊亞索 (Chiasso) 便和意大利告別了。記者草此文時 (八月廿二日) 已身在日內瓦的一個旅館的房間裏，但關於瑞士的印象，當另文記之，此時請先述我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關於意大利的政治和民生方面的觀察，上次通訊裏已略有提及。關於一般人民的習性方面，印象也不見佳。記者所有機會接觸的大概偏於城市的人民，鄉村方面怎樣，未敢妄斷，且無論何國，均屬良莠不齊，其間不過程度問題，故亦未能一概而論，但就所覺察者而論，意大利的做事馬虎，實隨處可以看出。在意船上剪髮，即已覺得，很凶莽地幾下一剪，就算完事，同船的旅客戲呼爲「殺頭」，記者也這樣地被殺過一次頭，破費四個先令六辨士，合華幣三塊半大洋！有某君「殺頭」之後，發現兩邊太陽穴的髮腳修得一高一低，大家看見了，戲稱爲一九三四年的新式！後來我在那不勒斯的旅館裏又「殺頭」一次，也是受着同樣的待遇，甚至沒有把布圍着胸部和背後，他就要「開刀」，幸而我自己留神，趕緊把房間裏的白色洗面巾拿來圍上。這樣在幾分鐘裏開了幾刀之後，索取列拉四個，等於中國大洋一塊，但比船上已客氣得多了，而馬虎的程度却先後輝映，或有過之無不及。試再舉一事。我們在威尼司的某旅行社買火車票，把所經過的地名開得清清楚楚，把這張單子交給該社的一個職員，說明在某處因欲避潮，所以那一段路乘小輪船而不乘火車（該處連票可有這樣辦法），他弄錯了，在票上寫明全乘火車，我們當然和他大辯交涉，他說火車輪船不是一樣嗎，硬要我們馬虎，我們堅執不肯，鬧了好半天，後來他終於不高興地換過一張。在瑞士的火車上貼着不許吸煙，即不得任意吸煙，在意大利便馬馬虎虎，火車的車上儘管貼着不許吸煙的通告，大家仍可馬馬虎虎地吸着，意大利除極少數的城市外，是大概都隨處是航霧的，無他，也是馬虎而已。

我在未出國前，到過歐洲的朋友都說遊歷意大利最不易，因爲往往要上當或受欺騙。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因有事要趕到火車站一趟，求迅速起見，就叫一輛零租汽車（Taxi）乘去。這種零租汽車上面原有行程表，走了多少路，應付多少錢，這行程表的機械都能自動的載明，照理沒有欺騙的餘地了，但是那個汽車夫却把這位朋友開到別的地方去，半途停下，假說剛才聽不清楚，一看表上已須兩個半列拉（一

個列拉合華幣兩角半），這位朋友氣極了，打算就付給兩個半列拉了事，不再乘了，剛下去兌換零錢後，回頭一看，車上的表已被車夫用手法改爲三個列拉，這位朋友却也強硬，無論如何，只肯付兩個半列拉，車夫無可奈何，拿了錢大罵其日本人！（因爲他把這位朋友當作日本人。）這位朋友當然還是吃虧，因爲他仍是白付了車費。

不過平心而論，意大利却有勝過中國的地方，最顯明的是他們的交通比中國便利得多。記者此次遊意，由該國東南而東北，折往中部，直趨南部，又由南部而西南，而向北，經重要城市八處，差不多在該國東南西北兜了一個圈兒，而實際在火車上所費去的時間不過四小時左右，兩天還不到，比之在中國有的省分要走三個月才能到，而且還要由外國兜個圈子進去（例如雲南），那當然好得多了。雖然中國區域比意大利的大，但他們的鐵路網連絡全國各城市，路路通，我們却老是這幾條老鐵路，好像就此終古似的，確是無可爲諱的事實，其實我們除開口五千年亘古文明外，現在有什麼勝過人家！意大利不過是歐洲各國中的一個『瀛二』，但却仍比我們勝一籌，說來慚愧！

八月廿二日記於日內瓦。

世界外公園

瑞士全國不過一萬五千餘英方里，人口約四百萬，這個小國的風景秀美絕倫，人民都衣冠整潔，似乎都能安居樂業，處處令人欽羨，但近數年來也不能不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失業問題雖不及他國的嚴重，但也很足以使當道者苦於處置了。瑞士的工業出產品，以錶為大宗，但自世界不景氣以來，瑞士法郎價值又高，國外貿易不免大受打擊，因此錶廠有不得不停辦的，就是規模較大，維持能力較厚的大廠，也不得不減少工人，有的竟減少一半，所以失業工人尤以錶業為多。各邦（瑞士的每一聯邦，他們稱為Canton）對於失業工人的救濟辦法雖非完全一致，大概每人每月可領失業救濟費一百法郎左右。（瑞士法郎約合華幣八角，等於華幣八十圓了。）領失業救濟費的不許娛樂，例如在戲院中套出，即須受罰。這種消極的支持辦法，數量一天天地加多，便是一個難題了。此外瑞士既是『世界公園』，公園是要靠有人來遊的，有人來遊才有相當的收入。瑞士因各國人士普遍的勝地，所以旅館業特別發達。我們注意大利，覺有三多：教堂多；噴水池多，叫化子多。瑞士至少也有四多：湖多，山多，旅館多，菜館多。無論窮鄉僻壤，Hotel（旅館）和Restaurant（菜館）兩個字的招牌隨處可以見到。所以瑞士其實也可以稱為『旅館國』。他們有旅館專門學校，聽說別國要開講究的旅館的，往往從瑞士特聘『旅館專家』去設計主持，其聲價可以想見。但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各國到瑞士的遊客因而大大的減少，雖有『專家』，無可奈何，關門大吉的旅館也不在少數。

瑞士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在表面上，比起別國來還算好，但在心裏如何，有一事件實可以表示大抵：有位朋友自德國到意大利，經過瑞士，在火車上遇着一位瑞士商人，和他談起天來。他問中國和

日本的問題現在怎樣了？還在打嗎？某君說表面上是不打了。他說日本既已得到了滿洲，當然用不着再打了。某君說中國並未答應日本，他笑着說日本在實際上既得到，中國不抵抗，何必得到中國口頭上的答應？他又接着說；日本人口繁盛，勢不得不如此。某君說中國人也不少，如此以爲理由而掠奪他國土地，於理講得去嗎？他回答說：像日本那樣的民族應該讓他們繁盛擴充起來，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越少越好，至於理由恕我不便奉告了。他的意思顯然是說中國是劣等民族，還是減少或甚至消滅了爽快！某君聽了大氣，和他大辯了一番，結果不歡而散。

這個瑞士人的心理至少有兩個要素；一是崇拜強權；二是老實把中國看作劣等民族，活該受人侮辱蹂躪！其實這不僅是這個瑞士人的心理，據記者出國後所聽到國外僑胞的訴說，儘可說是歐洲一般人的普通心理，不過不便在嘴上明說罷了。我常於深夜獨自靜默着哀痛，聰明才智並不遜於他國人的中國人，何以就獨忍受這樣的侮辱和蹂躪！

在瑞士的中國留學生從前有六十幾人，現在只有二十幾人，此外便是來來往往的中國青田籍的小販約百餘人，替中國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瑞士對於外來的小販原發兩種執照。一種是貨樣執照，每年只須納費二百佛郎，但不能直接售貨，只能示賣戶以貨樣，有要買的，再回去將貨物由郵局寄出，價值由郵局代收。還有一種是直接售貨的執照，那就可以直接售賣貨物，可是每月就須納費數百佛郎。因此青田小販只領貨樣執照，却私下偷售貨物。被警察查出後，第一次罰款，第二次驅逐出境，將執照沒收，但青田小販往往能改名換姓，假造新護照捲土重來，又被查出，嘗了鐵窗風味若干時後再被驅逐，惟瑞士警察當局覺得防不勝防，特定新例，須蓋手印，外人對蓋手印看得很重，只施於強盜一類的重犯，視爲很大的恥辱，但做了中國人有什麼話說，要蓋便蓋就是了！

關於海外青田人的可憐，還有一件事可附記在這裏，據一位在德國海得堡城（Heidelberg）留學的

朋友談起，說去年耶穌聖誕節時候，該城有個中國青田小販演了一幕悲喜劇。他在電車上放着一隻箱子在進口處有礙交通，售票人叫他拿開——他不懂德語，置之不理，售票人強他下車，他雖不懂德語，但罵人的德語却學會了幾句，下車時便對售票人罵了一句「你是德國的豬羅」；售票人聽了不答應，下來和他辦交涉，德國人圍着看的越來越多，其中有一個很氣憤地質問這小販，說罵人就罵人，何以要加上「德國」一字？他仍聽不懂，只見許多德國人圍着，便索性破口大罵一句「德國人都是豬羅」，結果大家不答應他把他捉將官裏去，坐了六個月的監牢，但他始終莫明其妙！

廿二、廿八、廿八、記於巴黎。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巴黎是世界政治的一個重要中心，牠的報紙不但執法國全國的牛耳，好像上海的報紙之於全中國一樣，而且是國際上所嚴重注意的，但是巴黎的重要報紙全在資產集團的掌握之中，這個集團就是法國特有勢力的資本家所組織的『鐵業委員會』（*Comité des Foyers*）。這個把持法國輿論樞關的『鐵業委員會』雖號稱鐵業，並不限於鐵業資本家。像香水大王古推（*Paranois Coty*）也是其中重要的分子，這大概是因為最初範圍較狹，後來逐漸擴充，而會名却仍舊保存着。

巴黎報紙有一千六百種之多，其中有六十種是含有政治意味的，在許多報紙裏面，最重要的也不過二十家左右，關於巴黎的報紙，徵言先生從前在『生活週刊』通訊裏會有一文說得頗詳，記者現在只談談尤其重要的幾種報紙和值得注意的一些情形。

我們在國內即久聞巴黎『時報』（*Le Temps*）的大名，凡是研究和注意政治的人，大概沒有不常看的，牠的最大特點就在能做法國外交部的『先聲』，每遇法國外交部方面將有什麼舉動，牠就先在外面造空氣，所以看『時報』得窺見法國外交的趨勢，但是牠却不是法國外交部正式機關報，據熟悉法國外交界情形的友人說，因有一次該報的主筆是外交界中人，於是因歷史的關係，便沿襲下來，又據說法外交部有一特殊情形，即傳統的外交政策，很難由一新部長來就完全改變，不隨政黨進退的部中要員（尤其是秘書長）都有舊勢力，對各專門的案件都有一定態度，做部長的即有所主張，至多只能緩緩地改變，『時報』所造的空氣是法外交部的意思，却不一定是外交部長的意思，其實既以侵略為目的，和緩叫你生肺病，激進叫你生急病，在受侵略者都得不到什麼便宜，巴黎時報是晚報，很為政界要人所

重視，但因為看的多是所謂『上流人物』，銷路只有四五萬，可見辦報必須有其特點，有了特點，銷數雖少還是有很大的力量。（巴黎『時報』的政策自是另一問題。）

法國報紙，除左派如社會黨及共產黨的機關報對中國不說壞話外，其餘報紙對中國的态度沒有不是壞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之後受了日本的收買，像上面所說的『時報』，雖偏助日本，還不怎樣明目張膽，還有和『時報』差不多的晚報，名叫『雄辯報』（『Journal des Debats』）就更公開的罵中國而袒護日本，但『雄辯報』還不及早報名叫『巴黎回音』（『Echo de Paris』）對中國更壞，在中日事件發生後，該報天天罵中國，把中國罵得太壞了，罵得太不像樣了，以致引起一般讀者的懷疑，最後甚至不能相信他們的話！

這都是些有名的報紙，但因受日本『經濟運動』的結果，竟顛倒是非，一至於此，豈不可怪！後來弄得就是法國讀報的人，大多數都知道此中内幕，成為公開的秘密，社會黨所辦的『光明週刊』（『Le Luminere』）老實公開的說法國報都被日本收買了！這樣看來，中國的不爭氣，固還是鐵一般的事實，而日本之心勞日拙，也是很顯然的。聽說法國只對外如此，對內則須受法律的制裁，不敢這樣亂來，不過當十九路軍在淞滬血戰抗日的時候，事實過於顯明，法國報紙也多少變了口臉，無法說謊。當蔞陽不抵抗之後，他們的報紙倍加掄擲，弄得不少在法國的中國人沒有面孔見人，多不敢外出，到了這短時間內『無法說謊』的當兒，他們才又大模大樣的出去，當時十九路軍所以得到海外僑胞的熱烈尊崇，不是沒有理由的。

巴黎報紙銷數最大的有四家，都是早報，牠們銷數所以比別報多，因為不但本埠讀者多，外埠讀者尤多，一個是『小日報』（『Petit Journal』）一個是『小巴黎人報』（『Petit Parisiens』）這兩家報每天銷數各近二百萬份，牠們的名字上雖各有個『小』字，其實是大報，並非小報，雖則歐洲報紙的形

式多巧小玲瓏，和美國大而且多的不同。此外有一個是『晨報』(Le Matin)，一個是『日報』(Le Journal)。這兩家的銷數每天各近百萬份，這四家銷數特大的報紙都和所謂『鐵業委員會』有關係，那是不消說的了。

香水大王古推除參加『鐵業委員會』外，還自己出資創辦一種早晚報(早晚報都有)，名叫『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價錢非常便宜，比別的報紙便宜一倍，早晚報合起來的銷路已有七八十萬份，聽說已貼去幾百萬圓，古推自己常在該報上大做其文章，最近提出『法國的安全問題』連日登着，登完後又在組織一個會，以招致同志。有人說他有意入政界，將來也許終有登台的一天，以他這樣一個搵子，如有登台的日子，能幹出什麼政治來，可不言而喻了。關於他，有一點更值得中國人注意的，就是他反對中國很厲害，袒護日本很起勁，而他的『古推牌』的香水在中國的銷路却很好，賺中國人的錢來辦報打中國人的嘴巴！有位朋友很憤恨地叫我不忘却在這裏宣布一下，我覺得用錢請人打嘴巴確是不很合算，不知買『古推牌』香水者以為如何！

在巴黎報界後起之秀的有個『巴黎晚報』(Paris Soir)，在巴黎很盛行，一到天晚，滿街都是『巴黎蘇阿』(該報名稱的譯音)之聲，使我想起在上海馬路上所聽到的『大晚夜報』的呼聲同樣的熱鬧。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法國人民的教育比我們的普及，這是不消說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教育究竟不能平等，例如法國的初級階段的教育（七八年畢業的），分爲兩種：一種是國民學校，那是完全免費的，還有一種稱爲『利賽』（*Tycee*，即中學），據說教員比較的好，功課比較的完善，訓育比較的嚴格，但是非有錢的子弟不能進去，至於高等學校和大學，更不必說，沒錢的人不能開津，要末只能進特爲他們而設的職業學校，最近因有人鳴不平的結果，『利賽』初年級的一年已可免費，但沒錢的人讀這不上不下的『一年』，於事何補？而頑固派則已大爲憤怒，說這樣使『上等』的子弟和『下流』的子弟混在一起，將貽害無窮！

法國中學辦法的嚴格，是在各國教育制度中向來有名的，畢業期限六七年，高中分文理科，文科畢業時須能三種外國語，其中有一種爲死外國語，非拉丁文，即希臘文；理科雖不必學習死外國語，仍須學習兩種外國語，他們都注重翻譯的能力，作爲將來進而研究更深學問時閱讀外國書報的基礎，高中畢業即爲『學士』（*Bachelier*）。

關於高等教育，法國有國立大學十七所，及獨立的學院若干所，畢業年限自二三年至六年，依科而定。（醫科最長，須六年）異業後稱『碩士』（*Maîtrise*），所奇者，要得這種『碩士』，難於一大學博士」（這個名詞意義見後），入學要經嚴格的考試，平日功課和畢業考試都較嚴，所以中國的留學生進這種『碩士』班的很少，進所謂『博士班』的反而多，因爲進『碩士』班要經過嚴格的考試，進『博士班』只須有中國的任何大學的一張文憑，都得進去，學理科的還須隨着教授在實驗室中研究三四

年，學文科的就只須預備一篇論文，學法科的從前也如此，近幾年來較嚴，須考八門功課後才做論文，考得順利的大概要兩三年工夫，這都是指所謂『大學博士』（*Doctorat d'Université*），還有『國家博士』（*Ag. tout court*），非經法國本國的大學畢業，不能應考，論文也比較的嚴格，只有『國家博士』有擔任中學教員的資格，『大學博士』和『碩士』都須經過『中學教員考試』合格後，才許任教於中學，這種考試均由大學教授主持，他們對於中學師資的認真，於此可見一斑。

中國留學生大概都注重在『大學博士』頭銜的獲得，這裏面真正用功的朋友固不乏人，而不求實際但冀得一有名無實的虛銜頭，以便回國後在尊崇虛榮的社會裏混的也所在多有。所以我們雖不能作一概抹煞之論，但社會對於人材須求其實際，而不可獎勵憑藉虛銜頭以自欺欺人的風氣，這是可以斷言的。而且就是在這裏面真正用功的朋友，在國外所學的多屬外國的材料，到本國後還須注意本國的材料，作繼續不斷的研究，對於本國的社會才能有真正切實的貢獻，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在未出國留學以前，宜先有比較充分的準備。有某君到了法國之後，進中學不願意——其實能否考得進去，還是有問題——進大學又够不上，於是天天吃飽飯後就跑到彈子房裏去打彈子，連打幾年，也算留學，一時傳為笑柄，這雖是絕端的例子，但在文字工具和基本知識方面沒有相當的準備而即貿貿然出外留學，這樣的不經濟，確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法國的高等學府當然以巴黎大學為巨擘，各省的國立大學，學生也不過數千人，而巴黎大學的學生特多，據該大學所發表的前年統計，學生人數共達三萬人之多（確數為二九七四二人），其中本國學生兩萬一千四百六十七人，男生佔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七人，女生佔五千七百八十八人，可注意之點是女生人數佔男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外國學生八千二百七十五人，幾佔全體學生三分之一，其中男生五千八百零四人，女生兩千四百七十一人，女生佔全體外國學生三分之一強，最近因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外人

來留學的銳減，全體學生人數已減少五千人左右，其中文科約佔六七千人，法科約八千人，理科三千餘人，醫科五六千人，藥科一二千人，他們學文法科的人也比學理科的人多，這也是可以注意的一點，聽說他們本國畢業生的出路，以學理科的較易，因為人數少，供需還相去不遠。

在舊社會制度下，高等教育的資本主義化，固然是顯著的事實，而且這樣下去，在受此種教育者的本身，也一天一天的增加恐慌，也可以說是日趨沒落，日向窮途末路上跑，因為在現社會裏這種『商品』的生產過剩，到了後來連賤賣都賣不出去！在中國，大學生畢業每年整百整千的出來，而社會上天天鬧着不景氣，從前有人罵大學生不肯做小事，現在有的甚至連小事都沒得做，這種危象的日趨緊張，稍稍留心中國社會現狀的人都能知道的，在法國，他們的情形，當然不及我們的緊張，但據記者從多方面的探查，大學畢業生的『位置荒』，也漸露着端倪了。得着『碩士』銜頭而無事可做，只得做汽車夫的已不乏其人，這比之日本的大學畢業生有的只得幹倒垃圾桶的事業，固似乎勝一籌，但在素以歐美各國中猶得以『繁榮』自傲的法蘭西，也漸有捉襟見肘的窘態了。

廿二九、廿四、記於巴黎、

在法的青田人

關於在歐洲的我國的浙江青田人，記者在瑞士所發的通訊裏，已略有談及，到法後所知道的情形更比較地詳細，這班可憐蟲的含辛茹苦的能力，頗足以代表中國人的特性的特徵！而眼光淺近，處於侮辱和可憐的地位，其情形也不亞於一般的中國人，我每想到這幾點，便不禁發生無限的悲感。

據熟悉青田人到歐『掌故』的朋友談起，最初約在前清光緒末年，有青田人某甲因窮苦不堪，（青田縣為浙江最苦的一個區域，人民多搬運米飯都沒得吃，）忽異想天開，帶着一擔青田所僅有的特產青田石，由溫州海口而飄流至上海，想賺到幾個錢以維持生活，結果很不得意。不知怎的竟得由上海飄流到歐洲來，便在初到的埠頭上的道路旁，把所帶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色式的東西排列出來，歐人看見這樣從未看見過的東西，有的也被喚起了好奇心，問他多少價錢，某甲對外國話當然是一竅不通，只舉出幾個手指來示意，這就含混得厲害了！有時舉出兩個手指來，在他也許是要索價兩毛錢，而阿木林的外國人也許就給他兩塊錢，這樣一來，他便不久發了小財，這個消息漸漸地傳到了他的本鄉，說貧無立錫之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發了洋財了，於是陸續冒險出洋的漸多起來，不到十年，竟布滿了全歐！最多的時候有三四萬人，現在也還有兩萬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近兩千人，洋鬼子最初雖不注意青田石的這項生意，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滲進來的，沒有什麼捐稅，我國的青田人才得從中取些小利，後來漸漸知道源源而來，便加上捐稅，聽天由命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的生意經便告中斷，但人却來了，自開回中國去還更苦，於是便以各種各色的小販為生。他們生活的儉苦，實在是歐洲人所莫明其妙，認為是非人類所辦得到的！現在巴黎的里昂車站（Gare de Lyon）的附近有幾條齷齪卑陋的小巷，便是他們叢集

之處，往往合租一個大房間，中間擺一張小桌子，其餘的地板上就是鋪滿着的地鋪，窮苦和醜陋在躲避之若蝮蝎，結果成了法國的『唐人街』，法國人想到中國人，便以這班窮苦醜陋過着非人生活的中國人做代表，有人怪這班鴉形鵝面的青田小販侮辱國體，但是我們平心而論，若國內不是有層出不窮的軍閥官僚縱橫勇猛的幹着『侮辱國體』的勾當，使民不聊生，情願千辛萬苦逃到海外，受盡他人的蹂躪侮辱，這班小百姓也何樂而爲此呢？他們這班小販這樣說：每日提箱奔跑叫賣，只須賺得到一個法郎（就法國說），就是等於中國的兩毛錢，每月即等於中國的六塊錢，倘能賺得到三個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元，這在他們本鄉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國，在他們這樣的人，也談何容易！所以他們情願受盡外人的踐踏侮辱，都飲泣吞聲的活着，因爲他們除此外更想不到什麼活路啊！

在巴黎的青田小販所以會聚集於里昂車站的附近，還有一個理由，因爲他們大多是由海船來的，由馬賽上岸到巴黎，這是必經的車站，這班人由中國出來，當然沒有充足的盤川，都是拚着命出來的，到了馬賽，往往腰包就要空了，盡其所有，乘車到里昂車站，到了之後是一個道地十足的光棍，空空如也，在馬路上東張西望，便先到的青田人（他們也有相當的組織）來招待他去暫住在青田人辦的小客棧裏，青田小販裏面也有發小財的（多的有二三萬家資），便僱用這種人去做小販，他便從中取利，所以在這極艱苦的事情裏面，也還不免有剝削制度的存在！這種小販教育程度當然無可言，不懂話（指當地的外國語），不識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規章，動輒被外國的警察驅逐毒打，他們受着痛苦，還莫名其妙！當然更說不到有誰出來說話，有誰出來保護！嗚呼！中國人！這是大馬不如的我們中國人啊！

這班青田人幹着牛馬的工作，過着大馬不如的非人的生活，但是人總是人，疲頓勞苦之後也不免想到鬆動的娛樂，巴黎是有名的供人娛樂的地方，但在這班小販同胞們，程度決够不上，無論咖啡館也

罷，跳舞場也罷，乃至公娼館也罷，他們決沒有膽量進去問津，於是他們裏面比較有錢的人便獨出心裁開辦賭場，打麻將，抽頭，精神上無出路的小販們便都聚精會神於賭博，白天做牛馬，夜裏便聚起來大賭而特賭，將血汗換得來的一些些金錢都貢獻給抽頭的老闆們！這幾個開賭場的老闆們腰包裏豐富了，便大玩其法國女人，一個人可包幾個女人玩，最後的結果是小販們千辛萬苦賺得的一些血汗錢仍這樣間接地奉還大法國西！

這班可憐蟲過的是不如大馬的生活，同時也是盲目的生活，無知的生活，往往因為極小的事情，彼此打得頭破血流！前幾個月裏有因賭博時五十生丁（約等於中國的一角錢）問題的極小事故，兩個人大打其架，不但打得頭破血流，竟把一個人打死了！法國警察發現了這個命案，當然要抓人，聽說這個「打手」在同鄉私店裏多方躲藏，至今尚未抓到。

這班青田人有的由海船不知費了多少手續偷來，有的甚至由西伯利亞那面走得來的，就好的意義說，這不能說他們沒有冒險的精神，更不能說他們沒有忍苦耐勞的精神，但是有這樣的精神而却始終不免於「犬馬」的地位，這裏面的根本原因何在，實在值得我們的深刻的思考。

廿一九、廿九、記於巴黎。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

英國報紙大概可分兩大類，一類是所謂『風行』的報紙，他們稱爲“National news papers”或“Popular press”，銷數比較地最大，却都是資本家的宣傳機關，都操縱在他們的手裏，這類『風行』的報紙最著名的要推『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和『每日傳知』(Daily Herald)，英報界十年來有高度的『托辣斯化』，在報界托辣斯裏面有『四巨頭』(“Big Four”)之稱，這『四巨頭』之手段最靈敏，聲勢最煥赫的要推比佛補魯克勳爵(Lord Beaverbrook 1879-)。從前提起英國報界的大王，大概沒有人不知道北巖勳爵(Lord Northcliffe 1865-1922)，現在英國報界最令人注意的便是這位比佛補魯克勳爵了，每日銷數達二百萬份的『每日快報』，他便是最大的股東，全受他的操縱，他極力主張『大英帝國』(“British Empire”)的鞏固，以便『大英帝國』的大資本家得盡量吸收殖民地的膏血！

每日傳知在表面上是工黨的機關報，但實際上却也受資本家的主宰！獨立工黨的國會議員某甲最近在衆議院裏會經當面揶揄背黨的麥克唐諾，說他現在已成爲『守舊派的心肝寶貝』(“The darling of the Tories”)，其實這個工黨機關報也變成了『資本家的心肝寶貝』了！原來這個報紙被『四巨頭』之一的英報界托辣斯大王奧立亞斯(J. S. E. Maiza)所組織的奧且公司(“Odham”)加入股子，佔該公司全部股份百分之五十一，工黨所組織的『職業組合總會』(“Trades Union Council”)佔全部股份百分之工黨四十九。資本家的手腕真厲害，就多這一股，有全權主持這報紙！所以這個報在表面上雖常發表些有關的新聞或言論，在實際則完全學『每日快報』的樣，特別注重“Sensation and scandal.”(『驚人消息與風流秘聞』)的社會新聞，迎合一般人喜欢看奸淫盜劫的心理，推廣銷數，大增廣告，賺的錢就往資本家

的腰包裏送！

這樣的報紙，資本的雄厚和贏利的多，其數量往往足以驚人，例如現由「四巨頭」之一的魯索默爾勳爵 (Lord Rothemann 1888) 所主持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北巖勳爵所創辦，每日銷數約達一百八十萬份左右。) 也是英國「風行」報紙之一，資本現值四百萬鎊，合八千四百萬元，八年來每年紅利分到百分之九七〇！試想這如果是社會化的機關，所得的錢不歸資本家而拿來辦有益大眾的事業，有益於大眾的福利怎樣的大！

講到英國報紙在言論上的勢力，却不在於這類所謂「風行」的報紙，而在於僅屬一部分人看的報紙，其中不僅在英國受人注意，並且在國際上也受着嚴重注意的，這要推「泰晤士報」和「孟却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泰晤士報」每期的銷數大概不過二十萬份左右，「孟却斯特導報」每期的銷數不過十五萬份左右。銷數多而言論勢力反不及銷數比較少的報紙，這似乎是一件很矛盾的現象，其實略加研究，却也有牠的原因，上面所說的那些專在「Sensation and scandal」的報紙，看的人根本就當作好玩，對牠們並不存有嚴重的態度；「泰晤士報」一類的報紙，却為那些雖屬少數而却是間接直接有關現在英國「統治階級」的人們所慣看，這「統治階級」在現狀之下既有左右時局的勢力，這些報紙的言論當然也隨着增加牠的勢力。這樣分析一下，這種言論代表什麼人的意識和利益，也可不言而喻了，(關於倫敦的「泰晤士報」，記者曾作較詳的考察；關於「孟却斯特導報」，記者也特由倫敦到孟却斯特作較詳的考察，牠們的奮鬥史却都頗有注意的價值。)

此外英國的共產黨發行有「每日工人」(「Daily Worker」)每日一張，據該報的廣告部主任自己說，每期僅銷四萬五千份，提倡社會主義的獨立工黨沒有日報，只出一種週刊，叫做新導報 (「New Ideas」)，銷數也有限，大概不過兩三萬。英國反革命勢力尚在頑強時期，可見一斑，第三國際在英國出

有英文的週刊叫『國際通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及半月刊叫『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可公開售賣。

最後記者要談幾句關於英報對中國的態度，除不是帝國主義喉舌的報紙外，不消說，對中國都存着輕視的態度——在這裏，『輕視』兩字已算是很輕很輕的字眼，試舉一例：上月有三個英國人，據說是在南昌號輪船上當機師的，在半莊附近被海盜綁票，回到倫敦後在各報大登新聞，最起勁的當然是『每日快報』，他們遇有中國東北的新聞，向來只有『滿洲國』的字樣，但遇着英國人在東北被海盜綁去，『中國』字樣似乎萬不可少，所以便在大標題上大寫『中國土匪』（"Chinese Bandits"），描寫海盜怎樣怎樣的殘忍，看報的人就把牠當作一般中國人的真實寫景！據載：最後還是靠日本軍隊把他們援救出來，這在他們並不覺得日帝國主義在東北不能禁止海盜打劫，反覺得中國要靠日本軍隊來援救肉票！登載了洋洋大文章還不够，還在該報的畫報上登着不少關於此事的照片，有兩張裏面是幾十個『中國土匪』被槍殺後縱橫散亂的臥在地上，又足見『中國土匪』之多，而中國人命之賤！（據說該肉票是用錢贖出的，『大文章』裏也未說有激戰。）怪不得記者屢次聽見英國的男女朋友老實的說，在他們未和中國人做朋友以前，見着中國人便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畏心，有的就老實把中國人當作『半野蠻』（"Half Savage"）看待。這不足怪！這是他們的報紙乃至一切出版物對華態度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

廿二、十一、九、倫敦。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

我們想起愛爾蘭，每要連帶想到這個老大民族七百年來繼續不斷地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鬪爭，尤其是在已往的兩個世紀裏，這部鬪爭史是用殷紅熱血寫成的，是無數戰士粉身碎骨造成的！這鬪爭現在還未完成，雖則是離了一個舊的階段，踏上了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仍在英勇地繼續努力於民族解放的鬪爭，我們不幸生在受帝國主義踐踏的中國的人們，對他們不禁湧着同情、興奮和慚愧的情緒。記者此次便懷着這樣的情緒，到愛爾蘭去了一趟。

在倫敦有位新交的好友張似旅君本來也想到愛爾蘭去看看，聽見記者有意去旅行，便約着同去，他由倫敦逕抵利物浦，於十二月一日夜裏十點鐘同山該處乘輪渡愛爾蘭海(High Sea)輪船雖小，但是有吸煙室，有大餐間，設備還算完整；房間很小，上下兩榻外，有一冷熱自來水白瓷臉盆。兩人一室，記者和張君便住在一個房間裏。我們先在大餐間裏買了一壺茶，談到十一點鐘後就寢，第二日晨八時到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Dublin)，我們都在都柏林雖僅僅就攔了四個整天，但可算是盡量利用着；一部分時間觀覽有歷史意味的勝蹟，一部分時間和幾家報館的主筆各政黨的主要人物談話，最後還去訪問了愛爾蘭自由邦(Free State)總統凡勒拉(Fahean De Valera)。張君真是一個很難得的旅伴，因為他與我非常好的好，一點不怕麻煩，有一家報館的主筆，我們一同去訪了四次才看到，他都是欣欣然沒有一個字的怨聲，尤其是尋訪各政黨中人談話的麻煩，像在我們到時正在受政府搜查的法西斯黨的機關，跑了好幾處才尋到，尋到了，據說已移到某秘密處所，由該機關用汽車把我們兩個人載着灣了許多圈子，才到了他們的秘密處所，我們兩人相視而笑，因為無緣無故大措他們的油，又如尋訪共產黨的機關，東查

西間，到貧民窟裡鑽了許久，居然也尋到了。張君不但不覺得我討厭，而且依他也非達到目的不肯甘休；這位朋友的不怕麻煩，不畏艱難的精神，尤其是他的那種欣欣然對付當前阻礙的態度，實在使我十分地佩服他，敬重他。

在都柏林所見的馬路的平坦，交通的便利，乃至男男女女的形貌，在表面上簡直分不出他們和英國人有什麼巽然的差異，但是一方面却是壓迫的民族，一方面却是被壓迫的民族，一方面一定要拉在大英帝國裡面，一方面却要千方百計地造成完全獨立的共和國。記者此次所要調查的，是他們所受的壓迫已減至何種程度，和他們要獲得完全自由平等的前途趨勢怎樣。愛爾蘭有兩千萬畝膏腴之地，氣候又宜於農業，英國統治階級對愛爾蘭的傳統關係，最主要的便在剝削愛爾蘭的農業富源。愛爾蘭被侵略後，土地被沒收，婦女孩童整批地被賣到西印度羣島去，英國人打死愛爾蘭人在法律上是無須償命的！當時那樣慘苦的情形，這是讀歷史的人都知道的。但是愛爾蘭人繼續不斷地反抗，前死後繼地鬪爭，英國真好像吞下了一枚炸彈，終不得高枕而臥。最後經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爭及以後的混戰遊擊，終於一九二一年的英愛條約，產生所謂愛爾蘭自由邦，有自己的國會，處理內政，行政首領對國會負責，但同時却有一個總督代表英皇，而國會議員又須宣誓盡忠英皇。可是據說現在這位代表英皇的總督，實際上已沒有人睬他，照例應呈他核准的律令也不送給他看，議員宣誓盡忠英皇的把戲也不照辦了。這樣說來，愛爾蘭在實際上是否已經完全獨立？現在他們所爭的什麼共和國，是否不過在名義上的問題呢？記者把這個問題提出問過好幾個他們的報館主筆，他們竟都承認是的。其實我們如作較深刻的研究，便知道不盡然。愛爾蘭的海軍根據地迄今仍在英國的掌握中，這是軍事上很顯赫的事實。再就愛爾蘭最重要的一個經濟問題（土地問題）而論，英政府為和緩愛爾蘭農民參加革命起見，特於一八八五年，一八九一年，一八九六年，及一九〇二年，屢次頒布所謂購地律（Land Purchase Act）准由政府發行公債給農民購地，

但是購地的農民須按年償還本利若干，稱爲『年金』(annuity)。這樣一來，至多不過把款給地主的佃租，改獻到資本家裏去，而在半餓狀態中過活的農民，還是依然故我！在一九三二年，愛爾蘭農民進貢給英國的這樣『年金』仍有三百萬金鎊之鉅。英國統治階級（主要的當然是資產階級）現在仍藉着『土地年金』和用進步的工業品（英國的，與落後的農業品（愛爾蘭的）的交換，由此盡量剝削愛爾蘭的農民。英國的資本主義盡量發展英國的生產，同時並盡量吮吸愛爾蘭農民的膏血，使愛爾蘭的工業永綴地落後。此外愛爾蘭的銀行制度，完全和英國發生連帶關係。一方面愛爾蘭的資產階級將剝削所得，投資於英帝國者，僅就南愛而論，就超過了二萬萬金鎊，所以爲維持他們的切身利益起見，仍願維持和英帝國的關係。現在愛爾蘭柯斯葛雷夫（William T. Cosgrave）所領導的法西斯運動，便是代表大資產階級，這大資產階級和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又有些不同，因爲多少和英帝國主義發生了連繫，所以他們是傾向和英國妥協的。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這般人當然是沒有份兒。凡勒拉所代表的是小資本家和中等階級，他們能負擔起這個使命嗎？這便是記者在上文所謂『前途趨勢怎樣』的問題，請容我在下篇談到凡勒拉時附帶地提出來談談。

二十三、一、十五、倫敦。

從愛爾蘭歸途中

記者偕張君於十二月五日夜裏離開都柏林，所乘的輪船於當夜八點鐘開，六日上午六點鐘到利物浦，張君因該處有美國友人約談，須稍作勾留，我獨自一人先由利物浦乘八點三十分鐘的火車回倫敦。離輪船時天剛漸漸黎明，於灰暗渺茫冷氣襲入中，提着衣箱乘輪船公司所備的公共汽車直達車站，於當日下午一點半鐘到倫敦。我暫時以倫敦爲「家」，所以這段經歷算是從愛爾蘭的歸途中。

在這歸途中，陸陸續續看完了一本英文的凡勒拉傳記。我覺得現在凡勒拉在實際上雖似乎漸成了過去時代的領袖人物，但是在他盡着使命的那個階段間，英勇赴義，浩然置生死於度外的激昂悲壯的犧牲精神，和每遇大難當前，都能處以冷靜鎮定的態度，也很足以使我們感到興奮，所以在此處不妨略談他的奮鬥生涯。

凡勒拉今年五十一歲了，他的父親，據說是西班牙的一個醫生，因做了政治犯而亡命到美國，他的母親是愛爾蘭人生長於美國的，他便在美國紐約產生。他產成才兩歲，便成了個孤兒。後來他的母親改嫁，把才三歲的他送到愛爾蘭她的兄弟——一個小農夫——處養育。這時愛爾蘭在一八八六年自治議案 (Home Rule Bill) 剛被英國國會否決，愛爾蘭自治的希望正在無限制的黑暗中，這三歲的凡勒拉便在這黑暗中隨中長大起來，應時代的要求，在那個階段的民族解放鬥爭中，擔起他的領袖的職責。但是他這領袖不是突然間從天空中掉下來的，讀他的歷史，便知道他這領袖是由實際鬥爭中——繼續不斷的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受過初等教育之後，考得大學公費，性喜算學。原想研究天文學。畢業後任算學教員，很得學生的崇敬，他們都說「凡勒拉先生教授算學的時候，算學不再是算學，却成了一件

令人快樂的東西！」這樣看來，他原來是個好教員，但是愛爾蘭國難的緊迫，不容許他繼續弄這件「令人快樂的東西」。一九一三年十月，負起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使命的新芬黨 (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 組織愛爾蘭義勇軍，私買軍械，對英國作實力鬥爭，這位「凡勒拉先生」慨然投粉筆而從戎，由課堂而兵房，用全副精神加入這個運動，不久即因戰績升任指揮官。這是距今二十年前的事情。在這兩年的（指在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爭以前）軍事的實際鬥爭中，也就好像受了兩年的實際軍事訓練。我們知道在一九一六年的革命戰爭裏面，凡勒拉的英勇血戰，震動了全世界，但是我們要注意，他並不是由課堂裏的算學教員，一躍而為兵房裏的指揮官，在此時以前還受了兩年的實際軍事訓練，換句話說，這個指揮官也是從實際的革命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在行動上表現他是個組織者，是個戰士，在每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危難，或是生死俄頃的關頭，他總是沈靜而勇敢。

他當時有了七個子女，一九一六年在都柏林革命起來的那一天，他受命統率百人（當時義勇軍全數不過千人），守一個要隘名叫博蘭彌爾斯 (Boland's Mills)。他先知妻子訣別，下決心作殊死戰，身先士卒，軍官對他說指揮責重，請他審慎些，他喊道：「已有比我好的人犧牲了生命的剎！」他還是拚死的向前作戰。英國大軍奔臨，凡勒拉的軍士以一敵二千，雖後來義勇軍全部以衆寡不敵而終於失敗，但英軍始終未曾衝破凡勒拉所守的陣地。他的死守博蘭彌爾斯是愛爾蘭一九一六年革命史中最光榮的一頁，好像我國翁照垣將軍和他的軍士死守吳淞一役是一二八抗日血戰史中最光榮的一頁。

當時六勢已去，他隨着若干革命領袖被捕入獄，在軍事法庭上很鎮定而尊嚴地聽受死刑的宣判。好幾個革命領袖都被今天槍決一個，明天槍決一個，死刑就要輪到他了。但是說也奇怪，反因為他是血戰最英勇的一人，死守到最後的一人，震動了英國全國的輿論，英國國會裏面也有人提出抗議，於是他的死刑宣判竟被臨時改為終身徒刑，但是當時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在獄中的「凡勒拉先生」的時候，他

正在看一本書，他的頭由書上仰起來靜聽了之後，對這個人道了一聲謝，仍很鎮定而靜默地繼續看他的書。他由課堂而兵房，現在由兵房而牢獄了。

他是當時若干革命領袖死着下來的一個，在牢獄裏還在計劃並主持外面的革命運動，同時暴露牢獄中對政治犯的虐待情形，一九一七年，英首相路易喬治正想運動美國加入世界大戰，並要召集愛爾蘭會議以求和平解決愛爾蘭問題，對這些使英國丟臉的事很感到棘手，所以無條件釋放一九一六年事變的政治犯，凡勒拉才同被放了出來。但後來他還好幾次被捕入獄。

我們承認在他盡着使命的那個階段內，他的確有過他的光榮的鬪爭史，但現在他似乎已漸成了過去時代的領袖人物，這理由我在上節裏已說過，不再贅述。

五日夜裏在船上吸烟室裏和張君談話的時候，他談起加拿大人對種族成見很深，兩年前他在美國有一位中國朋友當醫生的，娶了一個美婦，同往加拿大旅行，上船時移民廳官吏依向例要使白種和有色人種分成兩列問話，不許混合，這位朋友隨前聲明說：「I am her husband. She is my wife.」(「我是她的丈夫，她是我的妻子。」)這個官吏很沒有禮貌地扳着面孔說道：「I don't care whether husband or wife. I only look at your face!」(「我不管你是丈夫還是妻子。我只看你的面孔!」)我聽了很難過。我們可以想像此君當時的苦痛，但這豈僅是此君一人的苦痛!

廿三、一、二十、倫敦。

『巴立門』的母親』

英國在政治上向有『巴立門的母親』(Mother of Parliament)的尊稱。現在這位『母親』倘若不是『風燭殘年』，她老人家的光輝却已大不如前了。

所謂『巴立門』我們都知道就是英國的國會，包括上議院和下議院。記者到英國後，也去夾在新聞記者席上旁聽過，聽聽這班代議制度衰的議員老爺們的長篇累贅的滔滔辯論。在下議院裏，政府黨坐在一邊，和反對黨的一堆座位對面，中間隔一長桌。政府黨座位的前排便是首相和其他閣員的座位，各黨聽到自己方面演說或辯論的脚色聽到他們認為可以特別注意或特別有精彩的語句，便大呼其『聽啊！聽啊！』(Hear! Hear!) 遇到可笑的話語，便哄堂大笑。有的時候，竟好像彼此在『尋開心』！有的時候，反對黨的議員立起來對首相或某閣員當面作着很長的斥責，那個閣員也只得靜默地坐着傾聽，這種當閣員的大概也聽得慣了，我看他還是很泰然的樣子，大有我國所謂『笑罵由他笑罵』的態度。像已投降資產階級的現首相麥克唐納，便常在這個時候，被工黨議員用社會主義的口頭禪，當面對他譏嘲揶揄。我替他覺得怪難受，他却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其實這不過當面笑罵一場，笑罵完了，便算完結！議員領着他的年俸，首相或閣員則『好官我自爲之』。這便是他們所自豪的所謂『紳士式的戰爭』(“Gentlemanly warfare”)

這種『紳士式的戰爭』制度，在大戰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都是靠兩大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的運用，即所謂『兩黨制度』(“Two-party System”)。在當時的衆議院裏面誠然已有四黨的名稱，除保守和自由兩黨外，工黨已經萌芽，愛爾蘭國家主義派也另成一系，但都幼稚，大權仍在

兩大政黨之手。一個在朝便成了政府，一個在野便成了反對黨（“Opposition”）；這樣一升一降，循環幹着。這兩黨制度所以能順利進行着有個很大的前提，那便是彼此對於現存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質，有大量共同的立場。有了這樣的共同立場，甲政黨接替乙政黨組織政府，或改選一個新的國會，所移動的才不過比較屬於枝節的政策，才不致大大地把前任所通過或所執行的法令根本推翻，否則這甲乙兩黨便無法循環上下着輪流執政。再說得具體些，英國的保守和自由兩黨循環上下開了許多年的把戲，他們雖似乎處於敵對的地位，但根本上都是擁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關於這一點，便是他們的大量共同的立場，這兩大隊『紳士們』，無論他們在會場上的『紳士式的戰爭』幹得怎樣有聲有色，要想他們能從這『戰爭』中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及政治制度弄出什麼根本的改革來，那是絕對無望的。其實這所謂『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所以能够運用靈活，根本大前提便是：在這制度裏有左右政局勢力的最大多數人，對於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的根本組織，須有實際的同意。

這樣的研究，我們感到特殊興趣的，是英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能否憑藉『巴立門』制度達到，很可以由此引中出相當的結論來。這一個答復，很可以從英國工黨參加『紳士式的戰爭』的成績（？）裏面得到。

在大戰後，以全國的工會組織為後盾，以社會主義的建設為號召的英國工黨，曾經組閣過兩次，英國工人運動差不多經過百年來的辛勤奮鬥，工會組織的力量日漸強大，大戰後英國資本家因利潤率減退，盡力減低英國工人的生活標準，更引起工人的反響，工黨勢力的膨脹遂有一日千里之勢，但是工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之後，欲求實行自由黨所行的改良政策，如社會保險，養老金，住宅津貼等等，還不可得，至於什麼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更屬夢想。因為英國的資本主義雖還在利用『剩餘力量』（“remaining strength”）掙扎生存的時代，但是日漸衰退的趨向是已無可挽回的

了。所以在自由黨執政時代還可以拿出點數衍工人的改良政策的費用來，到了資本主義日陷末蹙的時候，首相或閣員要增加這類的經費嗎？他們的由文官考試制度出身的永久的專家官吏便要把手實告訴他們，說已無費可加了，如再加上，稅率加重，「企業家」不願辦「企業」，工人的失業更要多起來了。這的確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的趨勢。結果如何？是落得個笑話！工黨的領袖們不但不能實行他們在選舉前口聲聲答應工人群眾的許多甜蜜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工人謀利益等等的大話，他們上台之後，反而要設法減少自由黨所曾經給與工人的改良政策的經費，以維持日趨沒落的現制度！有人說工黨兩度執政，在國會裏都佔少數，事事須仰自由黨的鼻息，受其牽掣，所以無法發展。其實這還是表面的說法，在根本制度未改革前，工黨在國會即得多數，他們有點石成金之術，以救濟資本主義社會的根
本矛盾嗎？

要改革根本制度嗎？是否像現在組織形式的國會所通得過？這只要回想上面對「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的分析研究，便可得到相當的回答。即獲得個意外的特殊的眾議院，貴族院如何？英皇又如何？問題多着哩。

時代一天一天地前進着。「巴立門的母親」往何處去呢？

廿三、一、廿三、倫敦。

大規模的貧民窟

倫敦不能不算世界上一個大規模的城市，面積近七百萬方英里之廣，人口在七百五十萬人左右。荷蘭和威爾士的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都集中在倫敦。在這樣大規模集中的情況之下，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形色色，這種社會的內在的矛盾之尖銳化，都可以很明顯地從中看出來。在這樣大規模的繁華的城市裏，同時却也有了大規模的貧民窟，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矛盾的現象。

英國各大城市，都有北貧民窟（*Slum*），而以東倫敦的規模為最大。西倫敦（他們叫做“*West End*”）是最繁華潤綽的地方。最豪華的店鋪，皇族貴人的宮邸，布爾喬亞享樂的俱樂部，博物院，戲院，官署，公園，國會，西冥寺，以及最豪華的住宅區，都在這裏，所以在倫敦有人叫你開地址的時候，如你所開的地址是在“*West End*”，他們便認你這個人多少是過得去的。南倫敦和北倫敦的屬於工人住宅區的地方，也有貧民窟，但都不及東倫敦的規模宏大！

倫敦分為二十八區（*Borough*），各區裏面都有多少貧民窟點綴着，就是在所謂「皇家區」（*Pal. Borough*）裏面，也不免，不過在繁華富麗的地方看不大出。自倫敦中央起，迤東一帶各區，都可以看見幾於「清一色」的貧民窟生活，也是世界上任何城市裏勞動階級最集中的一個區域。記者曾費了一天的工夫去觀光。電車一開進了這個區域，就看見西倫敦所沒有的舊式燒煤的汽車在街上跑來跑去，上面有煙囪，噴出許多黑煙在街道上繞着；電車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穿着破舊的不整齊的衣服，顧不到什麼「君子人」的排場了；滿街旁的襤褸垢面的孩子，東奔西竄着。貧民窟的住宅，大都是建築於百年前的老屋，地板破爛，牆壁潮濕，破窗裂戶的空隙常有冷風繼續不斷的傳送進來；一所屋裏每住着幾十

家，一個小小的房間裏堆滿着許多人；英國是科學發達的國家，電燈應該是很普遍的了，但在這一帶窮人的住宅裏，還是用着油燈或點着蠟燭，如所住的是地室（basement），那就終年在黃昏中過日子。

據英國勞工調查所（“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這是由勞工團體組織的研究機關，不是政府設立的，）所調查的結果，在倫敦全家擁擠在這種地室裏（住在貧民住宅的地上和樓上的還不在內）過暗無天日生活的工人，至少在十萬人以上，據他們最近所調查的情形，「在倫敦貧民窟的地室，裏面既黑暗而又潮濕，糊在牆上的紙都潮濕着下墜懸搖着；老鼠和虱子非常的多；住在裏面的人很少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

因為擁擠的緣故，常有父母和好幾個成年的子女，甚且加上祖父母，同住一個小小的房間裏面。因為這種屋子裏的蟲鼠有各種各色的，既繁且多，每到夏季往往趕着整千的人把他們的牀拖到街上來，希望能夠略得些睡眠，但是遇着了警察，又須被趕到門裏去！

倫敦赫克納（Hackney）一區的醫官烏華雷（Dr. King Wary）調查該區貧民窟的擁擠情形，會有一詳細的報告，試就他所報告的事實隨便舉一個例：他說有個家屬共有六人，都住在一個小小的地室裏，這家屬裏面有十歲和四歲的男孩，十一歲和七歲的女孩，那個母親告訴他說，因為她無法使他們睡開，最大的兩個男女小孩曾經發生過「非禮的行為」（“indecent behaviour”）。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標準夜報（“Evening Standard”）所載東倫敦貧民窟的情形，裏面說起有個家屬住在地室裏已十九年了；除父母外；有四個女兒年齡自十三歲至二十一歲，兩個男孩，年齡一個六歲一個九歲，都住在一個地室裏，都要常往醫生處看病。

這樣「很少令人和疾病不發生關係的」貧民窟房屋，租錢在工人看來仍然是很貴的，普通每星期常需付到十五先令至二十先令，英國極少數數最高工資的工人每星期雖可得到六鎊以上的工資，但普通總在

二鎊左右，所以爲着房租差不多用去了一半，（這是世界大戰以後的情形，在以前平均只用去收入百分之十六至十七爲房租，）結果剩下的一些工資不够顧全家屬的衣食，父母子女往往在半餓狀態中過活。據各區醫官的統計報告，貧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兩倍，嬰孩死亡率更厲害，就是養得大的孩子，也多遺傳着所謂「貧民窟心理」（Slum mind）據說他們長大的行爲都使國家要增加警察和監獄的經費！

記者自去年十月到英國以來，聽他們在內政方面鬧得最起勁，視爲一件大事的，便是消除貧民窟運動，大呼「貧民窟是我們的恥辱」，衛生部大臣楊格爵士（Sir Hilton Young）定了一個消除貧民窟的五年計劃，據說要在五年內消除二十萬所貧民窟房屋，使一百萬人有新屋住（據各報說貧民窟的房屋遠逾此數，貧民窟的居民亦遠逾此數），而新屋的建造則仍希望以利益爲前提的私人企業家來辦，並不想到工人租用貧民窟的房屋已嫌其貴，更有何餘力來租用新屋！

其實貧民窟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部分的產物。貧民窟的人民那樣苦楚，而據統計所示，一九三一年倫敦的土地生意不下一萬二千萬英鎊，教會於一九三〇年在倫敦所收得的房租就達三十八萬鎊之多。土地的私有專利，房租的高抬，工人的貧窮，都一概不顧，只想如何如何叫工人從貧民窟裏搬到新屋裏去，便以爲這問題可以解決了，這真是在飢荒時代勸人吃肉糜的辦法！

二十三、一、三十一、倫敦。

英國教育的特點

依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治經濟，教育的不平等乃自然的狀況，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坐頭把交椅的英國，她的教育制度當然也不出這個範圍，英國人的特性是注重事實而不很講原理，她的教育制度便十足地表現着這個特性，全國的教育制度不是由什麼中央政府定好系統頒布執行的，却是由幾百年來，各地因實際上的需要，由教會機關，或公共團體，乃至個人，各自為政的辦理學校，逐漸雜湊而成現在的情形，就是現在中央政府設有教育部，（“Board of Education”英國中央政府各部都稱“Ministry”部長稱“Minister”，獨有教育部稱“Board”，部長稱“President”，這大概也是他們尊重已成的事實，）仍然僅立於『友誼地批平的顧問和協助者』的地位（“A friendly critic adviser and helper”）在經濟上對各校僅有酌量津貼的行爲，關於五歲至十四歲的義務教育（即強迫教育）的強迫執行，也由各地方（所謂『區』“borough”）所選舉的『區參事會』（“Sanctuary of County”）兼理，至於大學教育，全由私人機關主持，教育部簡直無權過問，這可算是各國教育行政上所沒有的特殊的現象。但教育行政上的現象雖有特殊，而依事實上所演成的所謂『雙軌制』的教育制度——一部分是有錢的人受的教育，一部分是窮人受的教育——也和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兩樣。當然，在他們還有很好聽的名詞，一種說是『爲領袖而設的學校』（“School for the leaders”）；還有一種說是『爲大眾而設的學校』（“School for the masses”），前一種是由嬰兒學校（Nursery school）而幼稚學校（Infant school），由幼稚學校而預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由預備學校而私立或受公家津貼的中學校，由這類中學校而升入老資格的大學校（如劍橋牛津之類），後一種便是從幼稚學校完畢後和第一種的分途，入所謂初級學校（Elementary

lawy. school)。夾有職業訓練；區立中學，也設有職業科；以及提早就業後可入的種種職業補習學校，這兩大類學校的分道揚鑣，不是以智能為標準，全以家世及財力為標準。所謂『領袖』教育，是養成維持現制度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的工具；所謂『大眾』教育，是養成供剝削的被統治階級。

從五歲到十四歲的強迫教育，是區立的，不取費的，如不入學，父母要被警察局請去依法受罰的，這應當是平等的了，其實也不然，因為有錢的人家仍要把子弟送入收費的私立學校，不和窮人一起的。這兩方面的教育仍有優劣之分。至於貴族式中學校，最著名的如所謂“Eton College”，每人每年要繳費四百鎊，每月每人合到華幣六百圓！非貴族或大財主的子弟，誰能進去？而這種學校的畢業生，將來不是 Sir（爵士），便是 Lord（勳爵），尤其可笑的是這校裏的學生平日在校，一天到晚，無論上課吃飯，都要穿大禮服，戴高禮帽，雖十幾歲的學生，都要這樣，以便養成貴族化的特性！記者曾親往該校參觀，一到該校門口，就看見校內外一羣一羣的具體而微的『大人物』，自十四五歲至十八九歲的男孩子，個個穿着大禮服，頂着高禮帽，臂下夾着一兩本書，跑來跑去，真是奇觀！有許多孩子長得實在美麗，紅潤柔滑細膩的皮膚，清秀煥發聰明的面貌。這不足怪！那樣養尊處優的小貴族，這一些模樣還養不出來嗎？

普及教育原是一件好事，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普及教育却有她的目的，第一是要得到工業上的效率，機器日益進步，運用機器的人，必須有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得到好的效率，做資本家的良好工具；第二是國防。毫無教育其蠢如豕的國民，不知愛國，不能替資本家向國外去搶市場，或替資本家保守已搶得的市場，必須有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了解『愛國』，（此處所謂愛國，當然不是指愛勞動者的國，是指愛資本家的國，換句話說，做資本家的工具而已。）這所謂『相當』，是恰倒可以受資產階級利用為限度，過此則非所許，所以在教育制度上也自然地表現着不平等的現象。固然，這種『一相情

「限制」仍有危險，因為智識程度原是很難隨意限制的，很難有絕對界限的，一般人民的智識程度略高起來，你也許壓不住，革命情緒也許隨着智識的漸高而俱高，這却是出於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們的苦心孤詣範圍之外的了。

英國學校每有若干獎金學額 (Scholarship) 之設，這辦法誠然可給與少數下層子弟的升學機會，但是這種不澈底的辦法，於勞動階級也許害多於利，因為把他們裏面比較優秀的分子被吸入於貴族化和資產階級化的高等教育裏面去，反而加入了他們的戰線！

最後請略談英國的大學教育，除關於他們所養成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現狀下所不矛盾之外，他們所培成的研究學術的風氣，却很有可取，這也許是英國和美國大學最大的一個異點，美國大學的 Assignment (由教授指定要看的書) 很多，小考大考頻繁，記書本還來不及，常弄到你頭昏腦脹，很少自由研究和思考的時間，(這是好多赴美留學的朋友感想)，英國大學每星期上學不過一二小時，使學生有充分自己研究和從容自由思考的時間，當然，這種充分研究的時間也要用得好，否則撒爛污朋友也可大撒其爛污，劔橋和牛津等大學都設有導師制 (Tutor system)，也許就出於防備撒爛污的辦法，因為既有導師時常督促詢問，撒爛污便容易被發覺的。

說起英國大學裏所行的導師制，記者會特為此事到牛津 (Oxford) 去了一個整天。除參觀牛津大學的幾個學院外，並和幾個擔任導師的教授或講師作詳細的談話，其要點也沒有什麼大巧妙，每個導師指定照顧學生幾個或十幾個，常常定期和學生作單獨或幾個聚會的談話，常用茶點的方式，每學期大概都請學生吃一頓飯，學生關於選擇科目，研究材料等問題，都從這種談話的機會和導師接觸，得到種種指導，這種導師制最大的優點，是於教室聽講之外，師生間多接觸和交換意見的機會，有的話在教室裏不便公開講的，在茶話會中便可揭開天窗說亮話，例如討論到某本著作，教授在課堂上也許不便過於暴

露其中的劣點，在私人談話裏面便可隨意批評，把牠大罵一頓。這種導師制的辦法當然有幾個條件，第一是教師的教書的鐘點很少，才能分出時間來和所指導的學生作從容不迫的談話；第二是教師要專任一校的教務，勿兼職他校，才有時間精神來盡導師的職責。此外我所注意的是學生和導師所討論的問題，有否關於學生個人的私事提出詢問，據牛津大學幾個導師的經驗，大概都屬於學識上的研究，關於個人私事的提出却是絕無僅有的，這在中國便有些不同，例如有學生對導師提出經濟困難問題，說學費繳不出來，我就感覺到導師無法可「導」了。

英國大學生除和導師時有談話接觸的機會外，同學間還有時常被彼此輪流請吃茶點談話的風氣，有的在自己房間裏請，有的在咖啡館裏請，有的還請教授或導師參加，在牛津大學的中國學生，有一個說他是最不善於交際的，但是每星期至少也收到一次吃茶的請帖。交際廣的學生，差不多天天有茶點吃，這種吃茶，注重的當然不在茶而在談話。中國俗語有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多和有學識經驗的人談話，確能獲得不少益處，不過常常請若干同學吃茶點，在窮學生也許受不了，他們大學裏男女同學，這請吃茶的風氣，也許是男女社交的一種好辦法。倫敦大學沒有導師制，但如該校名教授拉斯基係牛津大學出身，也不脫牛大風氣。每逢星期日下午，總請若干學生（多的時候有二三十個）到他的家裏吃茶，他坐在一張沙發的中間，他的夫人坐在一邊，他的女兒坐在另一邊，其餘學生有坐的，有立的，有靠的，圍成一堆，大談而特談，一談就是一下午，他的話常是滔滔不絕，你在那裏可常聽到在別處所聽不到的許多關於政治舞臺上，社會上，或學術界的遺聞軼事，笑話珍聞。

在英的中國留學生雖沒有確切的統計，估計約有四百人左右，雖不敢說沒有冒牌的留學生，（有某省的官費生某君領着官費不入學校，天天在房間裏坐着悲觀！）但大抵而論，因為英國大學很富於研究的風氣，所以都還有研究學術的精神，而且在英國各著名大學，每學科都有相當國際聞名的權威學者，

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也還能引起學生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和熱誠於不知不覺之中。

廿三·二·四·倫敦·

英國的華僑

據倫默氏 (C. F. Remer) 近著『外國在華投資』(『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一書，自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全世界的華僑竟有七百萬至九百萬！像歐洲的小國，最少的人口如安多拉 (Andorra，在法比邊境的小共和國)，全國人民只有五千人；又如蒙納可 (Monaco，在法國沿海地中海岸的小王國)，全國人民只有兩萬五千人；這姑不去說牠。像奧國 (Austria)，全國人民也只有七百萬人；像匈牙利 (Hungary)，全國人民也只有九百萬，依倫默氏所舉的華僑人數，簡直好像歐洲一國的人民在國外東奔西竄着！而且他們都沒有政府做後盾，這樣在海外自闢生路的僑胞的冒險的精神，苦悶的能力，不能不算為可以驚人的。中國每年入超，全靠僑胞匯款回國有些調劑，據倫默氏的統計，自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三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一萬五千萬圓；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三〇年間，華僑每年平均匯款回國達兩萬萬圓，華僑對祖國經濟上的關係，不可謂不重大，但是祖國當局者視華僑在若有若無之間，毫無協助的實際辦法，最近的趨勢是日在沒落之中，看上去只有日漸減少以至消滅的形勢，英國的華僑，也在這樣形勢的包圍中。

在十年前，旅英的華僑至少在一萬人以上，(聽說在世界大戰時達一萬五千人，) 但是最近已減到三千人左右了，在英的華僑，大多數在輪船上做水手或火夫，這種苦工作，在經濟繁榮時代的英國人多不願幹，所以肯吃苦的『柴納門』，要得到這樣的機會並不難，自世界經濟恐慌以後，英國船業受着很大的打擊，首先被裁的當然要輪到『柴納門』；而且就是可以維持的部分，僱主們也用英國人來代替『柴納門』，所以遺剩果僅存的三千人中，失業者已有三分之二了。

族英的華僑以倫敦和利物浦兩地爲最多，在利物浦的約有三百八十人，其中約一百八十人是水手和火夫，其餘除少數小商人外（開雜貨店），多業洗衣作，在前面利物浦一節中已略有述及；在倫敦的約有四百五十餘人，可算是在英華僑的大本營，其中有二百人是水手和火夫，失業者已達一百五十人；在中國菜館（倫敦有四家）做廚子或侍者等有百人左右，在英國菜館當廚子侍者等，原也有百人，現在失業的也有四十人了；此外在東倫敦開小商店做中國人生意的約有五十人。

東倫敦是英國的一個大規模的貧民窟，記者在上面曾經談過了，在倫敦的所謂『中國城』（*China Town*）便和東倫敦結不解緣，其實無所謂『中國城』，不過在那一帶的有幾條街裏面中國人特別多些罷了，記者到東倫敦去觀光時，也到僑胞聚集的區域去看看，差不多都是廣東人，最顯著的是中國藥材舖，中國雜貨店，裏面有種種中國的土貨，做的當然都是中國人的生意，所以生意的規模永遠不會宏大的。有的小店玻璃門上貼着中國字條，上面有的寫着『內進買難』，有的寫着『入內銀牌』，有的寫着『內便開皮』，我起初莫明其妙，後來詢問有的在店門口站着的僑胞，才知道就是賭攤，請你『內便』賭博！我自居於新聞記者的資格，到一處推着門『內便』去看看，果然看見一個很髒的小房間裏，堆着一羣僑胞在那裏津津有味地幹他們的『開皮』，有幾個塌鼻頭的奇相，有幾個烟容滿面的鬼相，我對着他們發怔，發呆，他們看見我那副模樣，大概知道是從祖國來的，很客氣地對我點一點頭，又回轉頭聚精會神於他們的『開皮』了，我出來時抽了一口冷氣，心裏暗想，倘若外國電影公司又想攝些使中國人丟臉的把戲，這豈不又是一幕現成的佈景嗎？

到了一家中國雜貨店裏面去看看，那位『老鄉』影計倒很像樣，但是他只會說廣東話，英語也不大懂，我們很熱烈地做了半天手勢，還是悶着肚子握別！我只道他的大意是說市面很不興，生意難做。在街上遇着幾個中英合種的男女孩童，從四五歲到十一二歲，覺得他們都長得很美麗，和他們談談

都和高潔，可愛得很。華僑冒險溜往海外，都不能帶妻子，所以有三分之一都娶了英婦。尤其是當歐
界大戰時，華僑有機會和英國女子同處工作，因有接觸的機會，她們覺得平日聽得可怕的中國人倒也不
怎樣壞，因感情日洽而嫁給中國人的不少。這樣溜到海外的僑胞，往往一字不識，英文更說不清楚，嫁
給他們的英國女子雖也出身下層，但都能寫字看報，因此養出的合種子女，往往和母親感情特別好，看
不起父親，尤其看見有些不肖的父親，自己失了業，靠着老婆辛苦出去做工養家，還要拿錢出去賭博。
這類中英合種的孩子，在倫敦已有二百上下，不但相貌好（雖然也有極少的例外，尤其在女子方
面），而且非常聰明，據一位熱心華僑子女教育的英國朋友告訴我，英國小學生的畢業成績夠得上免費
升學額者只有百分之二十，而華僑小學生得此資格者竟佔百分之四十二，可是因為家境困難，雖免費而
仍須自供膳宿，不得不輟學的很多，真是憾事。

這種原來聰明的孩子，因家庭環境之欠佳，已經吃虧，又難於升學，所以很難和英國人競爭；就是
有幸而升入中學畢業的，成績受師長賞識，畢業後承師長介紹職業，僱主也每以中英合種的緣故，加以
歧視，拒絕錄用，這種合種的孩子真不幸，不但在職業上受這樣的歧視，就是在一般社會上的地位也很
困難，因為英國人對於種族成見仍然很深，都看他們不起，這原因在骨子裏當然是由於中國人根本就受
人看不起，就是嫁給華僑的英婦，也往往受她們本國人的輕視。她們氣時也會說氣話，說「我不做英國
人！我既嫁給中國人便是中國人了！」

留學生中有些熱心的朋友，靠公使館學生會等處出些捐款，開辦中華學校，在夜裏以中文教這些合
種的孩子，已開辦了三年，中國文字真難學，這些孩子白天要進英國學校，夜裏又要來吃這樣的苦頭，
讀了許多時候，僅能寫自己的中文名字，能說「你好嗎？」，有的雖能照樣抄寫中國字，但是讀不出！
華僑的職業總不外乎洗衣服燒小茶等事。關於洗衣業，因為英國人有了大規模的公司組織，利用機

器，華僑的洗衣業亦日在退縮之中，有減無加，更說不到什麼發展。華僑中開菜館的已算是頂括括的潤人了！東倫敦華僑裏面有一位名叫張朝的，在倫敦開了三十年的菜館，現在算是東倫敦華僑的『拿摩溫』的領袖！

廿三、二、五、倫敦。

記者自今年（一九三四）二月七日把關於英國的『寄語』結束之後，這兩個多月以來，『萍踪』又由德而動，由英而法，由法而荷，由荷而德，拿筆續寫這篇『寄語』時，已由德國回到出發點的倫敦了，我現在的職責就是要陸續把這兩個多月來的閱見和感想，報告給『生活週刊』的讀者和朋友們。（記者記此時，雖已很痛心地知道『生活週刊』被迫停刊了，但我深信『生活週刊』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的，因為地所反映的大眾的意志和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消滅的。）

巴黎為記者舊遊之地，關於法國的情形，也已略有所述，此次由倫敦出發，注重考察德國，順便看看附近的比利時和荷蘭兩國，但因為有幾年在法的『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上次到法時，忽忽未及晤談，堅囑再過到巴黎住幾天，在我也因為上次因要趕赴倫敦大學開學的日子，關於巴黎還有幾處要看看而未及看的地方，加以正在我想去的時候，巴黎剛在史達維斯基（Stavisky）大弊案發現後，政潮洶湧，鬧得烏煙瘴氣的當兒，新聞記者是要管閒事的，也想藉此機會去瞧瞧向佔歐洲所謂『民主政治』第二把交椅的法國。

法國的鬧潮，向來是有名於世的，自世界大戰到最近杜美格（Doumergue）在大擾亂中起來組閣為止，不到二十年，已有了三十一次的內閣，有的內閣成立幾天就短命，有的團成立就倒，但雖起來倒去，而政策卻差不多，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尤顯著的是對外的政策。政黨雖有左右派之稱，左派最大的黨是所謂激進社會黨（Radical Socialist Party），其實既不『激進』，也和什麼『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是這地十足的一個布爾喬亞（Bourgeois）的大集團，所以翻來覆去，都不外那一套『換湯不換

「藥」的玩意兒！史達維斯基的大賄案，和這次內閣及衆議院的大坍台，固爲所謂「民主政治」者多露一次破綻，加上一道催命符。但政權既仍在布爾喬亞的手裏，雖一時鬧得怪好看，根本也就不過那麼一回毒罷了。

在這次政潮中，有兩件小事頗堪發噱，一件是法國行動黨 (Action Française 即保皇黨) 的機關報對曾任外交部長的彭貝要人彭古 (Paul Doumer) 大開玩笑，彭古本屬社會黨，後來因爲和激進社會黨的領袖赫利歐 (Herriot) 合作，遂脫黨，據他說曾經做過史達維斯基的嬌妻愛勒特 (Ariette Simon) 的律師，非常要好，甚至說她有過什麼特殊的關係，自從這個大賄案發生之後，法國保皇黨的機關報每在新聞裏常提到彭古名字的時候，總把愛勒特加在彭古的名字裏面。成爲 Paul-Ariette-Doumer！竟把他的尊姓大名這樣地改造了。

還有一件事是這樣：這次法國政潮弄得滿城風雨，在街道上打得頭破血流，前總統杜美格退隱在鄉間裏，被現任總統強請出來組閣，他已是八十多歲的老翁了；在這個時候比國國王亞爾培 (Albert 1875-1934) 飽山跌死，他的兒子利阿波第三 (Leopold III) 隨即承繼王位，法國的保皇黨看了在機關報上大放厥辭，說這種制度多麼好，嗣王年青存爲，承繼王位的手續又省，何必像法國還要那樣跑到鄉間去拉出一個快要死的老頭兒來，多麼費事，中國話有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人的見解，往往很容易受到他的背景所蒙蔽，這樣的情形被保皇黨看見了，便認爲他們所以要「保皇」的十足的理由！

這次再到巴黎，補看了好幾個地方，現在撮述一二，附記在這裏，一處是衆議院 (Chambre des Deputes)。這室面的情形，和在倫敦所見的衆議院似乎不同。英國的衆議院的議廳是長方形的。議員座位是同置在一側平的地板上；法國的衆議院的議廳却是半圓形，議員的座位是一排高一排，半圓形地排在議長席的前面，建築似乎比英國的宏麗。尤不同的是他們開會時的情形，在英國的衆議院開會的時候

談到此較好，一人說話未完時，別人很少起來插嘴，誰到得意時，本黨的人也不過附和急叫“Ooh! Hear! Hear!”罷了，記者曾在該處旁聽了一小時之久，所見都是如此；在法國衆議院裏所見的却有些不同，我在四月廿日那天下午五點鐘前十分到那裏，五點鐘起開始開會，五點四十分即閉會，簡直是四十分鐘繼續不斷的一場大吵鬧，本黨人發言，本黨的議員大鼓其掌，反對黨議員便同時你一句我一句插着大聲喧鬧，此時最難做的是議長，拿着一個戒尺在桌旁打着，不行，就大搖桌上的鐘，（這鐘的聲音，好像救火車在馬路上變過時的鐘聲一樣，）有時可因此略停數分鐘吵鬧；不久又鬧做一團；有時連這幾分鐘的救臉都沒有，議長好像氣得發昏的樣子，只得儘他們提高嗓子大鬧着，待其自然的停止，不久又鬧了起來！據久在法國的朋友說，衆議院裏這樣鬧做一團的情形是常事，有時大鬧不停，議長無可如何，只得暫時退席以避之，因為議長走了，會議便等於暫停，大家得隨意離席，暫作鳥獸散，鬧的人也就鬧無可鬧！那天所議的是通過財政預算原則案，政府派希聖大體通過，反政府派主張須逐項付議，結果是政府派佔了勝利，那天旁聽席上的人很多，大家看着那樣鬧得不亦樂乎的樣子，都忍俊不住的大笑，這全部分的四十分鐘，就沒有一刻不在這樣吵着叫着鬧着笑着裏面過去，我出了衆議院的門口，還獨自一人對自己發笑着。

在倫敦和巴黎都各有一個蠟人館，在倫敦的稱爲杜索夫人的展覽會（Madame Tussauds' Exhibition）在巴黎的稱爲格雷溫博物院（Musée Grévin）。（都是以創辦者的名字爲名。）所謂蠟人者，並不是全身都用蠟做的人像，却是用蠟世的人頭，入手，裝在穿着真的衣服的身體上，（這身體當然也是造成的。）就是面上的眼毛或鬍子，頭上的頭髮，也和真的一樣，人身的大小和真的人一樣，所以看的人隨身其間，竟好像鑽進了人叢中，其中有的是現在還生存着的，有的是剛死的，有的是死去多時的了，好像古今生死同聚一堂！各國歷史上及現代最著名的人物大概都有，例如美國有名的總統，就有幾十個躋在

一處，有坐的，有立的。此外如文學家，藝術家，飛行家，電影明星，乃至運動健將，如網球健將之類也有，尤有歷史意味和價值的，是若干歷史史上引人注意的事件，例如拿破崙臨終，羅蘭夫人受審等等的聖潔人物布景，用各色電燈陪襯，令人如身臨其境。倫敦的比巴黎的好，在倫敦的蠟人館裏，還在地窖裏布置許多被監禁或判決的著名犯人，陰氣逼人，如遊陰間，（這是想像之辭，並非記者相信有陰間，更未曾遊過陰間。）在入口處，就有一個殺了頭的人身，旁立着迎接你！在第二個門口上，旁邊有個穿制服的青年閉眼坐着，看上去和別的蠟人一樣，人家都不以為異，等圍看的人路多，那個人忽然立起來，弄得大家驚嚇一跳！裏面有個「雅片窟」，布置着一個拖辮子的中國人服侍兩個英國水兵吃鴉片，那個中國人只有一根辮子，和短衫褲子算是他的特徵，那個面孔仍是西洋人的面孔，但在這樣富有民衆教育意味的機關，替中國人丟臉也就够了！從前有位朋友滄波在他所著的「倫敦閒話」一文裏（見生活書店出版的「深刻的印象」一書），曾提及該館裏關於中國名人的像，就只在一個屋角裏看見被稱爲「廣東的省長」，「型像面色特別黃黑」的中山先生，我去看時，已找不到，大概他們把「廣東的省長」都取消了！留下來的就只有那位拖着辮子服侍兩個英國水兵吃鴉片的仁兄！在巴黎的蠟人館裏，關於中國的只有一幕所謂「中日之戰」，是日本人打長城的布景，其中中國長城上竟闕無一人，不知道他們是否認爲這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象徵！

我從另一方面想，我們自己倘能設立一個蠟人館，却很有民衆教育的價值，至少可將歷來爲革命而犧牲的許多烈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慷慨起義，臨危授命的種種慘狀，把牠們好好的佈置起來，使人常常想到許多烈士的慘痛犧牲，現在所換得是什麼？尤希望那般拿革命做幌子而第著極惡無惡不作的高官顯要們能有看到的機會！

關於巴黎的「玻璃房子」，以前不過聽人談起，還沒有工夫去看，這次再到巴黎，也抽暇去參觀一

下。我和一位朋友在一個夜裏去看，到後照例叫了兩杯酒，和那女傭坐在一個桌旁，有幾十個赤身裸體的女子來周旋，有一個挨到我的身上來做盡醜態，勸『開房間』，她——可憐的她——此時眼中所看的是法郎，心裏所想的是法郎，無所不可的都是爲着法郎！到了這樣情況之下，什麼美的觀念都沒有了，我和那位朋友坐了不到五分鐘，連酒都沒有喝，就忽忽離開了這『人間地獄』。

一九三四、五、三、記於倫敦。

比利時是在歐洲經過戰爭最多的一個地方，滑鐵爐（Waterloo）之戰，也是這許多戰爭裏面最著名的一個，記者曾於三月廿三日午後，和寄寒伧僮同往滑鐵爐一遊，整整費了一個半天的工夫，滑鐵爐是一個居民僅有四千人左右的小村，在比京布魯塞爾之南十一英里，由布魯塞爾去，乘一小時的電車可達。在一八一五年的六月，這是英將威靈頓（Wellington）駐紮抗戰拿破崙的地點，拿氏以神出鬼沒的戰術，懷囊括全歐的野心，幾於所向無敵，最後經滑鐵爐一敗，真是中國話所謂「一敗塗地」，皇帝沒得做，關到聖曠倫那（St. Helena）島上去，五年後便以一死了之。在當年六月十八日那天交戰的處所，就在這滑鐵爐村上一個小墩名叫Bougmont的上面開始，現在僅是一個農場，設有一個陳列館，陳列關於該次戰爭的遺物；在樓上有個圓形的大畫室，却很別緻，中間一個大亭，亭的周圍有圍欄，圍欄外面離七八丈的周圍，便掛着高十餘丈的大油畫，圍着這個亭子，油畫的內容是描寫當時聯軍和拿破崙軍隊交戰的情形，油畫的下面和亭外的空地接連，在地上使用真草，真茅屋，以及逼真的人馬槍砲等等的模型布置着，油畫的上面是畫着蔚藍的天空，和亭子上面接連着，全部用電燈欄托出來，使看的人從亭子裏看出來，好像身臨戰地似的。除這個陳列館外，還有一個紀念此次戰事的人造的獅子山（Mont de la lie），這山是比利時於一八二三年及二六年間造成的，山高約一百五十尺，周圍約一千七百尺，頂上中間有個鐵鑄的大獅子，二十四噸重，從山下可由二百廿六級的石級登到獅子的座子，座子周圍及石級兩旁都有鉄欄杆圍着，我們三個人都戴着勇氣爬到最高頂去望遠了一番，這附近的四圍便是數十萬大軍搏戰之地，便是叱咤風雲一世之雄的拿破崙大吃敗仗的所在！天已漸漸地陰暗起來，匆匆下山回來，在電

車裏已是萬家燈火了！

看到這個戰地，使我回想到歷史上關於此役有件趣事，那便是拿破崙自信必勝，唯恐威靈頓乘夜不戰先逃！在六月十七日（一八一五年）的那個夜裏，威靈頓拿破崙的兩方軍隊都駐紮滑鐵爐等天明交戰。拿破崙把勝仗拿得十穩，深恐威靈頓在當夜乘黑暗中逃走，特於這個夜裏——已經半夜了！——離開他的居屋，只帶着柏塔那大將，(Marshall Balthard)一人相隨，步行走出他的禁衛線，竟大膽地走到威靈頓駐紮地的前面，周圍的叢樹附近。這已是夜裏兩點鐘了，拿破崙在萬籟俱寂中傾聽，忽然聽見有一隊敵兵在黑暗中的步伐聲，他想這一定是威靈頓乘夜裏黑暗中拔營，這一營大概是他的最後的衛隊了！他此時絕對夢想不到第二天威靈頓的軍隊會那樣的死抗不退，雖以拿破崙的將才，一有輕敵之心，也免不了大吃敗仗，這倒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

記者於三月廿四日的上午費了半天的工夫去參觀比國一個文化中心的魯文，有『比利時的牛津』(The Oxford of Belgium)之稱，由比京乘火車去，不及一小時即到，魯文是屬於比利時的卜拉邦(Brabant)省的一個城鎮，居民約有四萬餘人，而在該處的魯文大學的學生却有五千人左右，所以滿街隨處可以碰到男女大學生，他們或她們雖穿常服，却都戴有不一樣的制帽，各科各級的學生，都各有其特殊顏色和標誌的制帽，使人一望而知，有的制帽像我們所常見的睡帽一樣，各學生同時是什麼學會或團體的會員，還把許多金的或銀的五花八門的徽章插在帽上的周圍，很特別。該校雖男女同學，向例男同學和女同學不得兩個人(即僅僅一男一女)在街上同行，否則一被學校當局看見，即須傳去問話，麻煩得很，所以在街上確看不見有這樣的現象，頑固習俗可笑，究竟不知道有什麼充分的理由！該校以醫工較著名，中國留學生有二十餘人，前『大晚報』的記者張若谷君也在該校肄業，記者到後，承他引導參觀，魯文街上極少車輛，清靜安逸，與布魯塞爾不同。著名建築有五百年歷史的市政廳，宏麗的教堂，

和大規模的圖書館等，當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該城被德軍佔據，有意放火焚燒，連燒三天，燒毀了一千多屋子，存有十五萬卷以上著名的圖書館也遭了這個浩劫，大戰結束後，屋子已大多數重建，圖書館也重建了（大半出於美國人的捐款）。在德軍佔比境時，比國當局只想到死抗暴敵，並未會想到一面準備不抵抗，一面把這些寶藏搬到別處去，這大概因為他們深知國土一塊一塊地被暴敵佔去，國且不國，搬移寶藏何用！況且他們沒有不平等條約的妙用，沒有什麼租界可供移藏寶物，這也是比不上我們的！

比利時雖小，最有名的報紙，也有八九種之多，以晚報（The Sun）為最盛，印刷精美，插圖尤佳，聽說銷數每日近百萬，該報雖號稱『晚報』，每日出版四次，每次遇有重要新聞，即加以補充，第一次約在下午三點半，第二次下午六點半，第三次夜裏九點半，第四次半夜，便須在第二晨售賣了，故實際已包辦了全日的新聞，至於各報對中國的態度，也學着帝國主義的大國的模樣，尤其是學着英法報紙的常態，那就是不登中國的消息則已，一登總是丟臉的消息居多！不過仔細想來，這也不能盡怪別人，因為我們自己，尤其是負政治上責任的人，先要問一問我們自己是不是丟臉，先要問一問我們自己幹了什麼不致丟臉的事情！

最後請談談在比的中國人，在比國的中國學生約有二百餘人，在恩特瓦栢（Antwerp）當水手的有百餘人，青田小販來來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不久以前有駐西班牙的某比領受賄濫給護照，我國的青田小販因納賄而溜入比境者不少，後來這個領事的舞弊情形被比政府發現，革職查辦，青田小販被連累的都被驅逐出境。在這些腦子簡單的青田小販們，認為化了錢得到了護照，有什麼錯處，故常到中國使館請辦交涉，而中國使館則以此事在比政府認為違法行為，無法可想，在法律上收賄者固被認為有罪，納賄者也不是查皇的事情，弄得很僵，況且做的是中國人，除準備着被驅出境的分兒外，更有什麼話可

說？

講到在比的中國青田小販，去年八九月間却發生了一件趣事，是三個青田小販同住一個比國人的家裏，那家房東有三個女兒，正好配上了這三位青田小販，都發生了關係，其中有一個女兒年齡還在十六歲以下。於是她們的父親在法院提出訴訟，控告他們，但是房東太太以她的這個丈夫在外面有了一個姘頭，平日不但不住在家裏，而且還經濟於不顧，還是這三位青田仁兄常常接濟她的家用，所以到開庭審判的那一天，這位非正式的文母娘在法庭上大帶這三個青田小販！那天觀審的很多，中國使館也派有人去旁聽，那位房東太太當着大眾，對法官口若懸河地大講她的一大篇大道理！她歷數丈夫種種不顧家庭的罪狀，極力讚揚這三個中國人如何的好！法官問問那三個女兒，也都說母親的話不錯，並且都表示願嫁給這三個中國人，結果那個父親大吃癩，那三位禍中得福喜出望外的青田仁兄各擁着嬌妻，凱旋而回！這個案件，比國的報上隻字不登，因為如把那位『文母娘』的『中比人的優劣論』那一篇大文章發表出來，在他們當認爲是和比國人的體面有關係的。

還有一件事，在布魯塞爾的大規模的理髮店裏，請了兩位中國的打脚專家；我們中國洗澡堂的打脚的情形，想讀者諸君都知道的，兩位打脚專家因爲來修脚的多屬舞女，享盡豔福，每月各有三五千佛郎的收入，一位娶了法女爲妻，二位娶了比女爲妻。中國人在歐的著名的職業，一爲洗衣，一爲燒菜（開飯館），現在大概要加上了打脚！在巴黎時，有的法國朋友說，你們中國人的菜當然好吃，因爲你們有了五千年的文明，燒菜的研究也有了五千年的歷史了！現在出了打脚專家，不知和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什麼關係沒有！

比國人對中國的態度，講到政治的方面，比國外交向來是親法的，惟法馬首是瞻，法在外交上對中國的態度既不佳，比也可想而知，例如中日事件發生後，比政府的態度即偏袒日本，講到一般民衆方

面，可以說大多數對中國完全莫明其妙，大概看到青田小販，便認爲是中國人的代表，對於中國女子的印象，每以爲仍是小脚，穿着他們在博物館裏所見的那種小脚鞋。（寄寒的夫人生得娟秀，在比外交界便很出風頭，報上把她的相片登出來，即每有出門，街上行人都要特別注意她，也可以說稍稍替中國女子爭得一點面子，至少使他們知道中國的女子和他們殖民地博物館裏所陳列的剛果女子究竟不同！）不過他們裏面有一部分人因爲本國無所不小，而覺得中國則那麼大得嚇人；講面積，一來就是四五百萬方英里，（比國面積只一萬餘方英里；）講人口，一來就是四五萬萬人（比國人口只八百萬人！）但是中國那麼大，人又那麼多，而却又那麼無用——至少在現狀之下——大概他們不免更覺得詫異罷！

一九三四、五、二四、倫敦。

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

記者自英倫起程以來，天天遇着的都是晴朗氣候，而三月二十六日那天却是在大雨滂沱中，靜悄悄地一人離開了比京布魯塞爾，乘着十二點五十分的火車，往荷京海牙進發。當天下午三點三刻到海牙，到的時候却太陽當空，晴光四射，我因在荷蘭沒有什麼熟友，便挾着兩個小衣箱，叫一輛汽車直駛中國使館。一坐入汽車，第一印象便是整潔，向汽車的玻璃窗外看看，第一印象也是整潔。那輛汽車是街上零租的野鷄汽車，但是汽車外面却油漆一新，揩擦得乾乾淨淨，裏面的絨墊以及車旁的絨墊，都是很新很清潔的，這種汽車，在上海只能在私人自備的汽車中看得見的；再望望前面坐着的汽車夫，穿着黑呢的剪裁合身的制服，戴着黑呢的軍帽，頭髮和鬍子都很整齊，儼然好像是個軍官似的。我最初以為我也許是碰巧乘着這樣的汽車，但望望街上別部汽車，都相似。街道上也處處給人以整潔的印象，路旁的花草整齊而美，房屋的窗飾整齊而美，馬路上和兩旁行人道的清潔，簡直好像用刷子刷洗過的，乃至來來往往的男女老幼，也個個整潔。在我所經過的幾個國家裏，在整潔上能和荷京相比的，似乎只有瑞士。我一入了這兩國的國境，精神便為之一爽，眼光便為之一亮，這種整潔的印象，是在別處所未會得到的，雖則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等處的市政都辦得很好。（意大利比較地較遜。）

我國現在駐荷的公使是金閻潤君，從前李頓調查團到上海時，顧維鈞氏曾在滄洲飯店開茶話會，招待各報主筆，記者悉陪末座，會和金君晤面，但未有談話機會，這次在海外晤敘，覺得他毫無官僚習氣，好像在學校裏遇着的一位同學，一見如故。他一嘴的松江口音，尤奇的是他的聲音語調乃至笑聲，和老友平海瀾先生（前英文雜誌主筆）沒有絲毫的不同。倘若我在隔壁聽他說話，一定要以為平海瀾怎

忽然到了荷蘭來了！我和這位變稱的「平海瀾」暢談了許久，又承他介紹他的荷蘭祕書談了一會，大都是關於荷蘭的情形，當晚即在使館吃晚飯。這夜住在使館附近的一個旅館，布置的整潔講究，除我在瑞士沮利克瀾旁旅館所見的以外，也是在別處所未見的。但是旅客寥寥，也和瑞士瀾旁底館裏所見的一樣！聽說有個旅館（亦在海牙）名Hotel des Indes，房間比較地昂貴，最廉的每天要在七個半荷幣（Dollars）每個約華幣二圓）以上，就是要在十五圓華幣以上，竟完全沒有人住，個個房間空着，這樣下去，恐非關門大吉不可，這也可作為經濟上的一種寒暑表看。

第二天早晨，我獨自一人依着指南，到荷蘭取著名的海濱希文寧根（Volkeningen）去跑了半天，所得的印象也是無處不整潔。該處即在北海（North Sea）之濱，由海牙去有電車可乘，十分鐘即達，這海濱是個歐洲著名的浴場，設備周全，空氣清新，廣瀾的沙灘沿着海邊差不多近兩英里，有大規模鋼架撐着的廣瀾的橋似的建築，由岸上伸入海面四百五十碼之遠，（在英文稱Pier）伸入海面的那一端有很講究的餐館，在這岸上，可依欄靜觀怒潮如山崩似的一陣一陣地向岸旁湧奔馳而來，使人有海瀾天空駕潮浮游之想；沙灘後面有廣瀾平滑的柏油馬路，馬路的另一邊便是許多布置精美的旅館，菜館，咖啡館等建築，其中最宏偉精美的著名旅館稱Kluisma，樓上周圍的露台有三四尺瀾，有一千七百尺長，該旅館的大廳可容三千客人，聽說最熱鬧的時季是在六月至九月之間，我到的時候，不是熱鬧的時季，所以各處都是冷清清的，看不見幾個人影兒；我想這既是特殊權利階級享樂的所在，此後是這個階級逐漸倒臺的時代，在未有法子使這種地方開放給大眾以前，就是時季到了，要像以前那樣熱鬧，可能性大概要漸漸地小了。

依指南說，這浴場的附近有舊的漁村，在這裏面還看得見荷蘭舊式的奇異建築和奇異的男女裝束，但是我在附近跑了不少地方，跑得一身大汗，還尋不到，後來詢問路人，才知道這些地方也「摩登化」

了，忽忽這回海牙，在一個茶館裏胡亂地吃些東西當午餐，在下午又依着指窗看了幾處名勝，其中最爲我們所久聞大名的當然是海牙國際法庭，在所謂和平宮 (Palace of Peace) 裏面，該宮建築很宏麗，由美國大資本家鋼鐵大王加納奇 (Andrew Carnegie) 捐助三十萬金鎊而建成的，(等於華幣四千五百萬圓了)。這個和平宮在表面上的目的是要藉仲裁辦法來獲得國際和平的，可是自受世界大戰的大打擊以來，所辦的事，只不過遇有各國商人有關於自己利益的事件，各國政府偏袒自己商人而爭吵不得解決時，才請這個『和平宮』裏的國際法官費着不少唇舌來『仲裁』一下。那樣冠冕堂皇而宏麗的所謂『和平宮』，現在所幹的『國際和平』大事業，實際僅此而已。

荷蘭是世界上唯一女性統治的國家，海牙便是這位女皇的常駐地，她現年五十四歲了，是荷蘭威廉第三的女兒，因爲沒有兒子，所以在他死後，她十歲時就承繼了皇位，先由她的母親攝政，到十八歲時即實際執政。她的名字全寫出來，有二十八個字母之多，總算是個少見的長名字，(原文爲Wilhelmina Helena Pauline Maria) 尤有趣的是做了女皇，爲避免政權被奪或被丈夫干政起見，不得不選一個『飯桶』做丈夫；而且做了女皇的丈夫，吃飽飯沒事做，非『飯桶』亦不能勝任！這位女皇登極後，於二十一歲結婚，對手是出身德國皇族，因娶了——毋寧說是嫁了——女皇，得到一個荷蘭親王 (Prince) 的頭銜，其職務除以異性資格服務於女皇外，便是吃飽飯沒事做，遇有公開宴會或盛會 (Public Occasion)，總是女皇在前，他跟在後面，各國外交官在交際場中覲見時，總是女皇先拉手，其次才輪到這位『飯桶』丈夫，總之無論何事，他只有跟在她的屁股後面的資格！中國話有所謂『雄媳婦』，有所謂『雌伏』，這個『飯桶』實可稱爲『雄妻』，或可說是『雌伏』！

這位『雄妻』『嫁』了八年之後，才替他的『雌夫』『製造』出了一個『小雌』，這就是現在荷蘭女皇的獨一無二的女兒，稱珠麗恩娜公主 (Princess Juliana) 現在芳齡已二十五歲了，看去荷蘭下代的

統治者——倘若世襲君主制度還存在的話——還是一個女性的。這位公主的「飯桶」丈夫，尚在物色中，而且聽說非登極後不能「大婚」，簡直是守着「活寡」，這也是做女皇預備者「說不出的」一樁苦事！並且要物色這種「飯桶」，一天一天地難起來，因為除能做十足的「飯桶」外，還有個重要條件，便是須出身皇族的什麼親王，但是時代變了，這類「貨物」——親王——漸漸地少起來了，所以物色更不容易。荷蘭雖採立憲君主制度，但荷女皇的政權很大，和英王之徒靠虛名，政權全由內閣負責者又不同。荷蘭政府的立法權由女皇和國會連帶負責（國會稱 *Staten Generaal*，分上下兩議院，上議院的議員是由最富的公民中選出來的。）行政權則絕對歸女皇，在女皇之下雖有一個「參政院」（*Princ van Oranje*，英譯為 *State Council*），還有關於立法和大部分的行政問題，女皇即開會諮詢，但全體參政員（共十四人）都由女皇委任，而該院主席（*President*）又由女皇擔任，實際僅屬諮詢（*Consultation*）性質，實權仍操於女皇之手。因此荷蘭最怕女皇的丈夫有野心，由夫權而擅行君權，於是「飯桶」丈夫竟為此種政制中不得不「利用」的「廢物」！

荷蘭的政黨情形，和比利時的大同小異，也是教會黨（尤其是天主教，稱羅馬天主教黨 *Roman Catholic Party*）和守舊黨（當然是資產階級的）聯合的勢力。國會裏雖也有自由黨和共產黨，但是人數極少，沒有實力，尤妙的是守舊黨中有個政黨就老實自稱「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這也倒是老老實實的，比自稱革命，而實際是反革命，反以「反革命」罵人的，似乎總較勝一籌罷！荷國的現內閣總理（權柄很小，不過做做閣席，）和內政部長便屬於所謂「反革命黨」，司法，國防，和經濟勞動部長，這三閣員屬於羅馬天主教黨。這也可稱為「反革命」和宗教的聯合戰線！

荷蘭是個偏於農業的國家，他們的重要農產品，除牲畜外，尤以乾牛酪，牛油，和雞蛋等為最著。工業的發展，比較地落後；缺乏充分的煤量，是此中一種困難的原因，但是在三百萬有業的人民中，已

有一百萬人從事工業的工作，他們的工業規模也就不小了。（以紡織業爲最重要大部分輸出。）據最近的統計，一九三二年該國失業工人達二十五萬三千；一九三三，竟增至三十四萬兩千人，劇增的比列數頗可驚；（Amsterdam 有鑛金銅鑛工人五千人，失業者四千。）荷蘭殖民地比本國也大得多，本國面積只有一萬兩百餘英方里，而殖民地的面積却有一百五十餘萬英方里；本國的人口只有八百萬左右，而殖民地的土著人口却有九千四百餘萬人。平均約計，每一個荷人，至少有十個殖民地的人民供奉他！但是殖民地的血究竟也有乾涸的時候，所以還免不掉什麼工人失業劇增的問題。

說到荷蘭的本國面積，有一點頗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伸有縮。牠的縮，並不像我國那樣寬洪大量地容許日帝國主義者今天佔一塊，明天佔一塊，嘖嘖還嚷着什麼『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是被海所侵入，而荷人且能和海抵抗，建造大規模的海堤，像該國最西部的一省名海地（Zeeland）便是用三百英方里的海堤保护的。中國年年鬧水災，荷國國土大部分都在海平線八尺以下，却能用精善的堤，不但保護着土地，而且使土地因此更便潤宜於農業，這也在乎努力不努力的區分！不僅此也，中國有『精衛填海』之語，荷人一向就在這裏幹『填海』的把戲！在中世紀的時候，屢次被海侵入。其中有一次竟把一大塊陸地造成現在荷國北方的南海（Zuiders Zee），把荷蘭國土大縮一下！自十六世紀以來荷人和海爭地，所得的土地已在百萬畝（Aare）以上，在一九一八年，國會通過一個空前的——在全世界上空前的——填海議案，要在南海中填出一省的土地，預定面積五千餘畝，經費七萬五千萬金圓，需時三十三年，已於一九二四年開工，現在已填了一部分。荷蘭本國面積不過一萬兩千萬英方里，居然分設十一省，現在又要和海爭得一省，他們覺得土地的獲得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件，所以聽到中國的東北有德法兩國合起來那樣大，竟於幾天內拱手奉讓給日本，真替我們中國『肉麻』，在表面上代我們歎惜不置（據中國駐荷公使金君談及，他就遇着不少這樣代我們歎惜的荷國友人和政府當局中人），心裏

也許不免還要暗暗地驚異中國何以竟是這樣一個大飯桶！

一九三四、五、二十五、倫敦。

所謂領袖政治

到柏林後，常聽到德國人互相見面打招呼時，不像法國人之叫“Bonjour”（日安）。或英國人之叫“Hello to you?”（你好。）却叫着“Heil Hitler!”（大概可譯為『希特勒萬歲！』）這大概是領袖的意思，雖則有些德國朋友私下告訴我，說有許多是在威權壓迫之下，要保全自己的飯碗，不得不這樣叫一下，在實際上所叫的不是希特勒『萬歲』，是他們自己的飯碗『萬歲』！

此外在照相館玻璃窗內所陳列的，滿山滿谷的形形色式的希特勒的相片：在雕刻鋪子或銅鐵鑄條鋪子的玻璃窗裏所堆着排着的，也是大大小小無微不至的希特勒的造像，這大概也是捧領袖的意思，這類相片，或是造像裏所表現着的希特勒，當然都是威風凜凜，神氣活現的態度，在他的政敵的裏面有的竟敢惡作劇，不知怎樣弄到一張呆頭呆腦的照片，據說是希特勒一歲的時候的真面目，拿來各處廣發！還有人把他的相片另印一下，在頭髮上面加上個小小的列甯的相片，和髮紋稍稍混亂，使人粗看不知道，略一細看，才看得出，也拿來用秘密的方法廣播全國，黨老爺們（國社黨）也許還很熱心地幫同推廣，以廣宣傳，後來發覺，極力禁止，却也『宣傳』得不少了！

講領袖政治的，大概都很提倡對於領袖的盲目的奴性的服從。（服從原也有好的方面，如服從真理，服從所信仰的主義，服從正當的規則和值得服從的人物等等，但和盲目的奴性的服從，在性質上當然有很大的差異。）像意大利由法西斯黨所辦的青年團團員正式加入做黨員的時候，必先宣誓『願無討論地（“Without discussion”）執行領袖（Il Duce，指墨索里尼）的一切命令……』我在德國時，也常常聽見這裏有幾萬公務員，或那裏有幾萬國社黨黨員，聚攏來舉行大規模的宣誓禮，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絕對服從希特勒』。

無論什麼性質的集團或機關，只須是有『羣』的形式，在職務上的需要，當然有領袖的必要：就是我們尋常組織一個旅行團，如人數較多，為種種事務上的便利和需要計，我們也常要公推一個適於做團長的人，代表大家的公意和需要，主持一切，他的最重要的任務是要能把這一團人所要解決的事情解決掉，倘無法解決而又萎靡做勢，儘管吹牛，誰來睬他！倘若這個團長像勾結幾個壞蛋，為少數人的私利，摧殘大多數團員的福利，用殘酷手段壓迫大多數團員，還要以『領袖』自居，認為『領袖』是天生的，你們這般團員活該像奴隸似的受統治，這又成了什麼話呢？

現在德國各校所用的歷史教本，除由政府所承認的教本之外，還由政府所選任的『歷史家』特著種種補充的讀物，最重要的是敘述希特勒的發難和他的『主義』，目的是在造成『以愛國心，種族的意識，和領袖制為基礎的更偉大的德意志』(Greater Germany founded on patriotism, racial Consciousness and leadership.) 試舉其中有一冊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三三年德意志民族的復興』(The Rise of the German Nation "1914-1933")，就說『在德國最困苦的時候，在德國正臨着深淵的時候，上帝又在希特勒的身上，給德國人民一個偉大的領袖』。這和我國的無知鄉民相信『真命天子』的觀念有什麼分別。不過一方面是在中國鄉民中之無知者，一方面是出於素以科學發達聞於世的德國的『歷史家』罷了。(註：以上引證語見 "Daily Herald," May 10, 1934.)

現在這種領袖制，德國不但在政治上採用牠，並極力輸入全國其他的各種組織裏面去。例如德國政府在一月間新頒的勞動法 (Labor Law)，便把僱主認為『領袖』，把他的工人認為『服從者』。這些『服從者』依法雖也有組織所謂『信任委員會』(Confidential Council)，但這個委員會的候選人却須由『領袖』——即僱主——會同國社黨的『工廠細胞組織』(Factory Cell Organisation) 即國社黨

所包辦的工會組織的書記，共同商定之後，再由職工選舉，組成所謂『信任委員會』，代表全體職工和『領袖』——僱主——『合作』。由僱主商定的『信任委員』，當然是可以『信任』的了，不過此處的『領袖』却不是『上帝』所『給』的，乃是有資本做僱主的人們！他們的靠山是『上帝』所『給』的那個政治上的大領袖！

我以為這種政治上的領袖是否『上帝』所『給』的，倒不值得怎樣的注意，我們要注意的是他能否解決全國大多數人所亟待解決的問題。德國的情形和中國的不同，但大題目也只有兩個：一個是對外國人民的『政治領袖』所幹出的『領袖政治』，對這兩個問題，似乎只有『口惠』，實際都沒有辦法，這層此刻暫且慢談，後面當有事篇作事實上的分析。

我此時要提出可以注意的幾點如左。

(一) 上面所說的那種方式的政治領袖，也決不是像天上憑空掉下來的一件東西。例如德國的希特勒，去年一月間所以得一躍而上政治舞臺，實當時實際環境所湊成：德國自社會民主黨秉政以來，不主張徹底改革，只在現社會組織下努力，始終為資產階級利用，後來資產階級鑒於勞動階級的聲勢日大，深覺社會民主黨之不足再供利用，乃索性揭開假面具，利用國社黨，作明目張膽的壓迫，以作最後的掙扎，換句話說，這制度還須靠民族資本家做靠山，才能成立，殖民地化的國家，便無效法的可能。

(二) 這種所謂政治領袖，在未上台以前，要奪取政權也要用欺騙方法，吸得一部分民衆的擁護；這種欺騙，所以能有相當的效力，是因為他從前未曾在政治舞臺上有過惡印象留在民間的緣故，倘若早已久執政權，統治得一團糟，信用掃地，要想再用欺騙方法，利用『領袖政治』的新招牌，那更是一件難事。

(三) 在外國所見的這種所謂領袖政治，雖未見他們對國事有何根本的辦法，但他們個人方面，還能稍稍顯點面子，不得不做出一點勤廉的樣子，像希特勒最近聽說連薪水都不要，全部捐作黨費，這於社會根本問題的解決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並不值得怎樣的讚揚。但比之東一個別墅，西一所洋房，窮奢極欲的政治上的所謂『要人』，給人的印象究竟有些不同。

最後關於『領袖』這個東西，還有一點感想要附帶地說一說：我在柏林的時候，屢次聽見有中國友人看見德國有一班人大捧他們的領袖希特勒，便慨乎言之地說中國人就缺乏這種『美德』(?)，說中國人就不肯擁護領袖，並肯定地斷言中國之沒有救藥，病根就在這裏。關於這一點，我却有些不同的感想，我覺得中國人最重視領袖——不過我們所重視的領袖是眞能在行動上表現他能爲大眾犧牲努力的領袖，倘只叫中國人對着掛空招牌的領袖舉手行禮高呼『×××萬歲！』這玩意兒是弄不來的。關於這一點，事實上的佐證多得很，隨手拈來都是。試舉一二比較近的事實說。在舉國民衆熱烈抗日高潮的時候，馬占山將軍在嫩江率軍血戰抗日，全國人民對於他的崇拜的種種表現，實難形容，杜重遠先生當時到四川重慶一帶去演講救國運動，甚至看見有人把他的相片排列在祖宗牌位一起，有人希望他有機會做中國的大總統！上海十九路軍血戰抗日，全國民衆對於他們的領袖和士兵們的崇拜，其種種表現，也是出於衷心而爲我們所共見的。我當然不是說這些人就可以做中國政治上的領袖，我是要證明中國人所要重視的領袖是在行動上事實上有着辦法爲大眾努力的領袖，不是掛着空招牌擺着空架子的領袖。如有人自以爲中國的領袖而怪中國人民不知或不肯擁護他，我要請他問一問自己有了什麼，做了什麼，足以引起中國人民的信仰和敬重！

種族的成見和夢想

德國的『納粹』(Nazis)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雖同是狹義的國家主義，即志在跑上帝國主義老路的侵略的國家主義，(這是他們的共同點。)但德國的『納粹』却有一個很大的異點，那便是更加上了很濃厚的種族的成見和由這種族成見所引出的很滑稽的夢想。

希特勒在去年十月出版了一本書，名叫『我的奮鬥』(Mein Kampf) 風行一時，英國書坊替他大登廣告，說是『研究近代政治學者所不可不讀的書』，其實在裏面除充滿了成見外，找不出什麼『政治學』來。尤其是第一章國家和種族裏所說的話，更爲可笑。他的前提是：

『我們在這世界上所羨慕的一切——科學，藝術，技術上的能力和發明——都是很少數國家的創造的產物，而這些國家原來或者就是出於一個單獨的種族，這種文化所以能存在，全靠他們。倘若他們被毀壞，這世界上的一切的美，都被他們帶到墳墓裏去。』

這『一個單獨的種族』是什麼？他以為：

『倘若我們把人類的種族分做三個範疇——創造者，維持者，和破壞者——那末只有亞利安這一種族可算是第一個範疇的代表者。』

這一段裏面的『只有』兩個字很可以注意：所謂『只有』，那就是不屬於亞利安的其他種族，例如屬於『非亞利安』的塞米族(Semite race)的猶太人，以及有色人種的一切種族，都在排除之列。

所謂『亞利安』(Aryan)，原指一羣『印歐』(Indo-European)的語言文字，這羣語言文字現在差不多遍及歐洲全部，並伸展到印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臘文，俄

文，亞美尼亞文 (Armenian)，波斯文，以及幾種印度文。(見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p. 143) 據歷史家的推測，以為太古時候，這羣文字也許是出於一個源流；又推測說，這一羣語言的種族或者最初是由俄國南部分散出來；有的朝東遷，到波斯印度去；有的便西入歐洲，成爲條頓，斯拉夫，和拉丁等種族。換句話說，所謂「亞利安」，統而言之，就是白種；所謂「非亞利安」，就是白種以外的其他各種族。希特勒認爲世界上所有的好東西，如科學藝術技術和發明等，都是白種人的成績，所以白種人有征服一切其他種族而單獨生存的權利。

但是事實上的困難是「亞利安」人雖有他們的文化史，而世界上的其他種族——尤其是有古文化的種族——也有他們的文化史。於是希特勒和他的信徒們恨不得一手捺煞歷史。有名 Lowie 的著了一本「希特勒」，裏面有這句話：

「『亞利安人』——『白種人』——這些人，在遠古時代 ("In the remote past") 會把文化帶到印度，而且也許 (Possibly) 也帶到加爾底亞 (Chaldeo-西亞古國，在紀元前1300年即滅) 和中國去。」

在這位捧希特勒的作者的高見，中國的五千年的古文化，也是承蒙亞利安人贈送的了！所不勝可惜的是這位大作家還缺乏了胡適之先生的「考據癖」，僅能說出「在遠古時代」；橫直在未有歷史的荒古時代，神不知，鬼不曉，我們隨便說送了什麼，便是什麼，況且他還很謙和地用了「也許」的十分客氣的字樣。照他們的意思，大概在中國文化史上不無相當位置的孔老夫子的原籍，「也許」也是亞利安罷！

去年年底有德國某「人種學者」著了一本書，大吹日爾曼人種的優越，其中可笑之處很多，尤其可笑的是把人類分爲三大種：第一種是 *Mongol* (優秀人種，日爾曼人種當然是頂上的)；第二種是 *Uralenurians*

〔劣等人種，如南歐巴爾幹各國〕：Danaon (非人種當然是他們所認為有色人種所歸屬的)。記得在上海有位善於惡作劇的朋友，每喜對人說：『你這樣的人真是在人類裏所尋不出的！』不料善於體貼希特勒的『歷史家』能抬出『上帝』來；現在又有善於體貼這位『領袖』的『人種學者』，能在人類裏尋出『非人種』來！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希特勒既認為『只有』亞利安人是能替世界創造文化，能替世界保存『美』的種族，他所積極提倡的有兩件事：一件是保全日爾曼種族的血統，在德文是所謂『Blutsgut』，意謂『血統的感覺』，即不許德國人和有色人種或塞米族的猶太人結婚，因為他以為萬分寶貴的日爾曼人的血一與『劣等人民』混合起來，也要使優種變成劣種的；還有一件是提倡唯一優種的亞利安人征服全世界，因為他認為必須如此，世界的文化才有進步。

現在德國的公務員，如三代祖宗中含有猶太血或有色人種的血，飯碗就要在打破之列。因為他們祖宗裏有的『勿讎相』，和猶太人或有色人種發生了性的關係，在當時尚未入世的兒子，孫子，乃至曾孫，好像都要替他負責似的！最近見德國所公布的農法(Reich Law)，裏面所定的農民得享的種種權利，就說明只限於『德國的公民，須自一八〇〇年以來家族中不含有猶太人的或有色人的血統者』。現在是一九三四年，距一八〇〇年是一百三十四年了，做子孫的要替百年前的祖宗的性的關係負這樣大的責任，而且是無法負責的事情，真可說是含冤莫白！

去年十月間德國證券交易所所有三百三十四個經紀人被准許營業，有一百五十人被拒絕，其中有半數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為據說他們含有『猶太血』的『劣跡』。至於名教授，科學家，著作家等，因不幸被認為祖宗裏面有的染有猶太血統『劣跡』而被排斥驅逐者，更不勝數；他們因為血統關係，無論在文化上，有何重大的貢獻，都在所不計的了，這顯然又是血統和文化的矛盾問題！

德國排斥猶太人，是有經濟的理由，不僅是種族的問題，但種族成見既爲國社黨重要內容之一種，所以黨員中之盛氣凌人者，往往發生得罪其他外國人的事件，尤其是東方人。最近此種『盛氣』聽說鼓前衰落了。在國社黨將上台及剛上台炙手可熱的時候，有的黨員在街上見有德國女子和東方人同行的，便要詢問那女子的理由，倘若那女子是有職業的，往往因此打破飯碗。有位朋友自漢堡來柏林，據談去冬在漢堡有中國學生某君和一個德國女子在街上走，被一卍字黨員路過看見，（襖衫黨人的臂上總縛有一塊紅底白字——卍字——的布條，故亦有人叫卍字黨，）盛氣斥女的爲什麼和『豬羶』同走。據說那中國學生怕事，只得忍耐過去。做了『弱大民族』的中國人當然易欺，（尋常名詞是『弱小民族』，中國並不『小』，似乎只得替『弱大』，）別國人便沒有這樣易惹。據去年十月二十日的孟却特斯導報所載，有個美國人名 Roland Waly 的，被兩個卍字黨員所打。（據打者的理由，是他對遊行中的卍字旗表示輕蔑之意，這當然是很含糊的話。）被美國駐德大使提出抗議，這兩個黨員各被定罪監禁六月，各報初不敢登載其事，美國大使仍不答應，說此事非公布不可，然後有的報上才有這件新聞。

卍字黨員中却不是都屬浮囂的，我在德國所認識的德友裏面，也有卍字黨員，他們待我都很好，其中有一人，待我尤其殷勤可感。當然，這都不過是友誼的朋友，我並不會和他們多談黨務，免得使他們爲難。

講到保全血統，在事實上確也很不容易，依我在德國的見聞，德女嫁給中國人，或和中國人作『同居之愛的』，或在渴望嫁給中國人的，都很多。大概他們有的只是『麵包的感覺』，很缺乏『血統的感覺』！講到『愛』，那更是和『血統』不發生連帶關係的東西，我在火車上和德國女友 E 女士第一次談話的時候，她也談起希特勒禁止德女嫁給外國人的事情，尤其是東方人，她說一嫁外國人，即失德國國籍，甚至有失業的危險，我問她假使你愛上一個東方人，你願意不願國籍的拋棄而出嫁嗎？他說願。

我看她的『血統的感覺』，在希特勒看來也是不及格的！

德國一般人民，我覺得很可愛，所以我對於日爾曼種族只有敬重的態度，但國社黨那樣排斥其他種族的態度，我認爲是成見，征服一切其他種族的念頭，更是夢想。

一九三四六、五、倫敦。

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

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關於教育方面有個共同點，便是所謂「雙軌制度」，有一班國民受了義務教育之後，便須進職業學校受短期的職業技能訓練而藉謀餬口的；有一班國民便得一級一級地升學，養成上層階級的材料：這兩方面全以經濟的背景為標準的。德國的現行學制，當然也不能例外。德國的義務教育法定六年，實際不止六年，因六年畢業後，無論欲就何業，都須再依所擇的職業，進職業學校，其年限一二年或二三年，依業而異，否則雖有職業機會，亦沒有被備用的希望。這六年稱為國民教育，都是不預備升學的。預備升學的讀至第四年終了，即入中學，這四年稱為基本教育。中學九年，分三階段，每階段三年，有實科中學與文科中學之分。據說後期中學的程度幾等於英美大學的程度，故德國的大學程度幾等於英美的大學院程度，這不過是聽留德的朋友談起，記者沒有到過美國留學，也不會在德國進過大學，未敢妄斷。德國大學文理科定三年，法科四年，醫科五年，但實際因功課來不及做完，每須延展。除工程師的文憑外，其餘各科畢業則已，畢業了都是博士，據說博士尚有一二三四等之分。我笑謂一位留德的朋友說，博士既有四等程度之分，我們稱人博士最好還要分清「頭等博士」「二等博士」等等，不過如有人是「四等博士」，也許不願聽！

有錢人家的女兒受滿義務教育後，往往不再入學校，請私人教師到家裏來教外國文學音樂等等，以養成上層階級的主婦為主旨。有錢家族的男子則又不同，以學位為社會所重視，（德語稱博士為「博士先生」[Herr Dr.]）也勉強入大學，惟注意於選擇容易的科目和比較易與的教授。這是無意求高等教育而進大學的青年，所弄的當然就是有錢，真肯求學的，大概還是中產階級的子弟。（無產階級的子弟無

論真不肯不肯，當然都說不到。從前還有苦學生得一面任事，一面求學。據說現在已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德國的中學生只須中學畢業考試及格後，升大學即可不必再考。本來每年中學畢業的學生有三四萬人，同時也就是升入大學的三四萬人，今年不同了，納粹統治下的教育主張，開宗明義第一章是限制升學的人數，今年一月間已由政府宣布在德國已有資格升入大學的青年（即中學畢業考試已及格的）裏面，只准許一萬五千人得升入大學，工業學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機關。因此有兩萬三千人已經中學畢業而原有資格入大學的青年，今年都在失學之列！

此外女子被准許升入大學的數量，只佔全數中百分之十。這理由當然不是因為女子沒有升學的能，他們所以得不到平等的機會，很顯然的理由是當局千方百計要把她們推到『牀舖上』去，他們認為女子如受了過多的教育，不很願意被人限制在『牀舖上』，這樣一面要增加失業的人數，一面要減少『優秀人種』，這和獎勵出嫁養子的原則不合的。所以限制升學之中，更須加緊地限制女子升學！這是納粹統治下的教育的第二種重要的主張！

盡量把婦女們推到『牀舖上』，這算是把婦女問題解決（？）了；但是那兩三萬預備升學而不許升學的『優秀人種』，當局對他們怎樣辦呢？當局答應他們組織失業委員會，和教育機關合作，設法把他們介紹到工商界去服務。德國失業情形的緊張，我在上篇通訊已略述梗概，這個『失業委員會』有何廣大的神通能把這幾萬的新產生的失學而又失業者，介紹到工商界去，這似乎也還是個問題罷。

其次請問那已被准許升學的一萬五千人，是用什麼作標準來選擇的，據當局所宣布，於什麼智慧，體格，品性，等等條件之外，還加上一個條件叫做『民族的可靠性』(National reliability)——換句話說，這升學候補者必須是個『純粹』或是現統治階級的『敬佩者』(‘Aduhrer’)。所以聽說實際上只有純粹黨員才有升學的權利。這可算是納粹統治下的教育的第三種重要的主張！

據當局的意思，將來這種升學人數的限制還要嚴，還要減少，以達到需要和供給能『平衡』爲止。照現狀看去，失業者遍地皆是，簡直無需要之可言，恐怕非減少至零數不可；可是一方面又有許多『優秀人種』層出不窮，不能束之高閣，這似乎又是個難問題。

至於爲什麼要把升學的人數嚴格地減少。據當局的解釋，也很不免矛盾。他們一方面舉出事實證明『沒有麵包的畢業生軍』(“Army of Graduates withoutbread”)之日增，而專業位置之不敷分配。據說在一九一一年，全德國有六萬二千大學生(其中有二千三百女生)，在一九三一年，有十三萬三千大學生(其中有一萬九千七百女生)。他們估計，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將有比實際位置所能容納的多出兩三倍的博士。在一九三一年，有八百個至九百個的青年化學師(都有藥科的專門資格)；而現在却有一千二百個至一千三百個藥劑師求業而不可得。照他們這樣的推論，是供給多於需要。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說所以要限制升學人數的理由，是因爲『錯誤的教育理想』使學校離開了服務人民的工作。這樣說來，只要所輸的知識是合於當局所認爲準確的『教育理想』，這缺憾便可避免了。但是像上面所舉的許多『生產過剩』的藥劑師，還是因爲在現下的經濟結構使他們得不到職業呢？還是他們在藥科的知識和技能上有什麼不合於『教育理想』呢？這問題的癥結如果不弄清楚，要想救濟，更不容易了。

聽說不但升入大學的人數要受限制，升入中學的人數也將要受限制，這豈不成了限制主義的教育嗎！

這是納粹統治下的教育的最近傾向。

一九三四。六。六，倫敦。

德國新聞業的今昔

德國的重要報紙，就大概說，本來是操縱於幾個托辣斯，其中尤其鼎鼎大名的有三個，而這三個之中，猶太人包辦了兩個。這兩個原來都是操護社會民主黨的。一個名叫烏斯太普(Ulstein)，資本一萬萬馬克，可想見其規模的宏偉；所辦的幾種日報和定期刊物，都是風行一時，名聞世界的。例如最近(本年三月)因受種種壓迫而停刊的蘓惜協日報(“Tosische Zeitung”)就有兩百年的歷史，在各國老資格的報紙中有『蘓惜姑母』(“Auntie Voss”)的著名綽號。現在這個『姑母』不幸因環境的壓迫，而送了一條老命，西歐提倡自由思想的報紙多表示悼惜；這個不久壽終正寢的姑母，她就出身於烏斯太普。該公司所辦的柏林午報(“B. Z. am Mittag”)是德國午報中的大王；所辦的『柏林畫報』(“Berliner Illustration”)是週報，每期銷數在百萬份以上，所享盛名僅次於『倫敦新聞畫報』(“London News Illustrated”)。

還有一個猶太人辦的大規模的報業托辣斯，名叫盧篤福摩塞(Truda Mosse)，資本五千萬馬克。該公司所出的『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在國外尤為流行，一部份原因是因為所印的字體是用英文字體的寫法，不是用德文字體的寫法，外國人便於閱看，聽說這報在德國本國的銷數僅三分之一，售到國外的反佔三分之二，此外該公司還出有兩種有名的晚報。

第三個著名的報業托辣斯名叫協爾(Sohler)，是德國大資本家許根堡所辦的(Dr. Hugenberg，演攝德寧中國人電影的烏發公司也是他辦的)。該公司資本約自一千五百萬至一千七百萬馬克，所出的『本埠日報』(“Lokal Anzeiger”)和盧篤福摩塞所出的『柏林日報』並駕齊驅，此外也辦了兩種有名

的晚報。

除這三個大托辣斯所辦的報外，還有個日報叫做德國普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算是能比較立於超然的地位，於德國輿論界原有相當的地位。對中國的態度比較地最好。（這報記者也去參觀過，並和該政治部主筆暗談過，但沒有什麼特點可記。）但實際也並非真是超然的，因為牠的後台老闆是德國實業聯合會（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該會會長便是大資本家克虜伯。（克虜伯鋼鐵廠是我們所常聽見的。）大概要和中國做生意的團體，對中國的態度都比較地好些，英國的『孟克斯特導報』也是一例。在我們當然只有自己爭氣奮鬥，不願存有苛求於別人的意思，而且也不應存有苛求於別人的意思——再進一步說，自己如不努力，苛求於人也是無用的。

最後還要附帶提到的是納粹的兩個比較最著名的黨報：一個是德國現任宣傳部長戈手可熱的人物葛伯爾斯博士（Dr. Goebbels）所辦的『進攻晚報』（Angriff）；一個是『人民觀察日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

這當然是很簡單的大概。據德國新聞學研究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Zeitungskunde）的調查，在一九三二年（即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全德國的日報有四千七百零三家之多，其中黨報（各黨的）約近千家，非黨報而對某黨特別接近與同情的約有一千二百家，超然的報約有二千零數十家，（這裏有一點也很可注意，就是各聽任自然的發展，超然的報特別多。）可見情形很複雜；不過我覺得這類材料的敘述如果過多，讀者也許會感到枯燥乏味，所以只很簡要地說了一些，現在讓我來談談參觀烏斯太音所得的印象。

烏斯太音算是在德國規模宏大的出版和印刷機關，該公司的房子分兩處，一處在柏林的柯易街（Kohlstrasse），是編輯部，各專務部，和所辦各種日報的出版處所在，可稱老屋；一處在柏林附近的騰

迫背圖 (Templehof)，是最新的大印刷所，專印定期刊物和叢書，所印的都是該公司自出的刊物，沒有工夫接受外面的生意。記者偕同友人張博士也分兩次去參觀，於三月卅一日先去該公司的老屋，歷分四層，雖非印刷所，但因爲有印報的關係，也有四五十架輪轉機印刷機，每小時都可印兩萬份的通常日報，此外有一架最新式的印刷機，每小時可印三萬份，而且印時一點沒有機聲隆隆的聲音，裝在印刷機房的中央部分，看上去巍巍然好像南面王似的。但是因爲生意清淡，四年來竟沒有開用的機會，那樣好的一部印機，就只得讓牠那樣賦閒着！各報的編輯處和發行部的辦事處，都依賴聚在一處；例如有個全層的樓房都用作發行部，各報的發行部雖同在一層，彼此用玻璃隔開，櫃台和行人甬道則聯成一長條。大量生產經濟，這樣大量辦公也有牠的經濟處。該公司全部職工最盛時代達一萬二千人，現在只有七千人，這裏面就替德國留下了失業者五千人。職員中女子過半數，包圍間的工人，女子亦過半數。職工進出上下者既多，所用的電梯也很特別。兩個電梯在貼隔壁，電梯上立人的那個小房間不止一個，是幾個疊着同時上上下下的。這兩個隔壁成鄰的電梯，一邊繼續不斷地向上升，一邊繼續不斷地向下降，兩個電梯的門是一直開着的，兩邊一升一降地循環動着不停，所以沒有人開梯；你要上樓或下樓，一鑽進去就是！

各報的新聞照片貯藏處也聚在一處，所以非常經濟。走進這個貯藏處，只見四方八面的牆上都是許多的小櫃，好像中國的大規模藥材店似的（因藥材店滿壁都裝着放藥的小抽斗），不過這些小櫃不是用木做的，是用鋁做的，大概是要防海濕的用意。該處共藏有新聞照片七八十萬張，所用的管理員都是女的。我和張博士進去參觀的時候，引導參觀者問我們要不要試取中國的名人照片看看，我們就問他們取看『孫逸仙博士』的照片。有個女職員在索引卡片上一翻，不到一兩分鐘，即拿到幾張孫中山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在海外攝的，大概還是在同盟會時代；有一張是和夫人宋女士同攝者，大概是在日本

時候攝的；有一張是辛亥時在南京臨時政府時代攝的；有一張是在南京國華時的照片，孫夫人也在內，還有一張是兩個穿着黑色男子學生裝而不失女子態的青年，據說是孫博士的兩個女兒，這在國內却是從未見過的。看完了『孫逸仙博士』之後，引導者詢問還有什麼人要看看沒有，我們兩人都躊躇了一下，因為替我們去險的中國軍閥官僚的照片，在他們貯藏室的，想也不少，這在他們也未嘗不可認為有新聞的價值，但我們却不願看他們的那副不要臉的臉！既而張博士忽想起李鴻章來，她一聽見，好像就很高興，但我們却不願看他們的照片，跑到樓上去查，也不過一兩分鐘就拿了來，我們都驚歎其故速。一看這位老李的照片有兩張，都是一九〇一年的，是三十幾年前的老古董了。在一張裏這位老李在中央堂而皇之坐着，穿的似乎是欽差大臣的官服，（這名詞似乎很生，但中國大人老爺們穿的蟒袍補褂，又不好竟叫禮服，）左右有幾個穿官服的隨員恭而且敬的立着，在這幾個隨員裏還有兩三個似乎是『洋鬼子』，怪好看！在還有一張裏，老李穿着寬袍大袖的便服，似乎是和他的家裏的人同拍的（都是男子），他老人家也是老氣橫秋地坐着，其餘的都是立着。看了這老頭兒當時的氣概，使人憮然感到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國勢每況愈下的不堪回首！看後出來我問張博士何以忽然想起李鴻章來了，他說德國人把李鴻章比俾斯麥，直到現在還有人想起他。（按俾斯麥對中國人物最佩服的是李鴻章，）甚至有人弄錯了，以為李鴻章是姓章，每遇中國學生裏有姓章或姓張的，以為這便是李鴻章的後代，往往問起李鴻章如何如何！

該公司有自備的電話接線處，內部相通的電話線有九百根，與外面相通的電話線有一百四十根。電話接線處用的是女接線生，有二十餘人，耳朵上掛着兩個聽機，手上把機鈕撥來掉去，工作異常緊張。我看見這裏有個女子年紀似乎很老了，頭髮已斑白，嘴已癢，皮已皺，也在那裏很緊張地當接線生，不得一秒鐘的休息，心為惘然！

校對室裏很有趣，校對者兩人一桌，一排一排坐着，看上去總有百人左右，好像上課似的，真可叫

做「大臺」的校對！

最初在該公司的總辦公室裏接洽的時候，出來週旋的是兩個三四十歲及四五十歲的女子，看他們辦公桌上排着的名牌，還寫着「某某」，(Holland)的縮寫，即密斯某某，)我對張博士說這又是「老小姐」了！到歐洲以來，看見「老小姐」遍地皆是，怪可憐！但是想到中國的「老小姐」更可憐，因為歐洲的「老小姐」雖做了「老小姐」，却未嘗沒有和她們的「男朋友」享過性的生活，中國的「老小姐」才真是「老小姐」，我認爲這是人生很不幸的悲劇！

話又忽然說得離題太遠了，下面再略述關於該公司的大印刷所的情形。

記者和張博士於四月三日到騰迫荷福去參觀烏斯太音的大印刷所。上次去參觀該公司的老屋，整整費了兩小時的時間；這次去參觀該公司的大印刷所，整整費去了四個小時半的時間。

進門後，有個很大很厚的簽字簿，是預備參觀者簽字的，上面已簽字的以日本人和美國人爲最多，中國人來過的很少，只有一兩個，而且是學生。

這印刷所有九層，兩層在地下，七層在地上，中央的鐘樓有十六層，二百三十五尺高，在這鐘樓的第十四層和第十五層，裝設有自來水的高度壓力管。在樓上大鐘的鐘面直徑有二十三尺半闊，全德國算是最大的。許多電梯的電梯間，每間同時可乘二十四人。

印刷所的工作不僅是印刷而已，在一本書或一冊雜誌未達到印刷機以前，還須經過不少的手續：例如要排字，(外國排字是用打字機式的機器，便利得很，通訊裏已談及。)要製圖，照相，製版等等；印後還須經過摺疊，裝訂，裁平等。彩色的印刷物所經過的手續更煩。這種種方面都分部的辦，即印刷本身，也分成三部：一是陽文印刷部，一是陰文印刷部，一是影寫版印刷部。此外還有各種試驗室，所用的材料都須先經過試驗室的試驗。對各部的詳細敘述，非篇幅所許，我只得撮舉幾點來談談。

照相部的暗室，用不着關門而仍是黑暗的，因為裏面的構造曲曲折折由工程師特為設計建造的，所以光線經了相當曲折，你離開着門工作，牠也無從進來。

進圖書室去，看見幾十個畫師在斜靠着畫板上繪畫，好像跨進了什麼美術學校。

有二十二架輪轉機，專印『柏林畫報』，每星期所印的數量，在一百八十萬冊以上。

專印定期刊的印機，每月所印在九百萬冊以上。

最有起的是在第二層裝訂部裏所見的自動裝訂機，機長八十九尺，一本厚書或一冊厚雜誌在未裝訂前的各部分，如插圖封面各頁等等，各放在機上相當的地方，牠能自動把各物搜集起來，按序拚好疊好運送到機上一處裝好訂好，最後又會自動地把這些裝訂好的冊子運送到裁機（Cutting machine）上去裁平，這裁機每小時能裁完厚書（例如該公司所出的每冊一百四十四頁的『Uhr』雜誌）一萬二千本。彩色的印刷機，有三色有四色的，該廠裏還有一架六色輪轉機，在印刷間裏昂然獨霸一方，數年來也因爲生意蕭條，成爲廢物，和上面所說的每小時可印三萬份報紙的最新輪轉機，陷於同樣的命運！

我看完了這樣大規模的出版機關，心裏暗作妄想，如中國有一天真實行了社會主義，或至少真向着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走；由大眾化的國家辦理這類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區區小子得在這樣的一個機關裏竭其生力，盡我全部的生命在這裏面，那真是此生的大快事，大幸事！這樣大眾化的事業，比之操在資本家手裏，以牟利爲前提的事業，又大大地不同了。

因爲烏斯太普一向在德國出版界和報界都很佔勢力，也許可視爲一種代表典型，所以談了一大堆，現請轉回來再稍談到德國一般新聞業的現狀。

這大概是諸君所可以猜想得到的，現在德國的報紙，已全成了納粹政府宣傳部的附屬機關。德國原有新聞業協會，由各報公舉主席，希特勒上台後，即『收爲國有』，廢除原有主席，由宣傳部新聞科派

人充主席，每晚開會，由各報派代表出席，聆聽政府中人演說！要從事新聞業的須經政府認為「無礙」後，加入該會，略一不如其意，即被開除出會，即等於永遠打破飯碗，從此不許在新聞業上做事。新聞記者——無論是主筆或訪員——都變成了道地十足的應聲蟲留聲機！每遇國際上或本國裏有何重大事件發生，只要稍稍不合於統治階級的口味的，報上一些不許洩漏，評論更不必說，德國人便如蒙在鼓裏，莫明其妙。結果有許多人覺得本國報沒有什麼看頭，要找些真消息的，只有向外國報上去看看。但是一般人不是都懂得外國文的，一般人民不是都有能力看外國報的，於是便等於愚民政策——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

不啻是非，只顧一致，新聞既是「一鼻孔出氣」，言論也須「一鼻孔出氣」，結果當然不免單調，這不僅是一般讀者的感覺，就是等於德國報界的頂頭上司宣傳部長葛伯爾斯博士，最近對於德國報紙的單調也表示不滿意。有個星期日報名叫「Grunde Post」（德國著名的報紙之一，亦為烏斯太普所有）的主筆在社論裏，對這位宣傳部長的不滿，略為報界辯護了幾句，被罰停刊三個月，（此為本年五月初的事）罪名是「不負責任的曲解」，這在我們中國話說來，「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

記者會到德國新聞學院去參觀，和該院院長兼教授徒費法特博士（Dr. Ernst Dörfel）談過兩次。我曾提出新聞學上幾個問題和他討論，其中有一個是言論自由問題，他認為言論自由，在原則上他是贊成的，不過在革命過程時期，此自由不得無限制，等到革命成功之後，才可開放。我說這就要看所謂「革命」是否真正革命，倘若自己在口頭上叫着「革命」，在實際上是反革命，反而壓迫真正革命的言論——真正為大眾謀福利的言論——那便是自掘墳墓的行爲了。（納粹不但自命「革命」，其宣傳部長並宣稱所行的是「實際社會主義」。）這位老教授不敢再說下去，我也不願使他為難，便轉着語鋒到別的討論上面去。

莫斯科的鳥瞰

記者在七月十九日夜裏十一點鐘陪同旅行團自列寧格勒乘火車向莫斯科進發，我們這一大班人塞在三輛車裏面，四時間已不早，大家上車後，都紛紛往木榻上躺下來，準備睡覺。我向四周略為張望一番，知道我們所乘的是所謂「硬車」。還有一種比較講究的叫做「軟車」。「硬車」大概等於我們的三等；「軟車」等於我們的頭二等。「軟車」如何「軟」法，此時尚未見到；此時所看到的只是「硬車」，請先說些「硬」的吧。這「硬車」和我們的三等車不同之點是：我們的只有坐位，晚上不能躺下來睡；他們却每人有個木榻，木榻上並有毛毯，棉墊，白布單，枕頭等物，在夜裏可以躺下來睡。各木榻的布置是分上下鋪的，車內有牆壁隔開分為若干節，每節內有六個鋪位。那晚上車後，各人隨意碰着一個鋪位就往上躺，我那節內六個人，四個美國人，其中有個叫希爾，有個叫博伯，和我特別要好，還有一個是塌塌爾護資本主義的黑博士奈遜。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到莫斯科，我們在六點半就醒了，希爾博伯和奈遜大辯論；前兩位是信仰社會主義的，很替受壓迫的黑人抱不平，把黑人的解放問題和美國的革命問題連在一起研究，後者却是滿意於美國的現制度，反替死硬派的白種人辯護，開脫，同時替黑人表示種種的滿足，大家鬧做一團，博伯年才十八歲，年少氣盛，火氣直往上衝，幾至動手打起來，經我力勸始罷，後來黑博士走開，我勸他們兩位以後不要再對黑博士白費口舌，作無謂的辯論。我說辯論真理或問題，最小限度也有兩個先決條件：（1）有探求真理的誠意；（2）對所辯論的真理或問題有相當的基

本知識。如今這位黑博士一味固執成見，只管說他的，對於他們兩位所舉的事實，簡直沒有聽，也不願意聽；而且一腦子裝滿了帝國主義腐敗民衆的奴化教育，對於新社會科學的書一本沒有看過，一點都不

懂，（這是聽了他的高論而可斷言的，）我敢說他對於社會主義的內容固然莫明其妙，即對於資本主義的實質也何嘗明白？既無所知，又不肯學！這種人正是高爾基所謂『只有墳墓能解決他』！

這個『黑白辯論會』剛結束，大家歡呼莫斯科到了！

老莫斯科——市儈、貴族、地主、和牧師們的莫斯科——過去了；新莫斯科——勞動者般的莫斯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努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實驗室』莫斯科——湧現着出來！

我們一同往暑期大學，各人把東西放在所派的房間裏，（是大房間，十一二人住一個房間，）略事休息，午膳後就和大家乘特備的公共汽車環遊全城三小時，先作一『鳥瞰』。關於較詳的情形，當分別另篇敘述，本文裏只能略述『鳥瞰』所得的大概。

最使我們注目的，是隨處都可看見仍在繼續建造中的道路，仍在繼續建築中的房屋，仍在繼續布置中的公園和草地。

我們的公共汽車所經過的是樹蔭夾道的廣闊平滑的柏油馬路，這在西歐其他各國似乎是不足希罕的。但我們如想到西歐各國的好馬路只見於布爾喬亞所居住往來往的區域，非整千整萬的勞動者所居住往來的貧民窟所能夢見；又想得十月革命後的路政和帝俄時代的天淵之別的大差異；所得的觀感便不同了。在帝俄時代，莫斯科勞動者所查察的區域只有狹隘骯髒的爛泥路，行人道當然是沒有；至於城市的中心區域有寥寥幾條號稱時髦的馬路，那只是專備貴族們，地主們，和資本家們所用的，非大多數勞動者所敢問津，所以在當時並不覺得不夠！而且街道多彎曲雜亂，改造艱難，因為要改造更須受有勢力的地主們的竹槓和阻撓。在革命後，這種竹槓和阻撓都一掃而光了，街道依照計劃而開直推廣者不少。據統計所示，一九三一年中新築的馬路達六十五萬餘方米達；一九三二年中新築的馬路在一百萬方米達以上。在建築道路的工人裏面，也用『社會主義的競賽』，加速地替他們自己的首都建築更多的更好的

道路。他們希望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終了時，莫斯科的街道都光滑得像鏡子一樣。

其次講房屋。世界上各著名的『文明』(?)首都免不了掉貧民窟的點綴，而這些『窟』內的貧民又大都是勞動者，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莫斯科吧——至少在目前。這在布俄時代，也是莫斯科的特色！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莫斯科的貧民窟的破屋，每屋有四五間用破板隔着的狹隘黑暗醜陋潮濕的『斗室』(Cobble)，裏面堆塞着貧民三十四萬餘人！每個『斗室』裏塞滿着已娶的和單身的，兒童和成人，未病和已病的，堆塞在一起，有無牀鋪當然顧不到，箱子上地上隨處都睡，把破爛的衣服蒙在身上當被窩。有這『斗室』堆塞的，在當時的普羅列脫利亞還算是幸運的了，還有無數無家可歸的，便在夜裏鑽到『貧民旅店』裏的地上去佔得一個睡的地位。(這種『貧民旅店』英文稱作"Joss-houses"，大抵費幾個銅板租地上一個躺身的地位宿一夜，這地當然擁擠着許多貧民，像豬欄狗欄一樣，稱爲『旅店』，當然還嫌過於文雅)，現在不同了，在許多林立着的工廠附近，你可以看見一座一座的鋼骨水泥新建四五層高的新式住宅——勞動者的住宅——有許多玻璃窗引進充足的陽光和空氣，陽台上排着花草，玻璃窗上掛着窗帷。

此外我們看得最多的是莫斯科的『綠化』，這裏增加了一個公園，那邊增加了一塊草地。在許多馬路上時時可遇到一個三角形或是一個方形的草地，上面種有花草，排有長椅。有許多是已布置好的，有許多是正在布置中的。要使莫斯科綠化，這也是莫斯科的工人所積極努力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在老莫斯科時代，有的是大眾所無從問津的私家的花園，一般平民所能享到的『公園』只是若干墳地，和死人共享，也許是措死人的些油！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的草地便比老莫斯科加了一倍，後來進行更積極，特別組織了一個栽植委員會，計劃於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的三年間，要使莫斯科增加三千赫脫(Cherok)，每赫脫約合兩個半英畝)的草地。即再增加一倍，他們要努力把莫斯科做成一個『花園城』。

莫斯科的電車的擁擠，我們是已早聞大名的，但是說來似乎很奇怪！在帝俄時代，電車很少，而却不擁擠；在革命後，電車增加，反而擁擠！（在帝俄時代，莫斯科電車軌不逾二七五公里，電車約八百輛，現在電車軌約有四六〇公里，電車二〇〇〇輛。）我們在這第一天就看見電車還不免擁擠的情形，雖則有人說已不及從前擁擠得厲害。在革命前車少反而不擠，在革命後車多反而擠起來，此中秘密一經說穿了，却也平常，原來在革命前，只有布爾喬亞的區域有電車道的鋪設，以增加他們的便利；在那些擁擠不堪的工人區域，根本就沒有什麼叫做電車。在當時的電車上定有一條規則，說衣服不整潔或身有令人厭惡的臭味的人，一經賣票員或其他乘客指出，即須遵命下車，這當然是拒絕當時勞動者乘車的好方法。其實這個妙法用的機會也還不多，因為當時的勞動者每天只賺四五十個戈比，那有力量每天拿出一二十個戈比來坐電車？他們大概只在放假的日期，偶爾乘坐電車，作為一種有趣的玩意兒，好像他們的子孫在現在的莫斯科，偶爾試乘飛機，視為一種偶爾為之的有趣的玩意兒一樣！

我們的車經過真理報館前面的時候，看見正從該報館裏出發的四人一排的長隊，有男的，有女的，有二三百人之多，步伐整齊、精神抖擻、邊走邊唱歌、我們詢問招待員，才知道這些都是該報館的工人，於工餘集隊到運動場去的。數百男女工人成群結隊，邊走邊唱，歌聲和步伐聲相和，我們在這天遇着好幾起，他們那種振作的精神和態度，很引起在車內的『一群孩子們』的興趣和注意；在車內忽而聽見這裏有一位男朋友笑着喊道：『看！那邊又有一隊來了！』忽而又聽見那裏有一位女朋友笑着喊道：『看！那邊又有一隊來了！』這些隊伍走近我們的時候，我們停車讓他們過去，他們看我們的模樣，知道是來觀光旅客，都欣欣然笑容可掬地舉手對我們歡呼，我們也爭相舉手歡呼相應。我心裏想，這些在別國都是貧民窟的人物，這裏是別有天地啊！

這天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也引起我們特殊注意的，當然還有紅場 (Red Square)，克倫姆林 (Kre-

目已，和列寧墓等，但此時只從外表看看，所以想等到後來有過較仔細的觀覽後，再作詳細的敘述。

一九三四、十二、二八、下午。倫敦。

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莫斯科是新社會的中心「實驗室」，是蘇聯努力建設的指南針！關於這新社會的種種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等等——除了極大規模的農場外，莫斯科都有供你研究的機關和材料，無論你的專門研究是什麼，所以有人說，倘若你在蘇聯僅能作短時間的勾留，如能對莫斯科有詳細的觀察和澈底的了解，對於蘇聯的了解也可獲得概要的觀念了。記者在蘇聯約六兩個月的勾留，其中有過半的時間用在莫斯科，但還不能說到「詳細」和「澈底」，只能就所看到聽到的範圍談談。

暑期大學的同學們在上半天演講，下午天參觀，我們於七月廿三日起開始參觀，第一次去看的是中央文化休養公園 (Central Park of Culture and Rest)。

這個公園沿着莫斯科河，面積達八百英畝之廣，裏面有森林，有種種運動遊戲的場所，有游泳沙灘，有休養院，(他們通稱為 Rest Home，裏面有夏季冬季日浴的設備，有音樂合奏會堂，有閱讀室，有臥室，並有醫生和看護，) 有兒童村等等。有這樣大的範圍，一天決看不完的，我們在這一天看得特別詳細的是兒童村。

這個兒童村佔着該公園的一個部分，有許多建築和花草，有許多戶外草地上關於種種兒童遊戲的設備，都是專為兒童而做的，規模也就不小。我們初進去的一所建築有個大會堂，三面都是大玻璃窗，窗外便是欣欣向榮的藍花綠草，陽光和空氣的充足是不消說的；裏面排着不少小椅，壁上掛着不少圖畫，也都是專為兒童而設的。我們一走進這大會堂，就有人知照兒童們都在睡午覺(時為下午三點鐘)，叫我們要十分的靜寂。我們當然也十分小心，走時蹣手蹣足，說時附耳竊語，等一會兒聽見無數兒童的

輕柔悅耳的笑聲，知道他們的午覺時間已過了；我們都急於要看看他們，從窗口或門口向外望，只見一羣一羣的兒童由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保姆領導着在草地上玩。這時正在夏暖的氣候，這些天真活潑的兒童都只穿一條短褲，那紅潤細嫩的肢體都全露在外，看上去簡直好像圖畫上繪的『樂園』中的無數的『安琪兒』！這樣細嫩的健美的兒童，在西歐各國的貴族或布爾喬亞的家庭，似乎是無足希罕的常事，在我們這羣參觀者所以感到特殊興趣的，是這些兒童乃生於一般的平民的家庭；據該村主任所述，依最近統計所示，在該村經過的這些兒童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屬於工人的，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是屬於傭員的，這當然是最足以使我們注意的一個要點。

該村的主任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女子，生得矮矮的，初看去好像是一個尋常『阿媽』的樣子，但且慢！當她在大會堂裏向我們這羣參觀者演講該村歷史和辦法時，那態度的鎮定，語氣的安詳，回答疑問的從容不迫，倒像是一個演說家！

該村成立於一九二八年，（莫斯科有三個這樣的兒童村，）專備在園休養的父母把子女付托該村看護。依工資付費，每月工資在一百羅布以上者付一個羅布零六十戈比克。在二百羅布以上者付三個羅布，在四百羅布以上者付四個羅布，兒童的膳食在內。（每日由上午十點鐘開至下午八點。）由團體保送——如工廠或機關——則父母只付半費，尚有一半由團體出。兒童年齡由四歲至十三歲，依年齡分組，各組的衣服有各組一律的顏色，一望而知，每組二十個或二十五個兒童，由一個保姆照料。每年經過該村的兒童有三十五萬個之多，這也是平民化的一個象徵。

我們走進一個兒童教室，看見一個男教師坐在一個矮桌後面的一張矮椅上，對着前面一列一列坐在地上的兩百個兒童講故事。他講的是俄語，我們聽不懂，只看見他講得十分起勁；有時嚴肅，有時笑，有時愁容滿面，有時眉飛色舞，大概是依一個故事內容而變異；看看那一大羣兒童，都聚精會神地

望着他，聽到嚴肅時，睜大着他們那可愛的巨眼發怔，聽到可笑時，笑聲哄堂。教師講完了一節，許多小手掌大拍一陣，嚷着再來一個！

其次我們看到的是該村的兒童戲院，坐滿着幾百兒童，（看去都是十歲以上的）張口待笑，神氣十足。台上正在扮演的戲劇是描寫債戶設種種可笑的推托，避免債主的逼債，和債主的種種可笑的貪鄙的劣狀，總之是形容資本主義的一種醜態。在蘇聯成人所往的戲院或電影院裏看不見兒童，因為他們有爲兒童而設的戲劇和電影。

還看見一個大玻璃屋，內有各種鳥類飛翔鳴吟於翠花叢樹間，使小兒童遊玩其中，接近自然。

又走進一個設有各種機械實驗室的屋子，那是專備年歲較大的兒童——十一二歲或十二三歲——玩的。這些都是小規模的真的實驗室，裏面的小發動機也會發出電力來推動機械的。我們在這裏面遇着一羣兒童，問他們是要幹什麼的，有的回答機械工程或飛機工程，有的回答化學工程或汽車工程等等，他們那種一本正經的態度，簡直使你想像在你面前的是儼然若干小工程師！

這些『小工程師』裏有些還拉着我們看他們的實驗，那些小手把機械的這部分關上，那部分開起來！忽而這裏的紅燈亮了，忽而那邊的藍燈亮了，他們不但小手忙，而且嘴上還要忙着解釋給我們聽，但是我們大家都含着一些微笑，所注意的却不在他們所乾乾解釋的科學原理，却是對於他們那樣一本正經的誠懇懇老老實實的樣子，感覺到非常濃厚的興趣。

還有兒童大食堂，用的當然也是許多小桌小椅。在那些列隊進去用膳的許多兒童裏面，有兩三個黃種兒童，看他們的面貌格式，似乎是蒙古人。

該村對於較大的兒童還有游泳池的設備。不過我們那天去看時，湊巧不是游泳的時候，所以只看見了水池。

第二天下午和同學們往紅場看十餘萬男女青年所舉行的『運動大檢閱』(Sports Parade)後，又和塞爾遜，司各脫(也是學校的美國同學)，和一位俄國女友彼娜，同往中央文化休養公園去看看，該園裏有幾處的路旁布置着奇大無比的偶像，(似是泥造的，)寓着種種譏諷的意味，若酗酒，懶惰等等，有一個偶像的舌頭長二三十尺，橫伸着，舌上有許多小火車在小軌道上，(這軌道當然也就造在舌頭上面，)是譏諷工作者不努力於工作而專說空話；我想有政權在手，却專會在通電上或文告上做功夫，而在實際上一無所爲者，大可看看！

我們後來在該園裏沿着莫斯科河的邊上走着，那河邊便是無數游泳沙灘的所在，有許多男女在那裏游泳，女的穿着游泳衣，男的穿着游泳短褲，塞爾遜和司各脫都被引起了游泳的興致，臨時租了兩條短褲，躍入河裏去大顯身手。我便和彼娜詳談蘇聯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彼娜年約二十四歲，在一個實業學校裏擔任算學教員，美麗和諷，能英語德語，未嫁，還想再入大學更求深造。

八百英畝的公園不能算小，但因爲遊的平民實在多，所以仍然使你感覺到擁擠。在園裏的寬闊的馬路上來來往往的固然是摩肩接踵；在各種運動遊戲——例如各種球類遊戲——的場所也滿山滿谷；還有一個露天(Open air)戲院，也擠滿了人，我們只能在遠處聽聽笑聲由那裏傳播出來。一面鼓勵人努力工作，一面也積極作娛樂上的種種設備，使人於努力工作之外也有相當娛樂的機會，這是我此時以及後來在蘇聯所得到的另一印象。

一九三五、一、二、晚。倫敦。

運動大檢閱

我們在莫斯科開始參觀的第二天下午（七月二十四日）看到莫斯科的『運動大檢閱』（Sports Para-
de）。據說這天是蘇聯的『青年日』，全國各城市都舉行這樣大規模的『運動大檢閱』。蘇聯每乘著對
於大眾有重要意義的事情，便動員大多數人作集團的遊行或檢閱，藉以鼓舞大眾的振作精神和前進的勇
氣。像這天在莫斯科所見的這種『運動大檢閱』，也含有這同樣的作用。

這天參加『檢閱』的男女青年有十餘萬人，下午六點鐘在紅場會齊受檢閱。到下午三點鐘以後，在
街上隨處可見健壯的男女青年列隊挺胸緊隨著軍隊向前進發。各隊男女都穿着運動衣。這運動衣的花
樣很多，顏色也不同，都很美觀，聽說都是由運動員所屬的工廠供給的，毫不取費。運動種類有駁船，
網球、足球、鎗擊、團體操種種。駛船運動員各人肩上一負着一把槳。拿網球拍的男女列隊而行者就有一
千五百人之多，網球本是有開階級才玩得起的，現在也這樣的『普及』化了，乘腳踏車的運動隊亦有
數千人，這些腳踏車也是工廠盡義務供給與該項運動員的。有許多男女青年的鎗擊隊，拿鎗作待擊勢，
他們和她們經過街上時都便走便唱歌，步伐整齊，歌聲宏壯，誰看了都要為之精神一振。不講全部的健
康美，就是許多健美的裸露着的臂和腿——想像幾十萬條的健美的裸露着的臂和腿同時突現於你的眼
際——也就够欣賞了。

在紅場各種運動員整隊前進，在每一處每分鐘走過者約以八百人計，也要三小時才走完！全體在紅
場中會聚時，萬頭攢動，蔚為奇觀，每隊向前進發時，莫斯科體育委員會（Moscow Physical Culture
Council）的領袖安梯樸夫（Antipov）等向他們行軍禮致敬，他們同時歡呼聲震天。安梯樸夫向全體詞

問：『你們準備好了嗎？』全體應聲：『準備好了！』這一問答是在蘇聯一種最重要最通行的問答。準備什麼？準備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並準備保護這新社會的防衛，說得簡單些，便是『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Prepared for Work and Defence』)。

『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這是蘇聯在現階段中積極提倡體育的最主要的目的：造成健康的青年，使他們能負起建設新社會所須努力的工作，並能負起防衛這新社會所須執行的責任。他們提倡體育，既把這個最主要的目的做出發點，所以：(1) 所謂體育，並非尋常所謂『運動』(Sports)——即拉長運動技術中一技之長，如快跑或跳高之類——所能概括，乃是爲準備能善於工作和防衛起見，使全部身體獲得有系統的和普遍的發展，因此於鍊身之中，同時要注意陽光、空氣、和水的盡量利用，使全身機構由此堅強；同時要注意在工作時候以及在家裏時候都有合於衛生的習慣。(2) 體育的實施，力求普遍於大眾，並不限於養成幾個打破記錄的運動員；所以在蘇聯，運動的組織並不以打破記錄的本身爲目的，最多不過藉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加，而且每兩年須由醫生檢驗身體，注重全部身體的健康，避免只顧打破某項紀錄而反致妨害全部健康的流弊，因爲這樣的運動員既不宜於工作，也不宜於防衛。我們只須看蘇聯的運動員，一來就是幾十萬人列成大隊，簡直只看見集團，不看見個人，便可概想所謂普遍化的意義了。(3) 增進健康，其主要目的不但在增加工作的精力，而且也在增加防衛新社會的實力，所以『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徽章非常受重視。這種銅質徽章上面鑄成一個運動員的模樣，並鑄着G.T.O.的字樣。(G代表俄文 Godovo, 意即準備；T代表 Toudon, 意即工作；O, Oborona, 意即防衛)。(4) 在這許多運動員的大隊中，你能看見不少男女青年胸前左邊掛有這樣的G.T.O.徽章。不但在這一天，就是你在平常夜裏到公園去看時，也可看到那時已脫下工作時的衣服，穿上漂亮衣服的女工們，在漂亮的衣服上也常掛有這樣G.T.O.徽章。這是他們或她們的榮譽！因爲要獲得這徽章，須經過許多類的

體育試驗及格，尤其注意的是近代兵士所必具的種種能力：例如瞄準（即開槍用的）、游泳、搖槳、騎馬、乘機器腳踏車，開汽車等等。得到這樣徽章的人，即表示對於這些能力都已具備，也即是表示已有『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的資格了：這當然是這新社會裏面的一個公民的榮譽。依統計所示，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在蘇聯六百萬『體育員』（Physical Culturists）裏面，經過試驗獲得G.T.O徽章的只有六十萬人；而在『運動大檢閱』的這天，據安梯樸夫報告，去年（一九三三年）獲得這徽章的已達六百萬，今年（一九三四）還只半年，獲得這徽章的又增六百萬：這是怎樣地猛進！『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是怎樣地在那裏猛進！

蘇聯關於體育方面的組織和計劃的中心是特設的體育委員會，下列各部分關於全部體育上的工作，都歸該會作統一的主持：教育人民委員部（即各國所謂教育部，下類推，該部所處理的體育工作關於學校和大學方面）；健康人民委員部（關於醫院、休養所、恢復健康的特殊區域）；海陸軍人民委員部（關於紅軍），和工會總部（關於各工會和各機關的體育組）。由這裏也可以看出體育所概括的範圍之廣。這無足怪，因爲『爲工作和防衛而準備』是大眾的事情——是爲他們自己的新社會而努力的事情。

一九三五、一、四、晚。倫敦。

托兒所

我們聽到『托兒所』這個名稱，也許覺得意義頗簡單，只是保育嬰孩的地方罷了；但在蘇聯『托兒所』這機關却和新社會的建設有很密切的關係。這偉大的建設工作要能成功，必須全國大家，不但男子並且女子，都要來參加，就女子自身的真正解放方面說，她們也必須從『家庭的奴隸』圈子裏面逃出來，共同努力於新社會建設的工作。而在這兩方面，托兒所都是一個要素；因為托兒所的第一目的是使女子在工作或求學的時候，不致受着看護孩子的牽累。此外就下一代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養成『健康強壯的一代，有鋼的腦經，鐵的筋肉』（列寧語）。

現在蘇聯女子參加建設工作的，女工近六百萬人，（一九三二年統計，下同）約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從事專業的（Professional）亦近四百五十萬人；共計在千萬人以上！（在學校受着訓練，同時從種種方面參加社會活動的尚不在內。）而托兒所的數量也隨之俱增。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城市托兒所的小兒自五萬六千餘個；增至三十六萬餘個，鄉村托兒所分兩種，一為永久托兒所，一為暫時托兒所（即每年農忙的幾個月），在同一時期，前者的小兒自八千五百餘個增至三十四萬餘個，後者自二十五萬餘個增至四百五十餘萬個。（按每個托兒所容嬰孩約自五十至一百，又上述統計均見蘇聯健康人民委員部的國立婦孺保護研究所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報告）。

記者在蘇聯看到的托兒所有六個。一個是火車站附設的，一個是大工廠附設的，三個是農場附設的，還有一個是大學校附設的，這些托兒所的原則雖是一樣，但是辦法也有簡略和完備之不同，就記者所看到的而論，大概城市的比鄉村的完備些。在這六個裏面，我最覺得滿意的是那個工廠和大學所附設的

兩個——尤其是那工廠所附設的。

最先看到的是七月二十六日參觀的莫斯科火車站托兒所。據說兩年前由政府決定每個車站均須有一托兒所，以便婦女們在買火車票的時候，（因人多，常須列在長隊中等候，所謂「尾巴」），或是初到一地，下火車後須先往探訪親友等，可把嬰孩交給該托兒所看護。全國已設的這類托兒所已有一百五十處，這天所參觀的是最先開辦的。屋爲兩層，初進一室爲家屬送入嬰孩交醫生檢驗的房間，由醫生檢驗後，如有較重要的疾病，即送往醫院，小病另置一室，不與其他嬰孩混處，無病者即由看護婦抱入浴室，洗浴更換該所特備的衣服。該所所收的兒童自一二歲至七八歲。大的年齡較在他處所見者爲大。臥室和遊戲室都依年齡分開。較大的兒童有閱讀室，在這閱讀室裏，我們看見有一群兒童圍坐在一個小長桌旁，一個『教育看護』正在講故事給他們聽。遊戲室有種種兒童玩具，有三四十兒童在裏面玩。最小的有十個左右，便在臥室小榻上睡覺。據說有十四個『教育看護』，五個『醫看護』。這個托兒所規模很小，而且我們都覺得在整潔上還欠工夫，例如小榻上的白色被單有的還欠潔淨，我在這裏所得的印象不見佳，後來見到該站站长，他自己也不滿意，說地方狹小，已在附近尋得一個較大的地方，有草地，不久即將遷移整頓。

我心裏很渴望着能看到一個可作模範的托兒所。八月十二日看到紅偉橡皮廠（Red Giant，也在莫斯科，）所附設的托兒所，才使我感覺到滿意。該廠有工人八千，專爲該工人所附設的幼稚園有六個，托兒所有四個，我們所去參觀的就是這四個裏面的一個。

我們一走進大門，就看見一個很大的花園圍着那四面鑲滿着大玻璃窗的專爲嬰孩們建造的兩層的整潔的屋子。進到屋裏去參觀的須穿上該所特備的白色罩衫。（像醫生或看護穿的。）我們那次去參觀的男男女女有三四十人，該所爲來賓特備白罩衫只有十幾件，而且因爲不許驚擾屋內孩童們的安寧，每次

也只許十幾個進去。因此我們只得分班輪流進去。我輪着第二次，但在未進去之前，在屋外園裏所見時也就够有趣。該所收容的兒童，自一歲至三歲依年齡分組，每組穿着同色的短褲，數人或十餘人爲一組（大概依年齡大小爲標準），由一個看護婦領導着。我們在未進屋前，在園裏就看見好幾組這樣健康活潑滿面笑容的『天使們』，一羣一羣地分散在那廣大的綠油油的草地上；有的一羣圍着一個看護婦坐着，由她對他們很低聲柔和地唱着歌，他們便睜大眼睛微笑地欣賞着；有的一羣圍立着一看護婦，依着他的歌聲大家做集體舞。尤其有趣的是俄國集體舞除一個圓圈外，在園內還有兩個單獨舞着做全體的指導，在這樣一羣小把戲（都僅在兩歲半左右）的集體舞，居然也有兩個小把戲在園內盡這樣『指導』的職務，那種一舉手一動足的儼然認真的態度，誰看見了都要失聲而笑的；有的一羣散坐在有陽光的一角，實行日浴；有的由看護婦依着有圖畫的小冊子，講解給他們聽。有許多看見我們走得近了，舉着小手叫我們做『家家』（俄語『叔叔』的譯音），或是『左家』（俄語『姑母』的譯音），那種天真爛漫的憨態，引得我們粲然。看護婦有的中年老成，有的年青貌美（以後者爲多），對於兒童和婉細心，循循善誘。我還看見有些看護婦用熱度表爲兒童量熱度，聽說這也是按時照例的工作，防備兒童萬一臨時發生了什麼疾病；因爲這樣小的孩子自己不會說，一切都須看護的留心。

既而第一班到屋裏去看完了出來，夾在第二班裏的我，只得把對園裏的興趣攔住，穿上了白罩衫，一同到屋裏看看。我們便看便驚嘆！屋分兩層，上面已說過，下層備較小的孩子，上層備較大的孩子，各層都有兒童初來時的檢驗室，有矮欄桌子，驗後即在該處換穿該所特備的潔白的衣服。有蓬浴室。大臥室裏油漆的地板，潔白的牆壁和天花板，充足的陽光，新鮮的空氣，一排一排的小榻上所布置着的枕被都是平伏潔白的，有的臥室裏幾十架小榻是木製的，有的臥室裏幾十架小榻是小鐵牀，但都是漆得雪白，整潔異常。各臥室依年齡分，小榻的大小也依年齡而有不同。備最小的嬰孩用的小榻還有高的圍

。較大的孩子所用小榻前，都有一張小小的直背椅。膳室裏的設備也依年齡而異，那些整潔的小桌小椅都引起我們的深切的興趣。第二層是預備較大的孩子（至多三歲）用的，盥洗室裏面各人有各人的掛面巾、置牙刷等物的架子，各有一個小袋放置各人的手巾，各袋上有花木或鳥獸的圖畫（有各種顏色的），以作識別。（各孩童的身上也掛有一個小袋，裏面放着小手巾。）冬夏臥室不同；冬天在室內，夏天在廣大的亮台上，（三面裝有大玻璃窗，像花棚，）而且室內的溫度要依一定的規定。（由醫生規定。）膳室也不同，冬天在室內，夏天在圍裏的草地上。另有一個隔離的部分專備有微病的孩子住的。此外還有一個醫藥室，備急救等的需用。全屋裏的一切設備都可稱為整潔。該所主任是一位中年的女子，她也穿着整潔的白罩衫，欣欣然引導我們參觀，我覺得她的『欣欣然』確有充分的理由！

我如有小子女可送進托兒所，送進前面所說的那個火車站的托兒所，我老實說還不能安心；但送進這個工廠所設的這個托兒所，我實在可以十二分地放心了——我想凡是做父母的都可以放心。

這個托兒所可容一百二十個嬰孩，現在僅有一百個。看護婦三十五個。嬰孩的母親每月工資在一百羅布以上的，每月付費十五羅布；少者照減，乃至完全免費。

一九三五、一、十二、晚。倫敦。

婦孺衛護博物館

博物館在蘇聯也是遊歷者所必須看的一類重要的東西——比其他各國的更重要，這是因為其他各國的博物館多為古文化的墳墓，而在蘇聯的博物館却多和他們的現代生活——和現代生活有關係的歷史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意義——聯絡起來。還有一點可注意的，便是博物館大眾化，是為勞苦大眾而設立的；因此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莫斯科的博物館只有二十三個，而且只備少數專家和有閒階級來賞鑑的，現在莫斯科為適應大眾的需要，僅在這一處已有一百七十七個博物館了。

記者到莫斯科以後，第一個看到的博物館是婦孺衛護博物館（Museum of protect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這個博物館成立於前年（一九三三），為公布衛護婦孺法律十五週年紀念而設立的。重要目的有二：（一）灌輸關於衛護婦孺的知識於一般民衆，（二）協助此種衛護人材的訓練。

記者於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去參觀，認為在蘇聯所看的博物館這是最科學化最整潔最能喚起我們興趣的一個。

館屋是一所新建的洋房，分上下兩層，第一層是關於婦女材料的陳列，第二層是關於兒童材料的陳列。各層雖不很大，但布置得非常精緻，第一層的大廳中央有一個半圓台，有銅欄杆圍着，備演講時的需用，應的因適便是布置着關於婦女自革命以後所受到的種種解放事實表現。例如關於法律上的平等，社會事業上的平等，都有若干很精緻的大幻燈懸掛着，在這幻燈裏現出新舊狀況的差異，因為在這幻燈上有很強的電燈光襯托着活龍活現的種種繪畫，在幻燈的玻璃片上呈現出來，使人獲得深刻的印象和濃厚的興趣，在幻燈的下面便有特製的漆好的木板上刻着綠色的字，說明有關係的新舊的法律或事實，使

人一目了然。試舉一二具體的例。在未革命前，婦女僅是家庭的奴隸，一天到晚偏促於厨下，拘束於子女，毫無機會發展其卓越的能力為社會事業努力，革命後便在事實上給與婦女以參加社會事業的機會，有一個幻燈上便映出兩部分的情形；在一邊，便繪一個婦女從事社會運動，在一個演說台上，對數百成羣的仰首集中着注意力的羣衆，作熱烈的演說；在另一邊，便繪一婦女愁眉苦臉在厨房裏消磨她的光陰和志氣。在未革命前，婦女不幸有了一個私生子，便受盡社會的唾棄，人生的磨折，革命後凡是生了一個孩子，無論已否正式結婚（即經過婚姻註冊）都是社會的正式的一員，做婦女的絕對不必因此受到社會的唾棄，也不必因此受盡人生的磨折。（也許有人看到這裏，覺得這豈不是提倡所謂「軋餅頭」嗎！這要在談到婚姻制度時研究，此時請且慢下判斷。）又有一個幻燈上也映出兩部分的情形：在一邊便繪一對正式的夫婦攜着一個孩子，這男女和孩子都穿着非常時髦講究的服裝，男子手上拿着一根「斯的克」，一塊兒興高采烈趾高氣揚地在街上大踏步地走着；在另一邊，便繪一個衣衫襤褸的可憐女子，攜着一個捉襟見肘的可憐孩子，孤苦零仃地在風雨中發抖。法律條文本是很枯燥的東西，但是經這樣渲染陪襯，便增加一般人的注意。

此外還有種種大相片，用事實來表現革命前後女子在社會上及專業上地位的差異；還有關於婦女生產或墮胎的種種關於看護、保護、及衛生的相片，用很精巧的鑲好玻璃的白銅框裝好疊置，依類放在一起，有白銅的搭子聯繫着，看時將各層的白銅框依次翻開，好像翻開一本靠在特製的架上的書似的，關於各種相片上都有詳細的說明，此類相片的內容都注重科學方法和增進健康的宗旨；還有關於種種的統計，也用相類的有趣的布置方法，喚起看者的特殊注意。

總之在這第一層的布置和陳列，好像一部很有趣的婦女解放史。在別的國家裏，我們也常聽見嚷着「婦女解放」的聲浪，但僅限於「聲浪」，並未在實際上有什麼根本的解放，蘇聯在這一點便不同，因

爲已在實際上實行了根本的解放。(婦女要在實際上獲得根本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真正實行，也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這方面，記者當另作專篇研究。)

第二層是關於兒童的材料。有許多燈光陪襯着大幻燈，映出兒童種種實際生活的影片。看的人好像倏忽間置身許多天真爛漫笑鬨迎人的『安琪兒』的『樂園』裏面。這裏面有許多是全國各處托兒所的影片，有許多在鄉間的托兒所，你可以在影片裏看見這班小把戲，一羣一羣由看護婦領着在森林叢樹裏，草原清溪邊，(有許多影片上染着極鮮明的各種顏色，逼肖那美麗無比的自然界，)有的作團體遊戲，有的作單獨欣賞，稱爲『樂園』中的『安琪兒』，可謂名實相符。最有趣的有一套幾十張幻燈上的影片，專描寫兒童自呱呱墮地後直至三歲時的生活發展的實況，以及養育的程序；據其中所示，一個嬰孩在產生十六個月後即有幾個年歲相近的小把戲聚在一塊兒做他們的集團遊戲，開始他們的集體生活。有幾個玻璃櫥裏面陳列着兒童自產生後到三歲時的各時期中所需要的食料模型，有糕餅，有青菜，有肉類，有其他等等，不但形式逼真，更加上逼真的原來的顏色，做得維妙維肖，看上去就好像是真的東西陳列在裏面，各物不但依各期需要的前後陳列着，而且連需要的分量都有科學的研究。母乳需要到一歲，但在產生六個月後，即逐漸加入其他相當的食料，每三小時需要哺乳一次，在櫥裏陳列的東西還有一個更有趣的，是玻璃製的嬰孩的胃部，表示消化的情形；有三個這樣的胃部陳列着，表示哺乳一小時後，嬰孩的胃裏把所吸入的乳消化到什麼程度，兩小時後怎樣，三小時後又怎樣，我國老法，嬰孩一哭，母親或奶媽就把奶頭往他的小嘴裏一塞，簡直一天吃奶吃到晚，要用科學方法來表示，倒不容易！

此外關於兒童衣服，兒童玩具，也依他們的年齡大小，有很仔細的研究和豐富的陳列。

在這第二層的布置和陳列，好像一部很有趣的『嬰孩養育研究法』，專研究如何保養教育自產生後

至三歲的孩子，不！豈但自產後！女工在產前就有兩個月的假期（產後亦兩個月，工資均照付），即有婦女衛生商榷處加以種種指導和協助，可以說嬰孩在娘胎裏就受到衛護了！

這一部『婦女解放史』和一部『嬰孩養育研究法』並不是『紙上談兵』，却是已在實施的事實的記述，這是真正價值的所在，尤其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這個博物館的館長是個三十幾歲的女子，生得很體面。身裁頎長，態度端莊而靈動，衣服剪裁入時，能英語德語，德語尤流利，後來和她談談，才知道她在德研究兒童教育多年，她說在德女子有才無處用；在蘇聯，女子有多大才能，即可盡量用她的多大才能；所以她回蘇聯後非常的愉快，現在即用她的全副精神辦這個博物館，把這樣的努力看作她的無上的光榮和幸福，她和我們談到這裏的時候，精神非常的興奮，眉飛色舞，滿面笑容，好像發現着什麼無上至寶似的！我們這羣『孩子們』也不自覺地受到她的感應，精神也隨着她興奮了許久，圍着她發怔地靜聽着，好像不想再走開似的！

我的心坎裏尤其有說不出的感慨：有一條大道護人可以努力，這決不是開倒車的國家所能夢想的事，在那樣開倒車的國家裏，有許多有志氣有作爲的男女青年，就不知把全副精神用在什麼地方，甚至就沒有機會給他們努力，倘若他們不自暴自棄地同流合污地隨着一班混蛋開着倒車，擱着墳墓！他們真要幹，就不得不先排除障礙，打開一條可以幹的『大道』來！

一九三五·一·二十·晚·倫敦·

幼稚園

蘇聯自努力進行新社會的建設以來，對於教育方面的猛進，有很多驚人的成績；本文所談的只是『學校以前的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的基本的概況——幼稚園，所謂『學校以前的教育』，所以有這個名詞，大概是因為兒童進初等小學之後，才算正式入學，在這時期以前所受的教育便叫做『學校以前的教育』，牠的範圍原可包括托兒所、兒童遊戲場、和幼稚園，但以幼稚園在教育的意思上更重一些，所以可算是這段教育的基本的樞關。托兒所收容的兒童大概自兩三個月至三歲，幼稚園所收容的兒童大概自三四歲至七八歲。新社會的建設，關於政治的和經濟的種種方面，蘇聯女子的努力參加和所表現的成績，和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因此在數年來爲着實際的需要——使婦女們得抽身參加社會的事業——不但托兒所的数量大增，幼稚園的数量也大增，原定計劃，在一九三二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了）須使五十萬兒童受到『學校以前的教育』，而因實際的需要和積極進行的結果，一九三一年受到這樣教育的兒童的實際數目達三百萬，一九三二年達五百萬，最近達七百萬，其中有一百萬以上的兒童在幼稚園裏面，培養新社會的下代分子——使這新社會能有更燦爛鞏固的未來的中堅——這是如何重大的工作。他們從事這工作的人，都是用十二分的熱誠來幹的，所以有這樣空前的猛進。

記者於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參觀莫斯科郊外的一個幼稚園，是一個橡皮廠所附設的，在一個森林裏面，蒼鬱翠綠，成爲天然環境，屋分上下兩層，屋外有一大園圍着，和以前談過的紅偉廠的托兒所相彷彿，不過因年齡的差異，設備上有些不同，下層有浴室、藏衣室、換衣處等；上層有大會堂、臥室、作業室等，空氣和光線都是十分充足的；小榻、小椅、小桌、小衣櫥等等，都布置得非常整潔，在浴室裏

裝有白瓷面盆，裝得很低，恰够兒童們立着可以自用，因為無論在托兒所或是幼稚園，凡是兒童自己可以幹得來的事情，總是讓他們自己去幹，看護或教師至多在旁指導或看着，決不越俎代庖的，這是要從小就養成他們的自立的精神，浴室外有特設的小櫥，櫥分若干直格，每格裏面掛着一個兒童的毛巾，在這一格裏還有個小厝，上面放着他的肥皂，牙刷等等，每格各有一門，我們正在觀察的時候，適有一個四五歲模樣的女孩兒走過，笑颯颯地順便把她的一格小櫥開給我們看，裏面的確十分潔淨，掛的是雪白的毛巾，小厝上的東西都擦得乾乾淨淨，放得整整齊齊，我們在這可愛的女孩的音容笑貌上看得出她心裏的欣悅和自豪的情緒！我覺得這小女孩子也的確是可以欣悅和自豪的啊！我們看後，她笑颯颯地輕輕把櫥門關上，輕盈地跑躍着到花園裏去享她的自然界的欣賞幸福去了。

上層裏所布置的臥室遊戲室等，和所看的托兒所裏的大同小異；四面充滿着迎接日光的露台和引進空氣的玻璃窗，也和所看到的托兒所一樣；最大的異點，是在作業室的更爲「技術心理」化，即使兒童們進一步養成他們的「技術心理」。

在這作業室裏有種種工業機械上用的具體而微的比較簡易的工具，和製造用的木料金屬等，室的四周便布置着兒童們製成的小物件。這類的作業，是要使他們遊戲之中，獲得「術技心理」的修養。據說『國立兒童出版局』對於這些兒童教材的編印，也要於其他要點之外，注意到「技術心理」的培養，這是根據他們最盛行的一種口號，叫做「技術的克服」(The conquest of technique)。

這個幼稚園收容四歲至七歲的兒童，共有一百五十個。據說每月的膳食費用達八十六個羅布，但家長只依工資多寡爲比例付費，最低的每月只付兩個或四個羅布，該園除主任外，有女教師十二人，醫看護一人，教育的工作，除上面所述的作業外，有各種遊戲，故事講述，散步，輕易的家務工作，團體，衛生的注意，清潔習慣的養成，以及繪畫寫讀等等。

因為這個幼稚園離城市中心頗遠，我們去時路上費了一點多鐘，所以這天下午我們到的時候已不早，有的兒童已被父母領回去了；我們還看見有的父親或母親正在換衣處幫助他或她的孩子換衣服，準備帶回家去，同時在園裏的草地上還剩有七八十個孩子在那里玩，有一羣（約十幾個）最小的孩子在幾個小桌上的水盆旁玩水鴨（玩具），有的一人玩，有的幾個同玩；幾個同玩的有說有笑，有的拍掌叫好；但也有一兩個不知道爲着什麼不平的地方，努着嘴發脾氣，有的張開小嘴巴對其餘的提出嚴重的抗議，由旁邊的女教師來解釋勸導，才言歸於好。孩子們多喜歡玩水，我在園內每看見有的母親因孩子玩洗衣盆裏的水，或甚至玩着溝裏的髒水，叫破了喉嚨地大罵大罵，其實在這樣有相當指導之下玩着水，反而可以含有教育的意味，兒童們也省得動輒得咎，好像滿地荊棘似的！

還有若干較大些的兒童，此時正在草地上隨意地玩，有一處用粗的竹竿在草地上造成一種疊羅漢式的架子，底下的一層特廣，向上漸少漸尖上去，數十兒童可爬上這個架子，在各層上分開立着或坐着，成爲疊羅漢的式子，不過因爲有竹架撐着，不必像真正疊羅漢那樣吃力；可是兒童們這樣爬上爬下，掉換地位，或坐或立，也在遊戲中無形地含着運動的作用，而且由一羣分工合作地造成一個全體，還含有「成隊工作」的訓練意味。（「成隊工作」是我杜撰的名詞，在英文是所謂“band work”，這個名詞頗不易譯，例如足球比賽，各成一隊，每隊的勝利，全視全隊各人在分工中還能合作，一人撒爛污也許要妨礙到全隊的勝利，這便是「成隊工作」。）我們來時，這個架子正空着，有三四十個兒童看見我們來了，臨時自勵地聚攏來，很迅速靈敏地爬上架子上面去，好像一羣猴子爬樹似的，剎那間造成一個疊羅漢的形式，在頂上中央的一個還拿着一面小紅旗揮着，全體笑着揮手向我們歡呼，當時這一大羣小弟弟小妹妹們的那樣起勁的樣子，熱烈的神情，活潑潑的舉動，都深深地永遠鑄印在我們的腦袋裏。

我們來參觀的這羣「孩子們」——比較起來可說是「大孩子」——也歡欣鼓舞着，不約而同地歡呼

相應。他們散下來之後，『大孩子』和『小孩子』混成一團，你抱一個，我拉一個，說的說，笑的笑，可惜我們都不懂俄語，說時彼此不懂，只有笑可懂！只有他們笑着叫我們做『家家』（叔叔）或『左家』（姑母）——其實他們太客氣，我們只想做他們的哥哥和姊姊——那天真爛漫笑容可掬的玫瑰紅的小臉上的表情，我們懂！

後來『小孩子』越集越多，『大孩子』應接不暇，他們一點不怕陌生，我們裏面有幾個『始作俑者』：有的一邊手拉着一個快跑；有的雙手拉着一個孩子的雙手，提起他的身體，前後左右轉着身，兜兜轉轉，不料他們的興趣好得不得了，跑了又要跑，轉了又要轉，強你跑個不休！轉個不休！我們裏面有好幾個穿着高跟鞋的女學生，更易吃力，但是他們並未想到這些『叔叔』『姑母』吃力不吃力，所要的就是跑了再跑，轉了再轉！有許多『叔叔』『姑母』都出了一身大汗，額上的汗珠如豆地向外滾，有幾位『姑母』更噁噁地胸部起伏地喘着氣！

我們雖都覺得很疲頓，但却都覺得很快樂。

佛勒格機械廠

蘇聯是「工人國家」，所以遊歷蘇聯的人對於蘇聯的工廠情形，感到特殊的興味。

記者於八月一日在莫斯科參觀的佛勒格機械廠 (Frager Plant) 是最先看到的一個工廠，該廠是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新建立的一個重要機關，歸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管轄，成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專製重工業用的機件原料，現有工人四千五百，其中百分之五十為女子，都在車床機 (Lathe machine) 上工作，據廠裏的「技術長」(Technical director) 說，女子工作的成績並不遜於男子，關於需要特別謹慎和潔淨的工作，女子工作的成績更優於男子，在兩年前，工人多由鄉間來的，都缺乏經驗，初辦時很感困難，經過一番辛勤的學習和訓練。現在所有的四千五百工人都成了合格的熟練工人了，工人的年齡自十九歲至二十歲，最小的為十七歲，其中大多數在最初即參加該廠創辦時的艱難工作，工程師和技師共有三百八十人，都是在十月革命後造成者，在這些工程師和技師中有十五人為女子，該廠的實驗室即為一位女工程師做主任，主持一切，該廠現有兩千架車床機，都是由蘇維埃的工程師和技師建造的——關於這一點，以後看到的各工廠，引導參觀的廠長，或技術長，或工程師，都對我們特別欣然地指出，很自豪地聲明，因為這是他們在技術上已能自立的一種表現。

我們同去參觀該廠的學校男女同學約六十人。到時已在下午三點鐘，該處在兩年前還是一大塊荒地，現在却遠遠地就望得見一所聳立着的四面鑲滿了銅邊玻璃窗的新式的廠屋，屋的四周有很大的廣場，上面種有花草，這在他們也是一件不足奇的常事，因為他們不但要使城市花園化，也要使各工廠花園化。

我們到時，先在該廠的大廣場上看見剛輪到下工的一班工人——看上去約有千人左右——正在開會紀念廿年前的世界大戰，有一張大長桌，上面罩着紅布，有一位工人正在那裏大聲演說，許多男女工人們便圍成一個大半圓圍很起勁地傾聽着，我雖不懂俄語，但可猜想得到那位「普羅」仁兄所激昂慷慨大聲疾呼的，一定是在那裏大罵帝國主義的分贖的戰爭——伊里奇所謂「用來解決德英強盜誰來統治全世界的戰爭」！我們所見的這班男女工人，都穿着做工的衣服，當然不會講究，但他們的容態都表現着康健的體格，這也很足以引起我們注意的一點，在演說的短時間的休息中間，還有工人們自己的軍樂隊奏着軍樂，怪熱鬧，他們看見我們這一大班「外國人」擁着一大堆，眼巴巴地望着他們，也對我們注意。大概知道這又是向他們來「觀光」的；他們有許多「光」給許多人不遠千里來「觀」，這在他們是多麼一件可以自豪的事情啊！

他們的會還未開完，我們就被引導者領到廠屋裏面去了，先在一個大會堂裏由代理廠長的技術長向我們略作報告，我們裏面也有人提出幾個問題問他，但因為我們要看實際的情形，所以不到三四十分鐘模樣，便離開了大會堂，爲着人數太多的緣故，分作三隊，分開各往該廠各部分去輪流察看，我所參加的那一隊剛巧是由技術長領導，解釋得特別詳細，該廠屋分兩層，在外面看去好像有平常房屋四五層的高，這是因爲這兩層的內部都是很高的，這對陽光和空氣的充足有着很大的關係，幾十架一組的車床機很整齊地排列着，各機間的行人道和各機間的距離都有充足的空地，沒有擁擠的樣子，各部機械工場的溫度，都由一個特備的房間裏許多「密特」(Meter，特製的量溫度的表)控制着，使得各工場裏獲得適宜的溫度。

我們一隊每到一部分工場的時候，都三五成羣地圍站着各機旁觀看，最使我注意的仍是上面提過的一點，那便是這些很起勁地運用着機器的女工，個個都有着健康的容態，沒有疲頓的樣子，我們有

幾個人圍着一位正在車床機旁忙着工作的女工看了許久；看她兩手忙著工作，看她的身體在機旁前後移動，看他俯身整理機件，看她的睛眼，看她的嘴唇，看她的面孔，十幾個眼睛不轉瞬地盯住她看！也許看得太久了，這位年齡不過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大概被我們看得不好意思起來，不禁常常轉着秋波作嬌然的媚笑。

我們裏面有幾位女同學學了幾句「洋涇浜」俄語，附耳竊語地偷問着這樣在工作的兩三個女工，問她們「你喜歡你的工作嗎？」她們都笑着回答說：「喜歡！」同時她們很注意這幾位「美國小姐穿在身上的剪裁入時的服裝，有的還問着這種服裝的價目，這也是一種「女性」的自然表現罷。

工場中各部分機器的彼此聯絡的關係，有詳圖作有系統的詳細說明，使人一看，對於全部分的工作程序，瞭若指掌，所有出產品也有實物的陳列；使僅學某部分工作的工人也明白全部分的情形。

該廠技術長對我們說，他曾經看過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數百個工廠，但却尋不出有一個和本廠合於工人健康的一樣建築，記者寫此文時，還未到過美國，未能判斷他這句話的正確性，但我們裏面大多數是從美國來的，有一個是從英國來的（英國人），他們聽了也都沒有話說。

該廠附設有幼稚園，工人補習校，工人升學預備科（他們稱為 Workers' Faculty，備工人預備升入大學用的），這天都來不及看到，此外他們還有技術宣傳部，研究並宣傳外國與該廠工作上有關的最近發明等等，他們自工程師技師至工人，都是一面工作，一面繼續不斷地研究，使經驗和學識兼程並進，時時在進步的途程前進，據該廠技術長告訴我們，這也是他們所很注重的一點。

該廠關於管理方面分三部分：（一）廠長（Director），由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徵求工會同意後委任，負責主持全廠行政，不在時由技術長代理；（二）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其主任由工人舉出，是工會在該廠的分部，（蘇聯的工會是依工業部門分的，不是像各國依行業分的，）是代表工人

參加廠務的組織；（三）黨的委員會，其主任由黨委派，代表黨的政策，同時和工廠委員會共同努力於工人生產力的增進，和工人在經濟上、文化上、工作環境及生活環境上的種種改善，這種管理上的組織，各工廠都相同，其詳細作用，說來話長，但卻很關重要，在這可先指出的，是剝削的制度既不存，沒有任何部分替任何私人謀得『利潤』，所以在管理上的這三部分也就易於和衷共濟，不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永遠立於敵對的地位。

該廠黨員三百人，我們問黨的委員會主任，這些黨員在廠裏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他說在目前用全副精神增進自己的技能，同時並努力協助其他工人增進他們的技能，以促進生產力為第一義。

我們參觀到一個工場，裏面掛着一面紅綢製的大旗，據說是該部門全體工人在『社會主義競賽』成績最佳的優勝旗，是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特別努力——增加生產——的最高榮譽，已掛了三個月，因為這三個月都是處於優勝的地位，倘有他部門的生產力追過他們，這面優勝旗便要改掛他處。

工人每日工作七小時，較重的工作每日六小時，工資每月最少的一百十個羅布，平均由二百五至三百羅布，房租每月付所得工資百分之八，每年每人得例假自兩星期至一個月，工資照付；例假時期長短依工作輕重而定，廠長每月一千五百羅布，工程師每月自六百至八百羅布，工資上還有這樣的差異，這也是我們所注意的一點，我想在下面另外一篇通訊裏提出較詳的討論。

一九三五、二、二、晚·倫敦。

結婚和離婚

記者因想記述參觀莫斯科民事註冊局（即結婚或離婚的註冊機關）的情形，覺得應該先把蘇聯關於結婚或離婚的法律要旨以及親屬間的關係，提出來談談，這樣可以得到明晰的概念。

讓我們先研究關於結婚的方面。

明瞭而強固的關係，在蘇聯認為這是屬於個人的事情，所以並不加以瑣屑的干涉，但對於兒童的幸福保障方面却加以鄭重的注意，這一個要點可說是蘇聯婚姻律的骨幹。

此外還有一個要點，便是在婚姻律上，男女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蘇聯結婚，用不着什麼儀式，不過為保護結婚者雙方的以及他們子女的幸福健康起見，倘要在民事註冊局登記，須遵守左列的條件：

（一）男女兩方須達到十八歲的年齡。惟各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團得根據各地方的生活情形，酌為婦女減低此項年齡限制，但至多不得過一年。

（二）男女兩方的健康情形，須將實情彼此相告，依蘇聯法律，傳染花柳病給對方者，須坐牢三年。

（三）婚事登記須得雙方同意。

（四）在未登記以前，男女雙方須互告：曾經結婚過幾次，前次的婚姻是否脫離，有無子女遺下；因為法律對於以前遺下的子女以及有病或無能力工作的對方，都有贍養的責任（詳見後），這種責任不得因再婚而擺脫的。

〔五〕當登記時，須言明用誰的姓，男的可用女的姓，女的也可以用男的姓，或各人仍用原姓，都聽便。

依蘇聯的法律，男女同居即是事實上的結婚，不登記也有同樣的效力。所不同的是經過登記的，倘有離婚的事情發生，發生贍養子女等問題，須由國家出爲主持時，證據已有，未經登記的，須先由法庭鑒定確已結婚的證據，然後才能持證赴民事註冊局辦理離婚登記。法庭所根據的證明是同居的事實，共同的家，對第三者的書信或其他文件上有承認已有婚姻關係的語言，在事實上已共同擔負子女的教育等等的事實。婚姻登記不登記，聽本人的便，這是因爲承認兩性間的關係是屬於個人的事情；不登記的婚姻和登記的婚姻負有同樣的責任；這是保障子女和任何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婦女方面，所以在蘇聯，什麼「通姦」，「軋姘頭」，「私生子」等等名詞，根本都不存在。

有下列情形者不得依法登記結婚：（一）男女兩方面或任何一方已結婚而尙未解除者（無論係登記的或不登記的婚姻）；（二）男女兩方面或任何一方患有神經病者；（三）直接血統的親屬，兄弟和姊妹亦在內。

關於財產方面，在未結婚前，夫婦各人所有的仍屬各人所有，惟在結婚後的財產則屬夫婦所共有。在這裏有一點頗可注意，即如有妻子在家裏管家，她的工作也被認爲和丈夫的工作有相等的價值，財產還是屬於共有的。這個規定尤其是要避免蘇聯的農民對於婦女的剝削行爲，因爲他們從前往往在夏季裏忙娶妻，到秋季便把他休掉，一點無須賠償什麼，有了這個法律上的規定，他們便沒有那樣「寫意」了！

以上所談是關於結婚方面，以下諸略談關於離婚的方面。

關於離婚的事情，在別國往往報上的「社會新聞」裏鬧得天翻地覆，是 *outrage*（可勉強譯意爲「男女秘聞」）的一個大來源，尤其是涉及名流聞人和社會花的時候，要使不少訪員先生們忙得屁滾尿流，

汗流浹背！但是在蘇聯，是簡單又簡單，再簡單沒有的事情，只要男女的任何一方——即不必雙方同意——到民事註冊局去聲明一下，也不必說出什麼理由，該局即於登記後發一通告知對方，說自某日起就算離婚，一切完事！不過如對方不能工作以自給（如有疾病或廢殘之類），無論夫或妻，對對方都有付給最多不逾一年的贍養費，如對方雖有工作能力而却失業，亦須付給不逾六個月的贍養費。（其數量如雙方不能自定，則法庭酌量情形酌定。）但在事實上不能工作者絕無僅有，失業亦為目前的蘇聯所無，所以這一層並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有子女，父母在離婚後仍有共同教養的責任，即有同出贍養費至子女達到十八歲時的責任。各出多少，依各人的經濟能力的酌定。倘雙方能有同意的規定，不必經法庭手續；否則法庭得根據實際情形判定。如子女歸母親照顧，則法庭願到母親須用的工作與時間，酌加父親所出的費用。子女如歸父親照顧，母親亦負有此同樣義務。應歸何方照顧，全以子女本身幸福為標準（在實際上多歸母親）。倘法庭覺得父母都不宜於照顧這些子女，則歸國立機關收去養護，父母共出贍養費；各出多少，由法庭根據各人的經濟情形判定。

離婚無須理由，而且任何一方可單獨提出，即算了事。這在別種社會裏的人聽見，也許都不免引起詫異，這個法律的重要前提，當然要婦女在經濟上有完全自立的能力和機會，不必倚靠男子，經濟上個無問題——即不使婦女無以自立——那末如有一方在精神上已有裂痕，無法彌補的裂痕，再勉強在一起過統合神離的生活，有什麼意思？在對方又能得到什麼安慰，而且在真有自立能力和機會的女子，自己也不甘願過這樣統合神離的共同生活。

我覺得這種男女平等的法律的精神，最重要的是須有男女真能平等的實際環境，在男女真能平等的社會裏，這種平等法律才真能使男女兩方都得到平等的利益。倘在男女未能平等的社會裏，例如男子有

經濟自立的機會，而女子却沒有，就是有，這兩方的機會也不平等，（在蘇聯是同等的）工作得到同等的報酬，無論男女都是一樣的，）又例如男子再娶視爲當然，女子再嫁便給社會上看不起，或至少在機會上決比不上男子，那麼要實行這樣的平等法律，便陷大多數女子於更困難甚至更慘苦的地位了！

一九三五、二、十八、夜·倫敦。

舒西努集體農場

集體農場的普遍化，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種異常重要的成績。因此牠也是遊歷蘇聯的人們誰都想去看一看的制度。要看集體農場，重要的區域是在蘇聯的南方，但在莫斯科附近的集體農場，規模雖比較地小些，也可略見一斑，所以我要在這裏先把八月十日在莫斯科所參觀的舒西努集體農場（Zuzno Collective Farm）的情形，撮述一二。

這天去看的只是一個小羣，除一位「嚮導」和記者是男子外，其餘四位都是女子——都是暑期大學中的同學。因人數不多，乘的不是二三十人堆在裏面的公共汽車，只是一輛較大的汽車，汽車上的蓬蓋沒有撐起，駛在鄉間的泥土馬路上，左右縱寬，碧綠無際，時有村屋點綴其間，屋牆係用木柱砌成，內部削平成壁，外面却仍是橫疊着的木柱原形，除窗外，不加油漆，倒也別緻。既而到了集體農場的界限，最先見的特點是一大片的田地，大規模的種植，這是集體化的結果，和在小農制裏各人佔着的一小塊土地，彼疆此界者不同。在附近的田間有三四十個女子工作着。我們的汽車剛才停下，正要下車觀覽，忽起大風，急雨奔臨，汽車趕將車蓬撐起，向前開駛，後來雨漸息了，我們的車子駛到一個屋子的面前，據說是農場的辦公處，該屋原是一個地主所有的，革命後地主逃了，便作這個集體農場的辦公處。裏面的屋間頗小，除我們一小羣人外，另有七八位外國旅客臨時加入，同在一個小房間裏坐着，由這個農場的主席對我們報告大概的情形。這個主席是由農場的全體公舉出來的，年約三四十歲，是一個很誠實的農夫，但却能很鎮定安詳地對着這許多人報告工作的情形。

該農場成立於一九三〇年，共佔三百二十赫特地（每赫特約等兩個半英畝）。其中一百二十赫特種

水果，二百赫特種菜蔬，參加組織的為一百四十八家農戶。居民五百六十人，在農場上工作的三百六十人。有馬四十四匹，牛六隻。各農戶私有的牛一百十二隻，出品如牛奶等則歸各人私有。有公共食堂，每日有二百五十人在此用膳。有一個托兒所，容納三個月至三歲的孩子；一個幼稚園，容納三歲至八歲的孩子。

每人每天的工資為八個羅布，再加上十四公斤菜蔬。在夏季每日工作十小時，冬季則三小時或四小時。上面所說的八羅布工資，係指『每個工作日』(each labor day)為單位，工作時間以七八小時為標準，七月至八月的兩個月，普通工人可得到一百八十個『工作日』的酬報。(每『工作日』普通為八羅布。)在此同一時期內，熟練工人可得到二百八十個『工作日』的酬報。換句話說，工作的酬報依工作者的能力和成績而定，工作的日數和『工作日』的單位數量一定相等，所謂『工作日』不過是用以計算工資的單位而已。

關於組織方面，由全體大會每年公舉七人組織執行委員會，由委員會公推一人任主席。這些委員一樣地要作工，不過因為工作加重，主席每日得到兩個『工作日』的酬報，其他委員每日得到一個半的『工作日』酬報。關於工作方面，工人分為若干突擊隊，每隊由公推的一個隊長領導着，所用的機械則由政府所設立的曳引機站供給，此外該場有自設的合作商店。

該場一九三三年的生產量，比前一年增高百分之三十。在未經集體組織以前，每農戶每年收入只五百羅布，現達三千羅布左右。大規模的種植和合作的利益，顯然可見。

其次我們談到他們每年收入支配的大概。每年在收成已得到之後，政府酌抽若干賦稅(約六千羅布)，出產中抽出百分之三十五售與政府，由政府付以所規定的價值(比市價略低)，百分之三十五歸各農戶所有；百分之十五為餵馬及其他維持費(辦公費不得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二或三)，百分之十五

售於市場，售與政府及售於市場所得收入，用來支付工資及其他費用。

我們出了辦公處之後，由主席等引導我們到附近的另一個屋子裏，即公共食堂所在，這裏面的陳設和城市裏又不同，木桌是沒有經過油漆的，但是擦得很乾淨，椅子是沒有經過油漆的板櫈，全是農村的風味。有好幾位笑容可掬的農夫村婦幫同招待，餉我們以水果，梨和番茄（Tomato）；餉我們以新鮮的蜜糖，夾在黑麵包裏吃，甜甜芬香，大概是新自蜜蜂窩裏取出的。我們盡量地大吃了一頓，還承他們送了不少鮮花，我們每人拿一束，笑嘻嘻地和主人們道別，我們感到特別興趣的，是這些水果、蜜糖、鮮花，都是這農場裏的本地風光，都是最新鮮的產品。這只有在鄉間才享得到的罷。

出了公共食堂，我們還捨不得就走，在田間和叢林中鑽來鑽去跑了許久，遇着數十成群的村婦在田間工作着。在這散步的途中還看了一個托兒所，一個幼稚園，規模雖遠不及城市的大，但鄉間兒童另有他們的一種有趣的態態。托兒所裏有三個看護婦，各領導着一群二三十個兩三歲的小孩子玩着；有的圍立着跳舞唱歌，有的圍立着聽着護婦講笑話，或柔聲獨唱。幼稚園裏有五六十個四五歲的小孩，赤着上身，穿着一律的短褲，（這時還是熱天，）我們到時，正由一個女教師領導着全體提高着嗓子，大唱其歌曲，農村間的鄉下孩子，在從前只有啼飢號寒的份兒，革命後便受着這樣的孩子幸福！

我們的汽車停在該處附近，臨走時，這幾十個天真爛漫的孩子都跑出門外來，圍緊着伸出小手揮着，笑着歡呼着，和我們送別。

集體農場的重要性

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功，在工業方面是重工業基礎的確立，在農業方面是集體農場的普遍化。集體農場的普遍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鞏固，有異常的密切關係，值得我們較詳的研究。在上次通訊裏記者初次談到一個集體農場的大概情形，但覺得應該接着先把集體農場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具有的重要性，提出來研究一下。

我們知道蘇聯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發生後，當時在城市雖已很迅速地社會主義化，例如工廠、銀行、鐵路等等，都在短時期內歸普羅列特利亞的國家所有；而在農村方面——在全體一萬六千萬的人口，中佔了一萬萬的農民所分布的農村——仍然保存着「小布爾喬亞」的性質，因為當時不過把土地重新分配與農民，把大地主的田地分配給中農和貧農，並不否認小農就他個人的立場享有耕種他所有的田地的權利。自一九二一年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直至一九二八年，農業政策開始轉變的時候，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在個人立場的農民手裏。誠然，就在這個時候，俄國的農民所享受的土地權利已和尋常的私有權不同，因為法律上一切土地均歸國有，不得由私人自由買賣，不過每村的土地依農戶分配耕種，每農戶得用土地若干，依該戶所含人口若干為標準。例如每人可得三畝土地，倘一家農戶有十人，則可分得三十畝土地，其餘類推。但是農業之尚未社會主義化，反革命最冥頑的「枯拉克」——俄文所謂富農——煽動的憑藉仍然存在，農業的大規模的機械化仍然無從着手，這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況且依經驗所示，無論國家的計劃機關對於工業，對於批發的商業，或其他已集中於國家管理的部門，有很好的全盤計劃，倘若農業仍然保存着「小布爾喬亞」的性質，千百萬的農戶各為自己直接的私利打

算，而對於全國大衆的利益置之不顧，那末全國的計劃經濟便無從實現。所謂社會主義建設也等於泡影！所以我們如僅說集體農場的目的只是由落後的農業技術進到增加生產的農業技術，還不够，因爲倘若牠的意義不過這樣，像美國的農業在生產技術上也未嘗不很進步，反而促成農民的破產；我們所尤須注意的，是牠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重要性——牠是把社會革命真正推廣到農村去的重要的媒介。

史太林在一九二八年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演說詞，有一段關於農業政策的話：「我們不可在太久的時期裏把蘇維埃的政權和社會主義的結構建立於兩種不同的基礎上：一方面是最大的最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業；一方面却是最分裂的最落後的小農制。我們必須逐漸地，但却須有系統地和堅持到底地，用新的技術和大量的生產來改造農業，把牠提高到社會主義的工業一樣的地位。我們須要把這個問題解決，這樣，最後的勝利便得到保障；要是不解決而自甘退却，這樣，資本主義的回復，也可成爲不可避免的發展。」

史太林的這幾句話，可算是蘇聯在已往四五年間（以一九三〇年爲最緊張）積極實行農業革命的最扼要的註腳。有人說把頑固成習的大數量的農民拉到革命的一條戰綫來，實比推翻「沙」——俄皇——和建立蘇維埃共和國更難！經過四五年的努力奮鬥，現在已由滿地荆棘而走上坦平大道了。

但在當初決定採用農業革命的方案，明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含有不少的危險和困難，仍下決心和危險困難抗鬥，毅然實行，這却非具有遠見不可。在這方案裏最重要的要素是：貧農和中農在集體農場裏的生產的合作；富農在經濟上特殊地位的消滅；國立農場的加緊發展。自一九二九年起，農場的機械化和社會化——也就是集體農場化——開始加速地向前猛進，富農從中作梗，煽動農民暗殺努力於農業革命的黨員，時有所聞，但政策實行並不因犧牲而有所退怯。可是所謂「實行」，並非由政府下幾道命令，強迫農民，便算了事；却是喚起大衆對於此事的重要性的注意，動員大衆來共同努力推行。在一

九三〇年最緊張的時期，在自願往鄉間努力襄助推行組織農業革命的工業工人裏面，特選出最能幹的兩萬五千人，分往農村作堅苦的努力；幫助他們設立托兒所，組織遊行電影等的娛樂，幫助解決工作上其他的種種困難問題。在播種和收成的匆忙時期，城市的青年黨員成羣結隊到農村裏去襄助工作，戲劇藝術學校的青年演員在夏季分往農村演劇，以及爲農民組織歌舞等文化娛樂。同時政府對於集體農場給與種種的特殊待遇，例如分給最好的土地，減低賦稅，信用借款，機械供給，和日用的製造品的供給，都享有優先權，爲個人的農民所得不到的。一面由政府設立數千個曳引機站，分布各農村，幫助農民實行技術上的機械化，全黨的各機關的一切力量，全國的各工會，（上面所說的兩萬五千人往鄉間的工作，即由工會主持其事，）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機關，乃至紅軍，都被動員來共同努力於農業政策的執行和推廣；打破反革命的富農的最後壁壘，增加農業爲大眾而努力的生產，消除城市和農村的對立，歸納一萬萬的農民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戰線上共同前進！

一九三五、三、廿五、下午。倫敦。

開放給大眾的休養勝地——克里米亞

我們於八月十八日參觀了世界上最偉大工程之一的尼帕爾水電廠之後，於當夜即乘火車向克里米亞進發，十九晨到克里米亞西南尖端的名城塞伐斯托普（Sevastopol），和碧綠汪洋的黑海作破題兒第一運的見面禮。

諸君如翻開地圖，看到黑海，觸到你眼簾的有個不規則四邊形的半島伸入海中，面積一萬五千餘方英里，和大陸（接着南烏克蘭）接連處只有三四英里闊的一個海峽，這便是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是開放給大眾的全蘇聯的休養勝地！

克里米亞是歐洲著名勝景之一，而在從前的俄帝國已是全俄最美麗的區域，所以那時的貴族和富有的布爾喬亞便作爲他們獨佔着享福的地方，在南方沿海，由他們建築了不少宏麗的別墅和宮邸，不是勤勞大眾所能夢想踏到的區域——這是距今不遠的十八年前的現象——但是在革命之後，却成了開放給大眾的全蘇聯的休養勝地！從前爲少數剝削者所佔有的無數別墅和宮邸，現在都成爲勤勞大眾的療養院和休養院了！這是多麼痛快的一件事啊！

這半島上的高山叢嶺，由西而東，蜿蜒不絕，其特色是大部分的山頂都是平的，這種頂最大的有幾英里廣闊，彼此之間有坦平的汽車路連繫着，因四季氣候都在溫暖中的緣故，全年青翠欲滴，鳥語花香，別有勝景。在南方沿海一帶，因有平均三千尺高的山嶺爲屏障，和大陸隔開，阻擋着北方和東北方的冷風和暑炎，只引進南方的溫和的清風，舒適的氣候，成爲休養或恢復健康最適宜的區域。據氣候專家的研究，最合宜於人類身體機構發展之理想的氣候是華氏表五十度。身體孱弱，或病後身體虛弱的人

們，要增強體力，或恢復健康，都需要溫暖，最忌變化過甚的氣候。克里米亞的勝地如雅爾他(Ялта)每
年中的平均氣候都約在華氏表五十五度，最近於理想的氣候。據過去二十年間的觀察統計，全年中氣候
的差異，不過二度零七，所以全年幾全在春秋兩季中過去。太陽的光線對於療養有很大的效力，而在克
里米亞南岸每年可享到二千五百小時的陽光，每天平均有七小時的陽光。因為近着黑海，空氣的清新，
海濱的游泳和日光浴，更是極便利的享受。而這些宜於健康的種種優點，加上青山、叢樹、綠茵、
鮮花。……，便成了無雙的福地！從前是少數人的福地，現在是最大多數人的福地了。在這『福地』，各
療養院可容納的人數在兩萬以上；此外尚有醫院六十所，每所有牀位兩千左右；診治醫院約有百所，設
備完善規模宏大的肺病研究院一所。每季由各地到此『福地』來療養或是例假中到此休養遊玩的大眾，
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該半島的居民約八十萬人。)

我們往遊克里米亞，最重要的目的地是在該處第一美麗的名城雅爾他，不過便路灣到塞伐斯托普，
在該處僅作一日的勾留。我們於十九晨到塞伐斯托普後，即乘車往博物館參觀克里米亞戰爭油畫和戰場
遺蹟。這戰爭是一八五四年俄皇要瓜分『近東病夫』土耳其所引起的英法聯軍，是歷史上帝國主義爭奪的
一幕名劇。油畫的宏大和布置，和我在比利時所見的滑鐵爐戰爭的油畫的規模和布置方法，簡直是完全
一樣。當時該城被英法聯軍包圍至十一個月之久，據軍事家所推測，當時所用的軍火的總量，如堆成土
墩，可達二百八十尺寬闊三百三十尺高。股血盈河，全城為墟，所爭者不過是帝國主義所欲得的臧物
罷了！

但塞伐斯托普在那時是俄帝國主義的堅壘，後來在革命時期中，却成為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中心，
其最著的是一九〇五年黑海艦隊的起事，震動全國，雖一時被帝俄政府壓平，但實為一九一七年革命的
先導，為俄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下午我們去參觀希臘古城，和希臘羅馬所遺留的古物博物館。希臘在黑海一帶的殖民地經營，開始於西歷紀元前的第八世紀末葉，距今近三千年了。這三千年前遺下的所謂希臘城，沿着黑海之濱，僅是東一大堆西一大堆的殘垣廢址。有幾處是由地下發現開掘的，在當時也許是廣廳大廈，現在僅是大地窟中的幾面殘破的厚牆和崎嶇不平的石砌地面罷了。所仍然無異的，大概只是立在這古城上可望見的那附近的黑海波濤洶湧怒號的聲音罷。

我們回時途中還看了一個著名的地方叫 *Peraklava*。據說是該處土語，譯意爲「魚網」，是在海灣中的一個捕魚的區域。水面平靜如鏡，兩面青山高聳，沿岸有無數講究的洋房，在從前是許多貴族富豪的別墅，現在也都成爲工人的休養院子。爬到一個山頂危巖上，有個天然的石門，可遙望海上波濤，但因山勢崎嶇，雖享到「遙望」的眼福，却爬得一身熱汗！據說該處的漁業原來也是由少數資本家所壟斷的，現在也採用「集體」的辦法，不在剝削者的手中了。

我們於八月二十日晨由塞伐斯托普乘汽車經五十五英里的山路，乘了足足四小時的汽車，才到雅爾他。但是在這長途中，一面爲峭壁危巖的高山，一面爲深綠無際的黑海，汽車由山巖旁的坦平汽車道上溜過，景緻絕佳。汽車經過最高處爲山上一個山洞，像一個大石門似的，高出海面約近兩千尺，叫做快達門 (*Bar-bar Gate*)；一出這個石門之後，路勢倏然下降，半島的南岸幾於全部在望，而黑海更像全在我們的腳下了，景象偉麗，得未曾有！

在途中時，大家擠坐在一起，東張西望，賞心悅目，不覺得疲倦，也許是忘却了疲倦，可是中午到了雅爾他的時候，汽車停了下來，才叫着坐得腰酸腳軟！但是一下了車，精神又爲之一振，因爲空氣的清新，風景的美麗，陽光的和煦，清景的爽朗，我們竟好像到了瑞士！雅爾他原來是在一個山麓，我們所住的旅館，後面便是碧綠的山，前面便是碧綠的海，（只隔着一條平坦清潔的柏油馬路，）我們是

陶醉在碧綠的環境中了！尤其使我興奮的是在馬路上所見的從游泳池上回來的或剛去的男男女女，有的拿着大毛巾，有的拿着一個放衣服或毛巾零物的小提箱，多是一些粗手粗腳的工人，或土頭土腦的農夫，這提醒我們是到了開放給勤勞大眾的休養勝地了！

一九三五、三、三十、夜。倫敦。

雅爾他

克里米亞半島是全蘇聯最美麗的區域，而雅爾他則爲克里米亞半島上最美麗的區域。這最美麗的雅爾他，後面有四千尺的高山爲屏障，前面是半圓式的凹進，被黑海包圍着，差不多沒有一所屋子沒有花園，青山碧海，全城浸在青翠的環境中，沿着海濱便是無數的游泳池。〔有的上面是卵石。〕

我們於八月二十日初到的下午，旅伴中就有不少對着這些游泳池沙灘躍躍欲試的男女朋友們，二三成羣的，分往一試身手。我也被幾位朋友拖去。我的游泳工夫雖十分『蹩腳』，幸而在中學時代，有一個暑假住在上海青年會的學生宿舍裏，曾經學過一些，不然，被這些英美的男女朋友拖去，倘只作『壁上觀』，却是一件難爲情的事情。可是他們胆大，敢游到幾十碼以外的海面去，浮沉自如，縱橫如意，我就只敢在海濱近處游，免遭滅頂之禍！我在雅爾他三天，被這般朋友的勁兒所鼓勵，幾乎每天於參觀餘隙，都隨他們到海濱去游泳一些時候。這種游泳也確是異常舒服。岸上像黃金似地鋪滿了陽光，脫去衣服，曬得暖暖的，往海裏一鑽，那水裏的溫度，使你好像冬季鑽在溫度舒適的被窩裏一樣，簡直捨不得出來！最自然的是在好幾處的沙灘上，蘇聯的男女游泳都不穿游泳衣，全身脫得精精光，習慣成自然，大家一點不覺得奇異。許多美國來的男女朋友更喜歡依法泡製，因爲在美國是要受警察干涉的，在這裏便盡量地可以這樣自由。（英國男女本來是比較守舊的，到此也受着環境的影響，不在守舊了。）我臨時買的一條游泳短褲，也被一位朋友搶去，不許穿！我也只得追隨着他們做『自然人』了！（其實一人如單獨穿着一條短褲，反而爲衆目所集中，本來也不能穿。）赤裸裸一絲不掛，夾在許多男女朋友裏面搖搖擺擺，談的談，走的走，大家很自然，我至少也要裝作很自然的樣子，後來的確也真覺很自

然了。這倒是我生平破題兒第一遭！這些英美的男男女女，人人都會游泳，而且都與會淋漓，這也是他們的體格健強的一個原因罷。

在雅爾他的海濱游泳當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我的目的不在游泳而在參觀——有的美國學生竟用全日工夫在游泳裏面，或至少有許多時候在海濱上——八月二十一日第一次所參觀的是列伐低亞（Lefevre）。這是帝俄維曼諾夫皇朝最末了的一個皇帝尼古拉斯第二在最美麗的雅爾他遺留下來的——一個最美麗的別墅，現在却成爲工農大眾的一個最好的療養院了！

這個別墅建築於一九一〇年，全部用白色普克門（Chikeman）石和大理石建成，屋爲三層，周圍是奇花異草豔美無匹的花園。從花園到這三層的宏麗皇宮，有一個門在從前是專備俄皇一個人用的。在這門口地上有個馬蹄鐵（即馬脚下釘着的鐵蹄，像U形吸鐵一樣），據說是尼古拉斯第二親手釘的。歐洲有一種迷信，認爲拾得馬蹄鐵是好運道的吉兆，要把牠釘在門口，但是要把U的形式開口處向內，認爲這樣好運道才會向下跑，有着同樣迷信的尼古拉斯第二却把這馬蹄鐵釘顛倒了！他是最喜歡釀酒的，這大概是他開才喝醉糊塗的表現；但是他既是炙手可熱的皇帝，當時誰也不敢說他錯了。有人說，他的好運道就從此向外跑了！尤好笑的是這個『皇帝專用』大理石建造的樓梯，特別的濶，石級却特別的低，據說這是當時有意地這樣造，因爲這位『沙』皇帝常喝酒喝得爛醉，這樣他登梯或下梯時可用最少量的力氣，腳踏着上上下下！這可說是替嫺皇帝想盡辦法子！

這皇宮內部裝設的富麗，那是不消說。樓上皇帝皇后皇太子公主等等住的房間，都是朝着黑海海濱最美的景緻。這些房間裏的牆上都用很講究的木板裝着，花樣和顏色須和各房間裏所擺設的器具調和融合；而各房間裏的布置，並且須和這房間裏的窗上映進的外面美景調和融合。但是尼古拉斯第二到底好極真是『好運道向外跑』，雖有這樣富麗精美的別墅，他自己只到過這裏三次，每次時間都不久，還是

他的家屬住得久些。可是吸盡人民的膏血以傳工人和少數寄生蟲的豪奢縱慾，總算發揮盡致了！

現在這別墅作爲工農的療養院，可容一千五百人，各房間裏的布置仍可看到原來的東西，但各房裏却多了一樣東西，那便是一排一排的小鐵床，上面鋪着潔白的被墊，好像醫院裏的樣子。裏面有的是男工人，有的是女工人（另聚一室），有的是鄉間來的農民，這個療養院原指定偏重農民療養之用，所以在冬季幾全是農民來往。他們是由全蘇聯各地來的，來住在這裏，不但膳宿完全免費，就是來往的旅費，也不必自己挖腰包。這種優待，當然是那些工作特優，或爲「突擊隊」隊員，工作過勞，在例假中由工會或集體農場送來享受的。這裏有醫生，有看護，有病的可在此養病，沒有病的也可來此休養，飽覽附近的山水。這是工作後的休養，和從前僅供少數剝削的有閒階級來此消磨無聊的時光，作用便大大地不同了。

尼古拉斯第二從前所用的浴室，現做了這個療養院的院長辦公室！浴室和辦公室是多麼不相干的東西，竟可交換，也是一件趣聞。我們和這院長談話時，便都擠在這個尼古拉斯第二的浴室裏！院長穿着白布的外衣，和醫院裏的醫生一樣。

尼古拉斯第二的臥室，天花板地板和牆上都是用極精緻柔滑的 Box Wood（很像柚木）造的，牆上並裝滿着鏡子，因反映作用，好像把窗外的海景、山景、園景都吸收在這個房間裏。現在這個房間排着七個鋪位，做了女工休養的臥室。

從前皇帝和皇族用的非常講究的餐室，現在當然也做了工農勞動者的公共食堂了，每次可坐二百二十人。

這宮的各部分的建築形式和裝設，還有不少的花樣；有的是羅馬式，有的是文藝復興式，有的是威匿斯式等等。我們看到所謂「意大利區」(Italian Quarters)該處的廳堂天井走廊等等建築布置，當然

都是照着意大利的特別典型。在走廊上有一隻長石椅，據說由著名建築工程師某打樣監造，最初他依照所謂意大利式的真典型造成了一個石椅，尼古拉斯第二看了覺得太簡單，嫌不好看，叫這位工程師來訓斥一番，打他一個耳光，命他撤去，另造過一個。這工程師氣極了，當面又不好發作，便另打過一個新樣，並不合於什麼意大利式的真典型，在石椅兩頭的靠手上加了兩個石刻的狗頭，而且狗臉的特點。（如額角鼻子嘴角眼睛等等）却和尼古拉斯第二自己的臉暗合！造好之後，這位糊塗皇帝認為滿意！全宮的人都看得出，只抿着嘴暗笑，但因為怕犯「天怒」不敢說明。至今這「皇帝式的狗臉」還存在，仔細瞧瞧，確和相片上的這位糊塗皇帝的臉暗合！

我們在音樂室裏聽着一個女子在那裏彈鋼琴，旁邊有一個男子人立着傾耳靜聽。我們圍着和他們談話，知道男的是金馬工，口氣反饋優異，已三次到克里米亞休養：第一次在一九三一年，是由廠裏的工作委員會保送的；第二次在一九三二年，是由廠裏的經理部保送的；這是第三次，是由金馬工會保送的。那女工是某廠裏的突擊隊隊員，因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成績優異，能獨出心裁想出好法子替廠裏減少材料的消耗，由工廠委員會保送。兩人都將在這療養院裏住一個月。據說如有一定的疾病，由醫生指定最適宜療養區域；無疾病而只要休養的，可自選地方。我們問了幾個問題之後，那女工也提出兩個問題來問幾位美國朋友。一個是他們來蘇聯遊歷有什麼目的？這個問題，他們很一致地答覆了。還有一個問題是：「你們有同樣的權利（按指優待工人如住在這療養院等等）給你們的工人嗎？」這問題却引起了不一致的答覆。有一位在紐約做青年會總幹事的某君答說有，有幾個思想清楚不願說門面話的美國人老實說沒有。這位青年會總幹事對幾個美國人輕聲低語道：「你們不要使他們看不起美國啊！」這幾位美國人和這位總幹事先生竟爭做一團！那蘇聯的男女工人睜着眼發怔，莫明其妙！

在這皇宮外面沿海的一帶還有一條所謂『御道』（Tsar's Road），長約一英里，是一條很平坦的

沿着海濱穿着森林的馬路，據說是專備尼古拉斯第二散步用的，故稱「御道」，在從前當然也是禁地。從不少頌讚「皇帝」的我們，也大踏步在這條「御道」上散了一回步！我對同行的巴爾和柏西說，那常在烟幕中的尼古拉斯第二能否真在這裏散步，倒是個疑問，我們却真在這裏散我們的步了。我們在這「御道」上時時碰着二三十或三四十成羣結隊的男女工人或農民，也在來來往往遊行着，個個平民都做「皇帝」了！

一九三五、四、二、晚。倫敦。

兒童療養院

在雅爾他一地，療養院就有四十個左右之多，此外還有休養院 (Rest Home)，其數量也差不多相等，為大眾恢復健康和假期休養的大規模的設備，由此可見一斑，我們限於時間，只能選着幾個足為代表的以概其餘。記者在另一通訊裏所談的列伐低亞療養院便是一例。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又參觀了一個性質特異的療養院，叫做愛希拉達療養院 (Tshilada Sanatorium)，是專為患骨癆的兒童而設的。

這療養院也在叢林碧草的環境中；溫暖的陽光，清新的空氣，籠罩着清潔寬敞明亮的房屋，我們進院之後，先被引進院長的辦公室裏略談，這院長是一位鬚髮皓白和藹可親的老者基許博士 (Dr. Kish)，是歐洲專研兒童疾病，尤其是兒童骨癆的著名的專家。身上穿着白布外衣，頭上戴着白布圓帽，和一般醫院裏的醫生一樣。該院成立才六年，是由莫斯科蘇維埃創辦的，專治最困難的骨癆症。由蘇聯各處，經各該地醫生認為非送到該院不可的，即送到該院療治。現有兒童二百七十人，年齡自兩歲半至十四歲。有百分之九十是工人的子女，尤多的是重工業的工人的子女，這在他國是絕對無財力醫治的孩子們，更休想進這樣設備完善醫術高明的療養院了！該院有專門醫生十一人。教師十六人，醫院裏怎麼有教師呢？這是因為骨癆厲害的往往要繼續療養兩三年，療養的時期既長，如學業久荒，兒童的前途也有妨礙，所以在這療養院裏，同時設有由幼稚園到小學的課程，由醫生和教師合作，醫生認為可以授以相當的知識而無礙於健康的增進的時候，便由教師教授功課，為求適宜於病者的需要計，課程和授課時間的支配，當然具有伸縮性，和尋常學校不同；尤注重的是個別兒童的研究，醫生和教師對於每個兒童都有圖表和詳註一切的卡片存查，關於治療方面，氣候治療和醫藥治療並用。同時設有研究部，對各症候

和療法作繼續的實際研究，以供醫家的參考，因雅爾他的全年氣候特優的緣故，需要露天空氣的兒童，日夜都有在露天的可能，就是冬季也可以，這是該地對於療治癆病的特別優點。

據基許博士所談，有一點尤其可注意的，是生癆病的孩子往往比尋常孩子來得聰明，這是因爲病菌侵入了神經系統和腦部，使他感覺特別靈敏(More Sensitive)，因此表現着格外聰明。這位老專家說，據他三十五年的工作經驗，在許多例子裏都觀察到這同樣的事實。這當然不是說聰明的孩子一定不幸，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聰明和健康的體格要合在一起，否則如體格不健康而聰明，那只是好像曇花一現罷了。

又據該院長說，來院療治的兒童，不治而終於不免死亡者僅佔百分之九，同來參觀的有位是美國的男女醫生，都認爲這樣的比例可算是很好的成績了，但他們還在繼續努力研究中。聽說在我們來的那個月月底，有五十個病者可以全癒出院。

我們出了院長辦公室，都穿上院裏所備的白色布外衣，由他引導到幾個病室裏去看看。走進的第一病室便是一個大電合，裏面排着二十五個白漆的小鐵床，上面都仰臥着白色睡衣的兒童，看上去都不過五六歲七八歲的模樣。上面有厚厚的淡灰色的帆布，像好幾條布達似的，高高懸掛着由牆上高處向電合的欄杆方面斜着，所以滿台都有太陽光映進來，但光線却不致直接射在各小榻上面。(小榻所不佔着的地面仍有太陽光照着。)說有的症候需要直接的太陽光，有的症候只宜於這樣的布置，須由專家醫生依實際狀況酌定。這個病室裏有一位女醫生照料着。掛有一面紅旗，表示這房間的孩子的行爲最好。各兒童看見我們進來都笑嘻嘻地對我們望着，有的叫我們做「叔叔」或「姑母」，好像極可愛的洋囡圍展覽會，真不覺得他們是病人，雖則有幾個較重的病者比較消瘦些，基許博士非常溫和地笑着對這個孩子撫撫摸摸，對那個孩子拍拍問問，他們都笑着叫他做「爸爸」。其中有一個女孩子大約只有六七歲大，面孔

非常美麗可愛，却患着很厲害的骨癆，大腿上有兩處會由基許博士自己開刀的，他翻開給我們看，才看見那女孩的身體頗瘦：他說經此手術後，再加若干時的細心療養，便可全愈。這女孩一直癡笑着叫院長做『爸爸』不已，那天真爛漫的音容，實在令人覺得可愛。我覺得基許博士不僅是她的救命的醫生，簡直是她的慈父了！聽說有許多孩子全愈出院之後，還時時有信來慰問他們的『爸爸』。

又到一個病室，布置和前二個相類，也排着二十五個白漆小鐵床，這裏的兒童年齡比前一室略大些，有一位女教師正在讀有趣的故事給他們聽。

經手術室，由一位主持該室的專科醫生招待觀覽，關於專科所用的種種器械，非我們門外漢所知，但覺布置得異常整潔而已。

又到一個病室，裏面只有一個白漆小鐵床，上面躺着一個骨癆最厲害的孩子，看上去似乎只有四五歲，露出的手臂已和骷髏無異，真是所謂『皮包骨頭』，頭面因瘦得厲害，頭蓋特別大。和骷髏也差不多，臉也瘦得很，兩隻碧綠的眼睛雖深陷，却還能骨落骨落地轉着對我們看，流露着孩子天真的模樣，牀旁排列着不少兒童玩具，有一個女看護專門陪伴他，基許博士雖也和愛地撫摸他的頭額，但出了房門之外，數着氣說這是絕症，已絕對無生望，不過盡盡人事仍然細心看護罷了。我們從別個病室裏看了許多活潑形態欣然歡呼的男女孩子，也都滿面春風，感到愉快，忽看到這幕人生悲劇，都不免寂默含悲，陪着那老院長歎息。

經過研究實驗室 (Research Laboratory)，有四五位穿着白外衣的醫生正在顯微鏡旁忙着他們的工作。據院長說，有二十八起病案 (Cases) 正在積極研究探討中。

又到一個病室，裏面只有七個孩子躺在牀上。大概是即將全愈的快樂孩子，精神特別地興奮，在牀上活潑得很，剛聽見我們的腳聲，就笑聲四溢，對我們歡呼！看到他們那精神煥發的臉部和紅潤壯健的

肌肉，也確是健康恢復的象徵！看護婦覺得他們太喧嘩了，不得不跑過去彈壓他們，叮囑他們不要這樣吵。

又到一個病室，躺在小榻上的男女孩子多些，有三四十人，年齡也比較大些，大概有十二三歲的樣子，有許多半身坐着靠在牀頭看書，有的玩着各種樂器，他們都有了小學校高等級的程度。有幾位「突擊隊的隊員（即成績特優者）」，牀旁有一面旗子為誌，院長指着給我們看，那些孩子笑着，頗有害羞的樣子。這也是天真孩子的本色，看着令人覺得怪有趣，有一位提琴最好，即就牀上奏了一曲給我們聽。院長又指着一個孩子說，他的成績差些，但不是他的錯誤，他經過了三次手術，健康的體格受了很大的障礙了。這房間裏的幾十個孩子，個個都現着愉快的樣子。

有些孩子大概是在讀英文，屢屢用英語叫我們做「Uncle」（叔叔），或「Aunt」（姑母）；有的用英語問「How do you do」（你好。）臨走時，有的用英語喊着「Good bye」（再會）。最使人難忘的是他們那樣欣然的起勁的神情。

這不像個病院，却像個樂園！

一九三五、四、四、上午、倫敦。

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特點

自蘇聯南方回到莫斯科後的那一個星期裏面，差不多天天忙着參觀學校，簡直可叫做「學校週」了！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我們到莫斯科最大建築之一的全聯工會總部（帝俄時代遺下的「貴人俱樂部」）去參加全聯學生總會為我們開的歡迎會，該學生會的主席和重要職員數十人都出席，分別報告關於學生的各項情形，最後由我們提出問題質疑，賓主之間都表現着異常誠懇和熱烈的情緒。我現在要根據這天談話所得，和其他方面獲得的參考材料，先報告些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特點，以便在這方面有個大體的了解，然後再陸續談些關於所參觀的各校的情形。

依蘇聯的教育制度，三歲以下的孩子送托兒所教養，這在蘇聯有迫切的需要，因為父母都從事社會的工作。三歲到八歲進幼稚園，以上在他們叫做「學校以前的教育」(Pre-School education)。八歲到十二歲進初等或第一級學校，四年結束（在有些民族的聯邦共和國，因除本民族的文字外，兼習俄文，則酌增為五年。）十二歲至十五歲進第一級或中學，三年結束，這兩種學校在他們總稱為「七年學校」。十五歲到十八歲進第三級或完全中學。三年結束。這第一，第二，和第三級學校，在他們總稱為「十年學校」，這「十年學校」是他們所要達到的一般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就是他們所要達到的「普及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 努力進行普及教育是努力提高一般文化的一個最重要因素，也是克服文盲工作成功之後最重要的一種工作。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的第一年（一九三三），四年的強迫教育（即第一級）已實行於全國，七年的強迫教育（即第二級）已實行於工人區域和工業中心的城

市，據說全國自八歲至十二歲的孩子已一律入學。（即第一級的四年教育。）現在仍在努力普及第二級的三年教育，和增設第三級的三年教育，（實行第三級學校的議決案才於一年前成立，）希望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終了時，能辦到十年的普及教育。（即到十八歲，現在英國的普及教育僅到十四歲。）

依黨的原來決議，職業訓練須在受了完全的普通教育（即十年）之後，才實行。但在目前，因很急迫地需要很迅速地養成大量的熟練工人和專門人材，所以對於這個規定只得暫時變通辦理，在實際上，於『七年教育』之後，即緊接以所謂工廠藝徒學校（或簡稱工廠學校，即類似初級職業學校性質，時期自六個月至一年）；和中等職業學校（他們稱為『特查康姆』"Technicum"，時期約四年）。和這一階段——即工廠藝徒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相輔而行的還有種種『工人補習教育』（Supplementary Workers' education）使已在工廠作工的工人，可於不必離開實際工作之中，得到增進學識和升學的機會。工廠藝徒學校的重要使命在養成熟練工人，於最短期間內授以工作技能和原理，使手工和腦工造成密切的聯系，中等職業學校旨在養成中等的技術人材，所謂技師。此外所謂『工人補習教育』，也依各人程度加以造就，茲不詳述。在目前，這兩種職業學校均收容『七年教育』完畢的青年。這段教育因應全國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需要，所以特重職業訓練；但同時却不以僅授技能為滿足，亦同時顧到原理和普遍教育的增進。

依制度所規定，完畢『十年教育』之後，得入高等教育的機關，時期大概為四五年。但目前在實際考入大學者，約有百分之五十是修完所謂『工人升學預備科』（Workers' Faculty），者；約有百分之十五是由各種補習科畢業者，約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中等職業學校畢業者，約有百分之十三是由第三級學校畢業者；此外約有百分之四是由第二級學校畢業者，約有百分之五是由工廠藝徒學校畢業者。（根據一九三三年秋季兩百個高等工業學校的統計結果。）所謂『工人升學預備科』是旨在幫助成年的工人再求

深造，這種工人至少須在工業上工作過三年，成績特優，而至少具有小學同等程度的普通教育者，因凡被准許入「工人升學預備科」的工人，都是特別聰明而又努力的青年，所以只須四年，有的僅須三年的補習，即可考入大學畢業。依上面所述的統計，高等學府中的新生，設有半數以上是由這種「工人升學預備科」出身的工人，工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可以窺見。

蘇聯的高等教育，特重要成明確的切實的專門人材，沒有像美國式的什麼文科理科之類的渺茫的科目。（蘇聯在帝俄時代，除法律和醫科外，大學也不訓練明確的專業科目，學生有的學習所謂「史哲學」「歷史和哲學」或所謂「黨理科」，畢業後不知幹什麼！大多數都向做官的一條路跑。）現在蘇聯每一個高等教育機關都有明確的對象，知道所養成的是那一種專門的人材。其重要的形式有專門學校（他們稱 Institute，即設一個專科者），大學（有幾個專科者），和研究院（在大學後又研究兩三年）。高等教育機關的畢業時期大抵為四五年。尤其發達的是專門學校，例如鐵路專門學校，機械工程專門學校，紡織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師範專門學校等等。記者在莫斯科「學校週」所參觀的大多數就是專門學校。此外還有一點也很注意，他們為增加實際效率起見，自一九三〇年起，僅若干大學和師範專門學校為教育部管理，其他的專門學校都分別歸有關的各部直接管理。

關於蘇聯教育制度的大概，已略如上述。現在請再扼要地談談蘇聯教育的特點：

（一）教育的大眾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全國人口中還有百分之六十四是文盲，大多數兒童都被排拒於學校之外，至於中等學校，那更是特權階級（貴族，富農，資本家，富商等）師子弟獨享的權利。高等教育更不消說了，所以在當時全國一萬萬五千萬的人口，大學生僅有十二萬人，革命後國家的「前線」(Front)分三種：第一前線是抵抗國際的武力干涉，和消除國內反革命的內戰；第二前線是全國經濟改造的努力；第三前線是全國文化和教育的積極進行。稱為「前線」，因為在這幾方面

都是用「鬥爭」的英勇的精神向前邁進，文化和教育所以放在第三前線，因為普羅國家的防衛和工農業必須提高到可以藉以發展文化的水平線，在當時實爲尤重要的事情。等到國際武力干涉和國內反革命都被用武力肅清，而經濟計劃又着着勝利之後，第三「前線」和第一第二便立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了。所以列寧在將死以前，特提出「文化革命」的口號，而教育的大衆化實爲文化革命的第一義。現在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裏就學的兒童達三千三百萬人。成人在各種教育或補習教育機關就學的約有三千萬人，全人口中幾有一半是在求學，是在研究，是在學習——是在做學生——（此外在工作上和服务上的學習研究還未計算在內；工人在工廠場裏學習研究，農民在集體場裏學習研究，政府各機關的僱員在事務所裏學習研究，普羅化的知識階級在學校和研究所裏學習研究。）所以有人說蘇聯的一萬萬六千萬的大衆是在作文化和教育的全體動員！這便是教育的大衆化！怪不得雖遊了蘇聯，於嘖嘖稱羨之中仍消除不了小布爾喬亞成見的艾迪博士，也要說：「關於這方面（指大衆教育），蘇聯要震動全世界的良心！」（"Soviet Russia will disturb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in this regard" 見他所著的 "Russia To-day"）

(1) 教育和金錢勢力脫離關係。在任何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教育和金錢勢力總是結不解緣。有錢的子弟，雖是一個道地十足草包，也可升學；沒有錢的子弟雖資質聰明，也只有望學興歎！蘇聯不但小學和中學一律免費，而且在職業學校和專門學校裏，除免費外，按月還有津貼！這種津貼是依年級而增的，年級愈高，所得愈多。在職業學校大約每月自二三十至五六十羅布；在專門學校裏每月自七八十至二百羅布，在有些專門學校裏每月二百至二百五十羅布。我在師範專校的研究院裏遇着一個研究生，他因有家累，每月得到津貼三百羅布。我在學校裏遇着不少蘇聯的男女大學生，他們聽見我們入大學要出錢，都表示十分地詫異！其實我們聽到他們入大學還有錢拿，更覺得詫異啊！

(2) 大家憑智力都有升學的希望。升學既不憑金錢的勢力，當然要憑智力的了——雖則在目前，

憑智力雖比憑金錢勢力公道，但有些智力差些，還是受舊環境遺下的結果，並非自身有何過咎，這只得在新環境中逐漸地解放了。蘇聯急迫需要熟練工人，工廠藝徒學校就是旨在供給這個需要，但是已往有些學生於這種學校畢業後不在工廠作工，却直接進中等職業學校或其他高等學校。因此自一九三三年起，改變辦法，把從前所定兩年畢業的時期縮短，改為六個月至一年，畢業後須先在工廠作工三年，然後升學，同時在工廠中仍有繼續補習的機會，這種辦法是一律的，不像其他國家有所謂「雙軌制」。這固然是應當前的急切需要，但是也使青年得些實際工作的經驗，於升學後的繼續研究也有不少裨益。

(四)教育的「技術化」(Polytechnisation)。記者在以前通訊裏就提過，蘇聯的教育在「學校以前的教育」——托兒所和幼稚園——即顧到「技術心理」的潛移默化。此外在小學和中學裏也注重「技術化」。依我們在教育上的通用名詞說來，便是注重「職業陶冶」。至於職業學校和專門學校之注重職業訓練，或職業教育，由上面所談，也很顯然地可以看出。這和其他國家裏所提倡的「職業教育」有什麼異點呢？有！第一，其他國家的職業教育，是「雙軌制」裏的一「軌」，是專備窮人子弟不得升學急於謀生用的，在蘇聯却是全國一致的教育，是各盡所長以共同努力於新社會建設的教育，其出發點已迥然不同。第二，在「人剝削人的制度」已鏟除的社會，這樣造成的人材才真是為社會服務；在「人剝削人的制度」還存在的社會裏——即生產工具不為社會所公有的社會裏——不過把急謀餬口的貧人造成「剝削者」的工具而已！所以不但出發點迥然不同，即所收的結果也迥然不同。

(五)有明確的目標和應用的環境鼓勵學生勇猛上進。蘇聯學生對於求知的狂熱和研究興趣的濃厚，這是研究蘇聯教育的任何人所不能不為動容的，這却不是別國的青年在本質上有什麼特別不及他們的地方——例如我們的青年。這却是因為他們青年深知所努力的是在造成共勞共享的新社會，深知學了就有用，各專校裏有與該校所學有關係的工會分部，稱「專業委員會」(Professional Committee)，學

生在在畢業一年以前，即由「專業委員會」和該校所屬的專部，（即政府中的各部）替他們決定每人畢業後的位置。這決定當然也和學生本人商量的結果，有時有幾個位置備選。職業學校和專校的學生，在學校時代即為有關係的工會會員，享得該會所給與的保障和權利。（「專業委員會」即由學生中的工會會員選舉組織的。）其實在未畢業前，即於課餘參加各種運動，如掃除文盲運動及與經濟建設有關的各種運動。

我們如仔細研究專校的選科內容，也很有意味。在一九一四年（未革命前），十二萬大學生裏面，學工業，交通，和農業的，只有三萬人，在一九三三年（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末年），在近五十萬人（169,216）的大學生裏面，已造成的專家有十七萬七千人之多。其內容比例及下：

工業和交通	六九・〇〇〇
農 業	二八・二〇〇
教 育	四〇・二〇〇
醫 科	二〇・五〇〇
其 他	一一・八〇〇

他們預計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所要造成的專家將達三十萬人之多。他們學了就有用，而且用的意義是在造成共勞共享而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所以在別國欲勉強限制各校招生以提倡所謂「實科」而不可得，在蘇聯却是自然的趨勢。這是因為一則僅在枝葉上白費工夫，一則從根本上下手。

最後還有幾點可簡單附述如下：一是理論和實踐聯繫，學校和有關係的工廠或農場力求密切連系的關係；二是各專校都加授新社會科學要義和唯物辯證法，雖為工程師，對於新社會科學亦須有相當的了

解，三是採用『社會主義的競賽』，提高學業的質的程度，突擊隊隊員的榮譽，不僅在追上勝我者，同時亦在幫助提高落後者達到水平線；四是由托兒所至大學，一律男女同學。

一九二五·四·十三·上午·倫敦·

蘇聯的電影和戲劇

記者在蘇聯時，和朋友們同去看電影，前後約有七八次，所得的印象，和所看到的別國的電影，截然不同，最滿意的當然要推『列寧的三歌』此外所看見的，就表演和攝影的技術上說，有的很好，有的差些。嚴格的說，除少數特別好的片子外，表演和攝影的技術還不及美國的影片。不過就故事內容的意義方面說，那蘇聯的影片可以說是卓然有牠的特色了。他們影片中的主角不是勝利的盜魁，不是奢華的寄生蟲，不是爲着個人發財的成功人，不是誘惑女性的青年市儈，却總是社會的領袖——建築艱難的鐵道，醫治艱難的病症，掃除社會的公敵，提高全社會的幸福的水準，無論工作範圍的廣狹，總以爲社會大眾謀幸福爲第一義；發奮蹈厲，艱苦備嘗，爲的是這件事；赴湯蹈火，不惜犧牲自我的生命，爲的也是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注重點不在故事中的『英雄』，或是『明星』，却在所含的主義，革命，新的社會秩序，使觀衆感覺到這是人類歷史上新紀元的一種描述！

其次請略談蘇聯的戲劇。自九月一日至十日是在莫斯科所謂『戲劇節』(Theatrical Festival)。每年在這十天裏面，各著名戲院特排演最著名的劇本，使觀者能在短時期內看到蘇聯戲劇的各方面，各國的戲劇批評家，劇本作家，演員，戲台的指揮者，以及愛好戲劇的觀衆，都連袂而來，作深刻的研究和欣賞。我們回到莫斯科受全職學生總會招待的一星期，正遇着這『戲劇節』，所以白天忙着參觀學校，有好幾夜都承他們招待到著名戲院去看戲，這當然也是一種很難得的機會，因爲不但坐位特別好，而且不必自己控腰包。(如用旅行社代用金幣購買戲票，那更昂貴異常。)可惜我對於戲劇是個完全門外漢，所以對於表演的技術方面不能有什麼具體的報告和批評；尤其是歌劇(Opera)和芭蕾舞(Ballet)。不

過就政治和經濟的眼光看去，蘇聯的戲劇至少有下面的幾個特點可以提出來說一說，因為蘇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之後，戲劇方面也隨着有了很大的改變。

第一是親衆的「社會成分」的改變。在革命以前，著名的幾個戲院是少數貴族富翁的專利，這種情形在西歐各國還是一樣。在戲院裏較前排的座位，男女都穿着夜禮服；大衆當然是無從問津的。在蘇聯的劇院，正和這個相反，由少數人的專利一變而爲大多數人的娛樂和文化的機關。在那樣富麗堂皇的大戲院（Bolshoi）你可以在許多坐位的椅背上看見有光輝奪目的小銅牌釘着，上面註明這是爲某廠「烏達尼克」（突擊隊）特備的座位，那又是爲某廠「烏達尼克」特備的座位；或有的註明這是某校「烏達尼克」的座位，那又是某校「烏達尼克」的座位。「烏達尼克」並不是貴族或富翁，這是有特別良好成績的工廠工人或學校學生。至於一般的親衆，高帽了白硬領和燕尾服的男裝，和兩臂後背袒露着的女裝，你都看不見，所看見的是大多數的勤勞大衆。你儘管只穿着一件襯衫坐在最好的座位上，也沒有人看不起；雖則他們因經濟建設的成功，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隨之增高，在夜裏看戲的時候，有許多也拿出他們所僅有的漂亮衣服穿在身上！在西歐各國的戲院裏，除講究的舞台和座位外，還在各層造有講究的走廊和大廳，（有吸煙室和飲料處等等）俾在每幕演完休息的期間，觀客得離座散步。在蘇聯也如此，我在這種時候，往往很冷靜地旁觀那些成羣結隊好像大遊行着的親衆的衣飾，大有小孩子在新年穿上新年的模樣！你非親見，想像不到這種模樣或神情的有趣！

第二是戲院數量的迅速增加。這是隨着第一點而來的自然的趨勢，因爲戲院既爲大多數勤勞大衆光顧的場所，非迅速增加，不够容納。據說現在的戲院數量比革命前已增加四倍，演員人數增加三倍，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一邦而言，戲院已在五百所以上。在莫斯科原來只有七個大戲院，現在已有四十所。戲劇學校較革命前增加了九倍，在莫斯科一處就有二十八個戲劇學校。雖然這樣地迅速增加，但還

是未能滿足大眾的需要。在大城市裏，各工廠往往替他們的突擊隊員預定大量的坐位；遇着有好戲將開演，往往在幾個月前就把位置預定好。在烏克蘭的許多戲院裏面，有百分之八十的觀客戲票是『集體』地買去，因為是由他們的工會或其他的機關代買的。

以上所說的還是專業演員 (professional, 即以此為職業的) 的戲院，此外還有非專業 (non-professional) 的戲劇運動，參加的工人，農民，僱員等等，總有數十萬人，每年觀衆總在一千五百萬人左右。在各區，各軍隊單位，各工場，或各農場，都有他們的所謂『戲劇組』，或俱樂部，表演短劇，這類『戲劇組』的目的不僅在娛樂，是重在政治的或美術的教育的灌輸。

第三是兒童戲院的發達。蘇聯對於兒童教育的注重，記者在以前通訊裏曾經談過，兒童戲院的發達也是這方面的一種表現。所謂兒童戲院，並非由兒童表演，是由成人的演員專演合於兒童看的戲，目的是按着七八歲到十四五歲的各階段的心理，注重教育，美術，和娛樂的效用，來看戲的兒童，是由各校組織辦理的。在未看以前，先對他們作詳細的解釋，看的時候，對於他們的反應尤加以仔細的觀察和考慮。他們並常請兒童們開會談話，探求他們的意見，以及對於演員的批評。關於兒童在兒童戲院裏的熱烈的情形，記者以前記述兒童村的時候曾提到，想讀者諸友還能記憶。現在蘇聯已有兒童戲院七十八所。(他們也有專為兒童設的影戲院，所以在一般的戲院或影戲院裏，看不見兒童。)

第四是少數民族戲院的設立。在革命前，有幾個民族像烏克蘭、亞美尼亞、白俄羅斯、猶太等，已有他們的戲院，但受帝俄的嚴酷監視，毫無聲色；有些民族如韃靼，土耳其，土抗門 (Tirkomans) 等，連戲院都沒有，革命後，前者積極改造，後者積極創設。少數民族的劇本作家也嶄然露頭角了。

一九三五·四·十九·下午·倫敦。

不賺錢的商業

九月六日傍晚，受全聯學生總會招待的美國全國學生同盟的朋友們一車一車地到火車站去了；他們都忙著回美國去，有的趕去上學，有的趕去工作，有的趕去不過加入失業的隊伍中去！我在旅館門口忙著和他們握手道別，他們都十分殷勤地勸我回國時一定要到美國去看看。我後來決定遊美，有大部分是由於這班朋友的慫恿和鼓勵，這是後話，暫且擱起。

我們所住的這個旅館是用紙氈布的，我因加入美國學生團體同受招待，所以是「揩油」的，團體既散，我也只得搬出來，我打算脫離這個團體後，再在莫斯科勾留十天，作個人單獨觀察。照例這十天要搬到蘇聯旅行社所附屬的旅館去住，因為一般旅客只許用金幣。幸而有個蘇聯女友克娜拉的照顧，設法介紹我到她的最知己的女友西娜家去住。（這位女友克娜拉，也是蘇聯新女性中，一位很有趣的人物）在這十天裏面，承她差不多天天陪我出去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各種商店；因為靠她翻譯，探詢了不少關於蘇聯商業組織的情形。如果在前一星期可叫做「學校週」或「戲劇週」，這幾天也許可叫做「商業週」吧。關於蘇聯的工業和農業的建設情形，我在以前的通訊裏已有過相當的報告，現在要談談蘇聯的不賺錢的商業。

尋常提到做生意，為的總是要賺錢，怎麼會有什麼不賺錢的商業呢？這當然只是在蘇聯的社會裏面才有的。蘇聯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建設的成功，已由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完成，奠定了重工業的基礎，在農業方面因集體農場的普遍，也獲得社會主義化的效果了；在商業方面，因國營和合作社的商業機關的積極發展，私人商業已逐漸淘汰幾至於零，也獲得社會主義化的效果了。所謂社會主義化的商業——也就

是不賺錢的商業——牠的重要特點是在沒有私人利用資本從中取利，牠的目的全在使得消費者用最可能的廉價，享受到最可能的更好的貨物。

蘇聯的商業在管理上和別國的異點，是在無論在國內製造或由外國輸入的貨物，不是爲國家所有，便是爲合作社所有，都在政府的管轄或指導之下。但是這件事情却經過十年的繼續不斷的努力，而且也不是由政府下一道命令，強迫私人商家不許營業的；是由於政府積極擴充國營商業，積極協助合作社的商業，私人商家雖不受法律禁止，因無利可圖，漸漸歸於自然的淘汰。當一九二一年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私人商業是被准許的，其實當時的商業全在私人商家手裏；兩年以後，合作社和國營的商業已有相當的發展，而私人商業仍佔全部商業流動資本百分之五七點七。到一九二八年，大部分的商業已歸合作社和國營的管轄之下，私人商業仍佔全部商業百分之二十。到一九三〇年，私人商業僅佔全部商業百分之五點六，到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已減到百分之一；最近已減到近於零了。換句話說，除工業和農業外，商業也已達到社會主義化的成功境界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私人商業的廢除和合作社及國營商業的發展適成正比例。

要廢除私人商業，似乎只須政府用權力勒令執行，這樣早就可以廢除了，何以要經過許多時候的努力呢？這是因爲蘇聯政府深知私人商業的存在和小規模的個人主義的農業有密切的關係。在農村裏小規模的生產還盛行的時候，私人商業是不能免的。必須在鄉村的小生產者組成集體農場，和手工藝者組成生產合作社之後，（在蘇聯除較大的工業都由國營，還有手工藝者三百萬人左右組成生產合作社，）最後廢除私人商業和代以國營及合作社商業的條件才具備。所以私人商業能達到最後廢除的目的，也是農業集體化和富農的消滅所助成的結果。而農業的集體化和富農的消滅，却是經了好幾年的堅決的鬥爭。

現在請略談蘇聯商業機關組織的大概，全聯人民委員會（即類似別國的內閣）特爲全國商業立一個

專門委員會，由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兼任該專門委員會的主席，每季核准關於商業的一般計劃，至於直接主持商業的機關則有供給人民委員會（即內閣裏的一部）所管轄的消費合作社和國營的商業機關；各工業托辣斯（這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托辣斯的性質完全不同，）所附設的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社，集體農場，和大工廠，鐵道，和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所附設的工人的供給部。這樣看來，計劃雖是統一的，而執行的機關却有十幾個之多；這十幾個機關都有牠們自己的商店；這些機關所獲得的貨物，是由於先和各種工業及托辣斯訂立合同，規定貨物的質和量。有人問執行商業的事情，倘不全由合作社負責，何必要這許多機關呢？據說因為地廣人多，要供給各城市和各鄉村，決非一類的機關所能應付裕如。據現在的情形說，各類商業機關所佔的地位如下：第一位置是屬於消費合作社。在一九三二年，全國的貨物，由消費合作社分配的已達全部的百分之五十五；據一九三三年一月的統計，消費合作社的社員達七千三百萬人之多。（包括工人、農民、和僱員。）實佔全國成年人口中三分之二了。這可說是全世界上最大的合作社組織了。第二位置是屬於國營的商店，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兩年中尤有長足的發展，現在已佔全國各商業機關的百分之三十六了。（國營的商店的規模都比合作社的大。）第三位置是屬於各工廠、鐵道、磨坊、和大規模國營農場的工人的供給部，隨着的是手工業合作社，集體農場，以及其他機關。這種種商業的機關都同在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不過政府的職責，僅限於規定種種原則，依這原則監察各種供給的機關，核准依照不同的區域和不同的各羣的消費者分配貨物，支配應給各種商業機關以貨物的百分之幾，以及除所受中央供給外尚須自向各本地或其他方面定購若干。至於供給機關的內部組織，貨物的分配、選擇、以及零售商業的組織，這一切都是由各商業機關自己根據各廠、各城、和各鄉村的特殊情形，自行處置的。（這類機關當然也有未臻完善的，也有還未能滿人意的，這却是辦事人的訓練問題了。）

限於篇幅，上段僅能把蘇聯的商業組織說個大概。不過還有幾點可撮要地說一說：1. 受中央所分配的供給，並不是一律的，却是依區域而異，依工廠而異，依各機關的工作成績而異的。例如在生產上特別重要的區域，或成績特優的工廠或機關，所受供給的貨物特別優良而多。這是因爲一方面貨物還不多，一方面要藉此鼓勵生產的努力和工作的勤奮。（除中央所供給者外，向本地其他方面定購的貨物蘇聯機關自己善於選擇辦理，但在分量上也有相當的限制）2. 因此商店也有『不開的』（Closed）和『公開的』（Open）之分。不開的商店，只有領得小冊子註明所購分量的買客（這裏面當然又有分別。例如工業工人，或工人中的突擊隊隊員，更得優待）有進去購買的權利，價格特別便宜。公開的商店可隨意多買，沒有限制，價格貴得多，貨物的質地却一樣。此外更講究的東西須向『托格辛』買，但是要用金幣。這當然都是臨時的過渡辦法。財物的生產愈加豐富之後，這種界限都要漸漸地廢除，而且這種變化很快。有幾處商店，克娜拉帶我到門時，對我說這是不公開的商店，進去後一問，才知道已改爲公開的商店了。今年麵包券的廢除，也是一例。路透社曾爲此事大發其電訊，說這是蘇聯『恢復私人貿易』，把新社會的建設成功反面看作失敗，不但神經過敏，簡直是笑話！3. 供給機關和生產機關訂立合同，規定所需貨物的質和量，及交貨時期，違約者要罰款。有人以爲貨物既在國家統一管轄之下，一切都歸國家主持，何必多一舉，好像把這邊袋裏的錢放在那邊袋裏去！其實不然。各機關雖歸國家管轄，但由政府給以相當的資金後，牠們的會計仍是各自獨立，對於收支和營業仍須各自負責，這樣才責任分明，成績才有甄別的可能。4. 最後還有一點很值得我們的注意的，就是有組織的商業的優點，這優點最明顯的，是商業的費用比資本主義國家省得多，同時也就是消費者所得的利益大得多。據統計所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蘇聯的消費者付出購買貨物的每一羅布中，只有二十四個戈比（每羅布等於一百戈比）是用於維持商業機關。到一九三二年，這種維持費減至九圓零十分之一的戈比，減到一半以

下(就原來二十四戈比說)。這樣的銳減，第一是由於專以牟利為目的的私人商家的淘汰，第二是由於合作社和國營商業組織的進步，試以德國的商業費用相比。據柏林商業研究院(Berlin Institute of Commerce)希許教授(Prof. T. Hirsch)一九三三年所發表的報告，數字如下：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的商業費用佔流動資本百分之二十點三；一九三〇，百分之二六點六；一九三二，增至百分之三十，這就是等於說，在德國，用來購買貨物的每一羅布，有三十戈比為商人所得，而且這種『所得』是逐漸增高的，和蘇聯的情形剛剛相反！這種費用是『非生產的費用』(Unpro. inclusive expenditure)蘇聯政府和商業機關所努力的，是要把貨物的分配盡量簡單化，由此盡量減低『非生產的費用』，由此把不必要的消耗的人力和經濟力都得盡量用到生產的方面去。

一九三五、四、廿一、上午·倫敦。

- 蘇聯商業(雜誌) (一九三二年一月)
- 蘇聯商業(雜誌) 1934
- 大德集(雜誌) 1936
- 地產(雜誌) 1937
- 居地(雜誌) 1937
- 再(雜誌) (雜誌) 1938
- 讀者之聲(雜誌) 1939
- 蘇聯商業(雜誌) 1939
- 蘇聯商業(雜誌) 1941

萍踪憶語 1937

這是韜奮先生遊美後所寫的報告，他的犀利的眼光，不但看到了美國的物質文明，同時更看到了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尖銳的矛盾面。他還特地到美國反動勢力最強的南方去視察了一下，把黑人在南方所過的黑暗悲慘生活，完全暴露出來。這是中國從來沒有人報導過的。還有美國反動派怎樣的壓迫工農侵略別人，以及工農大眾革命份子，怎樣地爲解放自己而奮鬥，同情並援助各國的解放運動，在本書里都有生動而詳盡的描述。本書雖寫于十年前，但因爲這十年中美國的政治經濟並沒有根本變動，在今天還是使我們了解美國的一本最親切明瞭的書。尤其在美國反動派已代替日寇來奴役我國的目前，爲着明瞭美國內幕，更有一讀本書的必要。

韜奮先生的其他譯著

革命文豪高爾基 (傳記) 1933編譯

歷經 (自傳) 1937

讀書偶譯 1937

蘇聯的民主 (莫斯陸著) 1940

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1940

患難餘生記 (最後遺著) 1943

光華書店總經理

1939

37⁰